

内部资料

# 西班牙七十年代 工人自主斗争

Luchas autonomas en los anos setenta

Traficantes De Sueños, 2008



译者：余君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 Luchas autónomas en los años setenta

## 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

Traficantes De Sueños, 2008

译者 余君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2020年）



# 目 录

## 译者序言

..... 余君 1

## 编者的话

..... 圣地亚哥·洛佩斯·佩蒂特 5

## 弗朗哥时期的劳资关系

..... 圣地亚哥·洛佩斯·佩蒂特 7

## 1970 年格拉纳达罢工

..... 雷米吉奥·梅萨·恩西纳斯 57

## 洛卡罢工，反抗社会契约的自我组织

..... 阿尔贝托·阿隆索·奎诺斯 80

## 巴塞罗那港口 1976-1988

..... 米盖尔·加劳 104

## 自主与反文化：过渡时期的工作、转变与日常生活

..... 巴勃罗·塞萨尔·卡莫纳·帕斯夸尔 124

## 其他方面：经验的传承——对三名农村工人联合会会员的采访

..... 155



# 译者序言

余君

五十年代开始，战后一度被打倒的工人运动卷土重来，再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提出了对社会权力的要求，不仅是在法国、意大利和西德东德，在法西斯统治下的西班牙，经历了内战失败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在动摇着弗朗哥国家，连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战后西班牙汹涌澎湃的工人斗争，迫使一向对工人运动厉行镇压的弗朗哥国家容忍并给予地下工会以一定的合法性。西共（PCE）的工会，即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CCOO），在法西斯国家的工会选举中曾一度得势。但它苟安于“保卫合法性”政策，没有及时、也从未考虑过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组织与觉悟提高到更广阔的层面，将他们的意志进行最彻底、最自觉的表达，最后被回过神来资产阶级的镇压给完全打垮了。改良主义的西共一门心思就是利用工人斗争，让自己成为反对派的最大代表，为此甚至可以（而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极力捍卫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反过来打击工人运动本身。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民主化前，第一个拖累工人运动的是西共；民主化后，第一个反对罢工的也是西共。自主运动的产生，正是出于工人斗争摆脱碍手碍脚的党和工会的需要。可以说战后运动的整个历史，就是工人运动试图通过集体行动以摆脱官僚主义——改良主义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的历史。

现实中也存在着反对“官僚制的改良主义”政党的革命团体，然而它们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也是不合格的。法西斯国家的性质事实上使运动具有更强劲的动力，使工人的反抗更为剧烈，身处地下环境

中的西班牙革命团体，在思想上的探索却没能打开一条出路，理论上的表现很糟糕。意大利和法国的青年组织在重要事件面前给出了正确的判断并推动了工人斗争，西班牙的同龄人却没能满足革命的需要：没有为工人自主运动指明方向。对西共的批判不过落在了“党被改良主义腐化了”、“需要一个先锋党”等等大而化之的定性上，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历史证明，这一类“正确的废话”，往往都会束缚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判断力。青年不经油腻污秽的社会所腐化的头脑，本应凭借自身晴雨表的本能、对一切压迫敏感的天性与高尚理想的驱使，以时代所赋予的革命嗅觉来得到深刻与正确的分析。人们在运动中的成长是很快的，而这一成长还未能达到与六十年代的前景相符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层面。

左派，甚至有时连自主积极分子本身，都会认为工人是笨拙的，需要由一个作为代表的“先锋队”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历史使命。可每当运动找上了门来，落伍的，表现得愚不可及的往往正是左派。它们自以为是的表达，跟阶级脱了节。当然，看问题足够实际的工人们大概不会为左派先生们的无能感到可笑或义愤。他们在凶残的镇压下，以势不可挡的集体力量向压迫者发起反冲锋。没有什么能比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更加坚韧，它无数次地被打倒，又从坚实的地面上汲取力量，重新站起来。工人阶级有着改造这个腐朽世界的力量，有着比左派更加深厚的智慧，所需要的只是他们的集体意志和力量的觉醒。而左派，即使是抱着革命思想的左派，也难免掉在这样的陷阱里，也就是认为，只有在“革命”左派的指挥下，才能唤起阶级力量。如果资产阶级真的被吓倒了，那不过是看到了他们身后的工人阶级。真正撼动弗朗哥国家的，是无数在基层活跃着的、默默以微小的工作来为阶级事业付出的积极分子们。他们在工人的斗争传统下，通过无数的鼯鼠般的努力，使资本主义不得不舍弃法西斯主义的外表。

在文集的第一章中，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利用工人斗争来为资本



的发展计划提供动力。这有别于对工人运动一味的弹压，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更灵活和高级的统治的层次。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工人斗争在改良主义的控制下，是极难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的。显然，在改良主义的西共和工委会遭受了重大失败并失去了对工人的影响时，自主斗争运动这才放开手脚，以狂飙突进之势痛打弗朗哥国家。从汹涌的罢工浪潮，到班达斯、洛卡与哈里·沃克的重大斗争，自发的工人运动展现出了它真正蕴含的实力。一处的斗争经验很快就能传遍整片地区，工人们也以民主的形式在工厂中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权力。为了战斗、声援和抵抗而建立的各种委员会，难道不就是工人由自己来行使社会权力的尝试吗？西班牙工人的经验，他们的组织程度与高度告诉我们，工人要冲垮统治秩序和接手社会管理，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格拉纳达、洛卡与巴塞罗那港口的斗争，文集中还讲述了多元化的历史。从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浪潮转入八十年代的反动，文化也经历了从革命到反革命的过程，比方说，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就在这一时代发生了迅速且剧烈的转变。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流行文化大都来自“八十年代的经典”，那是运动失败与资本主义全胜时代的产物。而六七十年代早已被入土为安，被掺水，甚至被伪造，不再以它的理想主义面目现身在我们的视野中了。

考察多元化的历史起源，不难发现，它是革命失败的产物。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和分配群众运动的市场，迎合民主化的左派将其宣布为“转向”。实际上，这和它们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合法性、为了帮助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转向”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在这里，“多元化”对于我们陈腐了五十年之久的世界来说，还算是新鲜话题。多元化可以是一门生意，也可以是一场运动，只要工人阶级从中得不到好处就行。至于多元化运动所宣称的目标，我们可以一言辟之，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真正彻底的平权是不可能实现的。

自加加林上太空、古巴革命和越南战争爆发以来，人类的大胆梦

想似乎又成为了可能：它诉说着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感召下，整个一代的六十年代青年将自己投身于反叛事业。他们知道自己憎恨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的所言所行是为了什么。也许他们是历史上最激进、最慷慨和最热血的一代青年。战后的社会氛围是压抑的，无处不在的虚伪、残暴和压迫——很难说经过了这么多年，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是否有了重大改观——使他们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他们渴求颠覆，渴求真正的改变。

反叛是为了纠正世界的谬误，学习是为了在思想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偏见，而劳动是为了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主流文化遭到拒绝，阶级斗争成为了整个生活的重心。这一景象似乎夸张得引人发笑，这是因为当代离理想太远，又在麻木和虚无中沉得太深。

而当反叛的浪潮终于平息，革命却并未成功，之后，资本主义的规则就完全驯服了人们的头脑，而我们的所有思考与行为方式，甚至我们最激进的幻想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和市场关系之上的。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就算对我们已完全听话的青年身上再踩上两脚，这位青年不过是扮出一脸苦相，哀叹说：“哎呀，我还能怎么办啊？都是这样的，要听话。”似乎夸张得引人发笑，但这既不夸张也不好笑。

六七十年代的工人运动对于国内读者是完全陌生的，西班牙工人的经验也是第一次引入我们的视野。当然，后续还会引入更多西班牙、意大利与阿根廷的六八年代经验。感谢文集的几位原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生动又宝贵的内容。同时感谢龚义哲（由他校对了第一章）和 Rodrigo 提供的意见，还有李星和吴季对文章校对的重要帮助。本书由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并节选了其中重要的数章内容。欢迎对于本书的交流、讨论与传播。

2020.11.30

## 编者的话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是在一切事物当中再生产的“社会力量”，尽管如此，资本却是属于少数人的。它的完全实现就是资本主义的乌托邦。马克思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实将是彻底的资本主义，除非“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取得胜利（《共产党宣言》）。不幸的是，胜利并未到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阶级自治被摧毁、作为政治主体的工人阶级被打败，资本成功地向建立自己的自治迈出了一步。资本主义对其真理的强加，已经转变为广泛的自治：资本是纯粹的虚拟资本、政治是单纯的去政治化手段，而公民不过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动员单位。这样一来，商品的拜物教超越了自身，它将以最彻底的方式实现。

当然，马克思无法预见这些：统治者——基于战争和金融——推动了一种以债务为基础的新生活方式。但他确实看出了实质。也就是说，资本需要一个被剥削阶级来让经济运转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接受自己的生活被摧残，让他们的生活屈服于现实。简而言之，就是接受不公平、悲惨与病态的生活条件。所谓“接受”，就是庆幸自己能在一个普遍受监视的制度下生活。正是这样的场景，迫使我们重新用阶级观点来提出问题。

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而试图找回旧的工人阶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原则上，将工人阶级分类为忍受痛苦与无力的群体，这样便能简化问题。我们用“贫困者”或所谓的“99%”来取代“无产者”。虽说，它往往会产生混淆。语言的“政治化”允许我们抛开主体问题，并推动传统政治批评中阶级立场的建设。这些就是我们对七十年代阶级斗争

的反思。具体来说，有三个关键点：（一）共产主义的思想不属于任何特定政党，它是批判的思想。（二）自诩强大的国家——就像到最后一刻都在搞谋杀的弗朗哥独裁政权——非常脆弱。（三）在统治阶级控制之外的人、所谓“工人自治”、“想要生活”……始终在从中逃离，并试图达到秩序的外部。最后，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能够发明自己的、以前所未知的并且逃出现行秩序的语言时，才能取得成功。

Santiago López Petit

圣地亚哥·洛佩斯·佩蒂特

2020年夏

# 弗朗哥时期的劳资关系<sup>1</sup>

圣地亚哥·洛佩斯·佩蒂特

##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考察弗朗哥主义与反弗朗哥运动的历史，必然是有局限的。他们的研究仅限于涉及重大的工人斗争、“统治集团”的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很难从中得到一个统一的整体印象。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的来说，他们眼中的工人、政治与经济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三个互不相关的部分，最多存在一些相互的联系。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克服这种虚幻的对立，并在阶级与资本的运动中，将这种斗争的统一生动地呈现出来。我们发现在工人斗争的周期与资本的状态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它推动着不是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和，而是在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以及同样在资本的自我意识与阶级仇恨之间，全面展开的斗争所构成的唯一的历史。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有着一个相当明确的目的，即抛开文化主义者（*culturalista*）的所有幻想，在远离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化的阶级运动中学到教训、学会行动并且领悟阶级意识。

---

<sup>1</sup> 本文写于1980年。直到本书出版时，本文才得以发表。在这个版本中，我们保留了当时激进学术界的一些惯用语，例如大写字母的用法（工人运动、资本等等）。——原注

## 1961-1962 年：阶级自主的重振

毫无疑问，1961 至 1962 年的工人运动主要集中于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区，它标志着新的工人运动的出现。但是，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在五十年代的斗争和努力，这样一个斗争的周期便是难以想象的。之后的十年里，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发展计划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在政治上摧毁工人阶级。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工人及其组织的无差别镇压，并彻底压制下层阶级的一切反抗。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工厂不是作为发展的中心或者推动力，而是单纯地作为等级制与集权主义的、以生产为主的社会的一环，而被瓦解了。《西班牙宪章》<sup>2</sup>中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感觉：“作为生产单位的公司，将按等级对它的各部分下达命令……而公司的老板将主导公司的方向。” 弗朗哥治下的法西斯国家，通过对社会直接的外部干预来主导（控制和固定）物价上涨过程。特别法、普遍的镇压、固定工资的法令、国家对内部市场的整治……国家处于社会内部，为消解阶级斗争而完全将自己社会化，以此确保对剩余劳动的剥削。这是自给自足和干预主义的时代，它决定了工厂—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工人运动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来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方面是由自给自足经济所固有的低效税收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日益增长的工人压力而导致的公共开支的增大造成的。在这个通货膨胀模型中，工资只是一个变量，它会影响生产成本，但不会影响消费倾向。凯恩斯发现，作为投资的工资是一个双重变量，但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政治上对工资进行限额，将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未来起决定性

---

<sup>2</sup> 《西班牙宪章》（*El Fuero de los Españoles*）是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基本法之一，于 1945 年颁布。但作者这里搞错了，这段引文出自 1938 年 3 月 9 日颁布的《劳动宪章》（*Fuero del Trabajo*）。——校对者注

作用。1951年7月在巴塞罗那（抵制有轨电车）、巴斯克和马德里等地的工人斗争使工资上涨了25%。在1953年上涨了14%，1954年则上涨了17%。在1955至1956年上涨的比例几乎达到了30%<sup>3</sup>。

在1957年初，造成危机的三个要素汇集了。从经济层面来看，有迅速的通货膨胀和外汇的枯竭；在政治层面上，长枪党与天主教会无力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资产阶级计划；在社会层面上，工人阶级运动在不断高涨。工人阶级发现，工资是制度的致命弱点，即能在阶级冲突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和阶级意识的立足点。工资被用作了向资本进行政治进攻的工具，正因为财政枯竭才使得阶级运动逐渐兴起。1956年至1958年的斗争也是1961年至1962年的斗争的前奏，它标志着古典法西斯主义的弗朗哥国家干预的终结。在这些年间，随着传统工人组织（工人总同盟<sup>4</sup>、全国劳工联盟<sup>5</sup>……）的缺失，集会（assemble）开始成为斗争的中心，工人团结成为了阶级觉悟中的最基本要素。西亚特汽车公司（SEAT）的工人首次为声援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而举行了罢工<sup>6</sup>。虽然这次声援罢工组织得很乱，不难想象，工人团结的情绪轻易地蔓延了开来。

资本的应急对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战术上的，在阿斯图里亚斯宣布了紧急状态（estado de excepción）来阻止阶级自主的爆发。其二是战略性的，在1958年6月颁布了《集体协议法》（Ley de Convenios Colectivos）。但是，针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打击，即“稳定计划”（Plan de

---

<sup>3</sup> 《IEL 新闻公报》（Boletín Informativo IEL），1968年第4与第5号——原注

<sup>4</sup> 工人总同盟（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UGT）：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sup>5</sup>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也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sup>6</sup> F·米盖雷斯（F. Miguélez），SEAT，《体制的公司模式》（la empresa modelo del régimen），巴塞罗那，DOPESA，1977年版——原注

Estabilización), 要到 1959 年才开始实施。我们先来简要地分析一下这两种措施。

1958 年 4 月 24 日颁布的《集体协议法》,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算作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政治失败,尽管他们还没有放弃独裁统治,但已经羞嗒嗒地放弃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计划。在这项法律中提到:

1. 承认社会阶级是真实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事实
2. 承认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对抗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这项法律声明:

工会集体协议将促进社会公正的精神,并在生产和工作社区内建立团结,从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率。

协议并不否认阶级斗争,而是试图引导阶级斗争,将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结合起来,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打下基础。但实际上,经济形势却并不允许这种机制的广泛应用。为了发展,必须先要实行紧缩计划。协议谈判数量的激增仅持续到 1962 年<sup>7</sup>。

稳定计划旨在打击通货膨胀、加强资本的集中,而这些都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超额剥削。对此我们无需多言。显然,金融资本将从计划中获益,而工人阶级将在面对限制工资、失业、移民……和镇压时,勇敢地起来反抗。通过减少内需来抑制通货膨胀,又使得经济活动减少,这对于稳定计划实施之前就已经处于困境的产业来说,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采矿业、纺织业与文具业将会是受失业影响最严重的产业,但总的来说,所有工人的购买力都在下降。

工人阶级无力应对这种冲击。许诺的失业救济、移民、镇压以及

---

<sup>7</sup> 《1966 年西班牙的社会经济演变》(Evolución socioeconómica de España 1966), 全国社会计划副书记 (Vicesecretario Nacional de Ordenación Social), 1967 年——原注



无产阶级自主组织的缺失都牵制了工人的攻势。但是当资本的回应到来时，工人阶级也懂得如何完美地选择时机来反击。到 1961 年年中的时候，稳定计划已接近完成，主业会<sup>8</sup>的技术专家为经济复苏做好了准备，但同时 1961 至 1962 年的斗争周期开始了。这次斗争在 1962 年达到了高潮，它是阶级运动自发性的真正爆发。自发性不是无中生有的，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之后一系列长期的对抗中都体现了工人的自发性，正因为这些运动处在工人政治势力的影响之外，它也打了资本一个措手不及。运动是从雇主拒绝在协议谈判中让步所产生的紧张气氛开始的。但是，斗争周期真正的政治作用，是它使无产阶级在面临镇压时踊跃地团结起来了。我们可以清晰地将这个时期一分为二。1962 年 4 月，阿斯图里亚斯矿区达到了斗争的高潮阶段，这场斗争扩大到了整个地区的将近 30 万工人，导致了自 1957 年以来实行的工资限额制被打破。由于商业压力和普遍亏损，《国家公报》在 5 月 24 日宣布煤炭价格上涨。1962 年 8 月，阿斯图里亚斯发起了一场新的罢工运动，抗议一些公司没有履行协议中的承诺，但歇业（lock out）和残酷的镇压阻止了罢工的蔓延。

在这场斗争周期中，工人阶级的核心是矿工。矿工在工作场所中的高度集中与他们遭受的沉重剥削，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但除此之外，他们与政府的直接对抗，使他们比起其他的无产阶级更能直观地理解到：如果不进行政治斗争，那么他们的条件将不会得到任何改善。因此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抗争下去，并从根本上扩大斗争。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懂得了要把冲突变成“公共秩序”问题，只有使其“政治化”才能取胜。1963 年 7 月，在新基哈诺山地区（Nueva Montaña Guijano）的事件发生后，15000 名矿工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罢工。雇

---

<sup>8</sup> 主业会（Opus Dei）是一个天主教教团，1928 年 10 月 2 日在马德里成立。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一些主业会会员在弗朗哥政府中担任要职，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者注

主和警察的通力合作阻止了运动的蔓延。矿工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只能复工，而没能实现纲领中的任何一点。这在 1962 年的斗争浪潮中是一个例外，在当时的斗争中，他们一般能争取到 20%至 30%的加薪。

1962 年的罢工运动不仅波及了阿斯图里亚斯矿业，还蔓延到了许多生产部门。如毕尔巴鄂的巴斯科尼亚（Basconia）、巴伦西亚的建材和建筑业、加迪斯的农业以及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斯克的大型金属业公司。从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不难指出 1961 至 1962 年的斗争周期往往表现为“病急乱投医”（Muertos de hambre）、运动组织不力，并且缺乏政治领导。但总的来说，这些罢工是由具有优越条件的工人所推动的，工人阶级的这些部分第一次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角。工人们能够通过零星罢工、总罢工和占领工厂（如贝亚塞恩货车工厂〔Fábrica de vagones de Beasaín〕）来进行直接斗争，而没有任何组织作为中介，尽管工人阶级的历史组织（全国劳工联盟与工人总同盟）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试图打入民族工团主义中心<sup>9</sup>的西班牙共产党<sup>10</sup>和它旗下的工人工会反对派<sup>11</sup>也没能做好它的工作。

在西班牙，我们必须讨论摆脱了工人阶级历史组织的阶级自主，它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事实。无产阶级的自主组织、集会和工人委员会，本身就是阶级进行自我政治统一的地方。因此，它们根本不是供各个政治派别开会的，而仅仅是为了行动统一而建立的平台，

---

<sup>9</sup>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 Nacional Sindicalista, CNS）是长枪党建立的工会组织。在弗朗哥法西斯政权下，它是唯一的合法工会。——校对者注

<sup>10</sup> 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CE）：简称“西共”，1921 年 11 月 14 日由“西班牙人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Español）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Partido Comunista Obrero Español）合并而成。——中译者注

<sup>11</sup> 工人工会反对派（Oposición Sindical Obrera），简称“工反派”（OSO），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西班牙成立的一个工会组织，该组织企图打入民族工团主义工会，可视为工人委员会的前身。工人委员会成立后解散。——中译者注

也就是说，集会的举行要先于统一的组织、阶级的自主组织及工人自主的表达。

1961 至 1962 年的斗争周期非常重要，它表现出进攻性，但还没能爆发成革命危机。事实上，它限制了资本的发展，使得民团工会<sup>12</sup>的统治模式陷入危机，并在阶级运动中反映出工人政治力量的影响。1962 年 6 月，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在慕尼黑举行会议，企图利用工人阶级运动来反对独裁政权。西共于 9 月根据“民族和解”（Reconciliación Nacional）<sup>13</sup>的战略提出了“政治总罢工”（Huelga General Política）的口号，此举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它无法组织起阶级运动，并将其导向西共根据“自由盟约”（pacto por la libertad）提出的目标。西班牙国家的 1961 至 1962 年的斗争周期，突破了边界，汇入了囊括比利时总罢工、德国与法国的工人动员的全欧洲工人斗争周期中。斗争是国际化的，阶级成分是相似的，资本是相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独裁统治的高墙正在崩塌，不论对于寻求进入世界经济的资本来说，还是对于要将自己与阶级兄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如此。

---

<sup>12</sup> 1935 年长枪党成立了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Central Obrera Nacional-Sindicalista, CONS），1940 年，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与全国雇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Empleados Nacionales, CENS）合并为“西班牙工会组织”（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 OSE），它的地区组织称作“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es Nacional-sindicalista, CNS）简称“民团工会”。——中译者注

<sup>13</sup> “民族和解”（Reconciliación Nacional）是西班牙共产党在 195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二十周年之际提出的口号，西共自称将“毫无保留为西班牙民族和解做出贡献”，并结束全国分裂状态。——中译者注

## 所谓的“西班牙奇迹”

在稳定计划以及在政治上战胜了1961至1962年的斗争周期之后，开启了一段持续到1973年的历经危机和起伏的时期。在1961至1973年这段时间里，每年的累积平均增长率为7%，而工业产值增长到了原来的三倍<sup>14</sup>，最终形成了所谓“西班牙奇迹”的大繁荣。然而，奇迹还是有很多令人不快的地方：高通胀率、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失业、危机……等等，给辉煌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在1961至1962年斗争周期中，由资本提出的对抗阶级自主的计划表现在两个方面：政治开放和经济发展。它们旨在恢复生产力，并在政治上利用从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工人斗争。在这一时期，“改革”已经借鉴了1958年的经验，并充分发挥了它的潜力。1961至1973年的弗朗哥国家无意消解阶级斗争，而是想利用它促进发展。工厂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说得更好一些，社会分解到了被推上前台的工厂中。资本主义的语言头一回这般直白：生产力、加班、奖金……这些术语是新剥削形式的表达。在这种模式下，工厂居于核心地位，随之带来了无产阶级结构性力量的增强。弗朗哥国家同时处于社会—工厂之内与之外，为了允许一定程度上的阶级斗争，即可受控制的对抗，干脆就将其置于虚假的相对自主中。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确保物价稳定过程的顺利开展。内部与外部的运动（内部即生产纪律管理，外部即社会纪律管理）表现为了全国的运动，只有从这一刻起，我们才可以说现实而非抽象的调解与镇压，是在将真正的阶级运动引向资本的发展道路上。数据上也显示了这一点。尽管在这一时期内发生了大量的斗争，但在1964至1966年，生产率的增长率是6.9%，而实际工资的

---

<sup>14</sup> 《弗朗哥主义与阶级斗争（1939—1975）》（*Franquismo y lucha de clases*（1939-1975）），巴塞罗那，Cedos，1977年版——原注

增长率却只有 4.6%<sup>15</sup>。

在整个 1961 至 1969 年期间，生产率的增长率为 99.25%，而工资的增长率为 60.14%。在深入考察这场显然由国家而非社会发起的运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确定它产生的一些影响。从总体上讲，社会—工厂之内与之外的运动应解释为：弗朗哥国家为了使自己适应下去并保持住统治地位的尝试。国家的“向外”运动产生了虚拟的政治空间（1964 年和 1970 年的《结社法》（Ley de Asociaciones）、1966 年的《出版与印刷法》（Ley de Prensa e Imprenta）以及《国家机关法》（Ley Orgánica del Estado）），并且总的来说，还产生了对于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实践必需的、作为最低限度的政治基础的调解与代表制度的可能性（1965 年《刑法》修正案，1966 年、1971 年的工会选举等等）。国家对于社会—工厂的“向内”运动，减少了一部分虚拟的政治空间，因为国家显然是作为资本及其附属机构的职能而出现的。除了特别法和镇压之外，国家还为了资本的利益，以更广泛的方式限制阶级斗争的发展（限制工资额度的法令，限制贷款等）。

弗朗哥国家的弱点始终在削弱自身，最后它不得不求助于特别法和镇压，以求将自己保留在社会之中。它不得不进行社会化来保障自己的存在。几乎在这整段时间内，工人斗争在客观上都与资本的发展计划相契合，这并不是偶然。阶级运动无力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来攻击资本主义，这也不是偶然。弗朗哥国家对工厂—社会的两方面运动，是资本对阶级斗争所采取的机制的明显形式。它将工人斗争引入资本的发展计划中，包括控制经济周期与工人斗争周期之间的联系，使得工人斗争、危机与资本重组这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以各种形式（稳定措施、持续的通货膨胀或是国家恐怖主义）将危机与工人的反抗，转变为了推动经济复苏所必需的动力。

---

<sup>15</sup> 《对话笔记》（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第九期特刊——原注

资本在整个周期内，通过弗朗哥国家进行的干预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就是避免通货膨胀，即避免社会冲突加剧，另一方面，它需要保持发展，即保持社会消费的基础。也就是说，尽管危机是必然的，但由于政治影响不可预测，仍应将其降至最小程度。事实上，除了1967年的危机以外，它都应对得不错，虽然代价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动荡，工人斗争的势头也愈发高涨，这是其他欧洲国家没有的现象。在此期间，国家干预和反工人阶级的机制由三个部分组成：

1. 法律。《集体协议法》（1958年）、《刑法》（第222条）与1970年的《劳工集体冲突管理条例》。这些条例其实都是对工人“冲突”的不断让步，直到失效为止，它们都是纯粹经济性质的。

2. 经济政策。信用周期相较于中央的决定更具有自主性，这使得货币管理局不会阻挠货币和银行业的扩张（作为吸收工人压力的一种方式），而只能采取其他稳定的方式和控制信用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在不造成价格上涨等危及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消费）。在1962年的货币改革中，《信用与银行管理基本法》允许引入一定数量的货币政策工具，以便实行更灵活的控制。事实上，它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发展得到了充裕的资金。经济干预不会使生产结构合理化，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与银行业产生冲突，而是作为与斗争周期挂钩的“稳定政治”的资金。<sup>16</sup>

3. “政治”政策。我们将其理解为，在为了摧毁任何可能脱离经济周期的阶级自主的表现时，作为阶级权力的国家所采取的直接干预。它通过镇压手段（军事和宣传方面）进行干预，将工人阶级重新纳入资本的计划中。

这种机制被利用于经济周期，它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并且有

---

<sup>16</sup> J·M·赫尔丹（J. M. Jordan），《货币政策简介》（Introducción a la política monetaria），图卡尔（Tucar）出版社——原注

效地维持了经济周期不被打破。当然了，即使在公共支出的大量增长和以能受控制的通货膨胀进行融资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结构性的对外赤字（虽然它被立即填补上了），它导致了非独立的和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这种机制使得工人的压力，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都有可能成为资本的集中化和技术化重组的最佳动力。因此在这期间内，技术上的革新非常频繁。举例来说：只有两条自动化生产线的西班牙罗伯特·博世公司（Robert Bosch），自1966年以来就实现了全部生产自动化；同年，维尔瓦的矿山引进了机械运输，淘汰了大量的工人；1968年，佩加索（Pegaso）和马基尼斯塔（Maquinista）都尝试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同年，西班牙奥利维蒂（Hispano Olivetti）采用了新的半自动机械<sup>17</sup>……

当然，技术革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劳动，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向权力进行反抗，并且在工厂里拒绝工作的各类工人的一项真正的技术飞跃。这种国家干预体制，实际上并没有使经济周期变得更加灵活，它只是不断地在短时间内将之维持住，避免了周期的失控。事实上，它甚至也没有改变阶级的政治构成。维持稳定的手段或者通货膨胀、镇压……这些只不过是当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被打破时，面对工人阶级而处于防御状态的应急政治手段而已。它产生了内部矛盾，但又无力阻止伴随着资本发展而同时增长的、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一。

很明显，另一方面，在早就不合理与匮乏的经济基础上，这种周期性发展还受到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制约，例如农业生产的停滞、出口多样化上的无力……等等。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改革的确不会改变阶级的政治成分和各方面的不平衡，在缺少能够履行社会契约的阶级工会的情况下，它仍然是引导阶级斗争，并通过直接的强制手

---

<sup>17</sup> 《企业简报与采访》（Boletines de empresa e información oral）——原注

段履行社会契约的最佳资本主义方案。

这种机制在我们看来，表现为国家在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将自身社会化的运动，对此还有过几种片面的考察。按照经济学家的看法，对货币运动的放任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出现紊乱时，再用强制措施介入。这是经济学上经典的经济发展和紧缩交迭的政策（“stop and go”）。按照“政治学家”的看法，该机制可以归纳为一系列镇压和自由化的措施。这是西共一直以来对此所做的改良主义的解读。但将这一运动完全具体化后，它在理论上就更被抽象化了。这两种措施都将是所谓的“极端分子”（ultra）和“进化论者”（evolucionista）之间的斗争，即“坏”与“好”之间的斗争。西共没有理解到，他们所具现代化的这场运动是工人斗争“粗略”计划的复杂机制的最明显表现，简而言之，它就是阶级动力。

## 资本主义计划内的工人斗争

在这一时期，谈到工人运动就离不开工人委员会<sup>18</sup>。在阿斯图里亚斯出现了各种名义的工人委员会，它们都表现出追求阶级自主和反对民团工会的意图——即瓦解民团工会，从中把阶级当中最先进的部分重新组织起来。面对镇压，工人委员会转入了地下。由此建立了阶级自主组织的最初的、相对稳定的核心。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解放阵线<sup>19</sup>都立即意识到，工人委员会为增强他们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影响力

---

<sup>18</sup> 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Confederación Sindical de Comisiones Obreras, C. S. de CC. OO.），简称“工人委员会”（Comisiones Obreras, CC. OO.），是西班牙的一个工会组织，受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1962年成立。——中译者注

<sup>19</sup> 人民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ación Popular, FLP）成立于1958年，是一个广泛的反弗朗哥地下组织，主要由大学里的地下学生小组组成。——校对者注



开启了新的机遇。在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西共的观点取得了胜利。工人委员会应当是各种政治力量的联盟，它的路线不应超出民主斗争的范畴，为此最好宣布它是非政治的。西共希望，按照这种观点去做，就能更易于让工人委员会合法化。在这种完全错误的观念下——因为它将阶级与反资本主义的方向及其自主的性质一起转变了——西共扩大了新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的程序更加官僚主义。首先，凝聚起当地的政治力量，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工人委员会。然后，再尝试把工人委员会扩展到所有的工厂和场所，以较小规模复制这一集权模式。由此，西共把工人委员会变成了能够在工人运动内部组织起所有改良主义实践的机制。为了推动自由化，必须推行这些改良主义实践，然而它不仅促成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的另一种构想，而且还造就了大量的思想和实践上的改变。西共不想让工人集会成为一种阶级实践，而是成为提供领导权和长入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最好方式。西共给工人委员会提供的领导和“指示”，都是要让工人委员会变成以最少的组织结构进行的广泛运动，而不是阶级的自主组织。在大公司（西班牙奥利维蒂、马基尼斯塔、阿伊斯拉米巴尔（Aislamibar）等等）里的斗争中，采用了议会式的斗争方法，但这意味着内部组织的瓦解以及公开的镇压。或者公开在大街上（比如加泰罗尼亚广场（Plaza Cataluña））召集同促进工人组织无关的会议<sup>20</sup>。这充分暴露了这种完全荒谬的阶级调和政策的矛盾。实际上，西共的政策就是保卫非政治的工人委员会。它还放弃了建设以政治控制为目的的官僚机构（地方调解员之类……）的工作。

工人委员会最早是在1964年开展活动的。与1961至1963年的斗争不同，其最显著的结果是，1964至1965年马德里冶金工人的动员始终处于合法范围——即民团工会与集体协议——之内。工委会在合

---

<sup>20</sup> J·桑切斯·奥耶尔（J. Sanz Oller），《在欺骗与希望之间》（Entre el fraude y la esperanza），伊比利亚之轮（Ruedo ibérico）出版——原注

法范围内的行动，使得金属工会社会部的咨询委员会在 1964 年建立起来，并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同时推出了他们的社会活动家，干预了大公司（美标、珀金斯与 AEG（1966 年））的斗争，也改变了阶级运动的性质。他们在生产中心往往是和平主义者和经济斗争主义者。大规模动员消失了，只剩下了官僚主义的号召：“反对生活成本上涨”、“争取最低工资”……等等；这样的做法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斗争，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给西共的妥协政策效劳。但是，如果没有有利的条件，这种改良主义做法就不可能成功。后来，它只是在和公司进行集体协议谈判；斗争因为没有走上街头而未受警察干预；为了分化工人阶级，某些部门的工人工资被提高……

在这个明显的自由化过程中——西共在理论上称其为独裁制度的危机——工委会参加到了具有最低限度自由的最初的选举活动中（1966 年 9 月至 10 月）。索利斯<sup>21</sup>部长说：“没有人会问这是因何而起，只会问它将走向何方。”这是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高潮。它的公众领袖走遍全国参加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都很多，西共也有了足够的自信，它甚至建议参加第二轮选举，以便在地方与国家层面上获得更多的席位。但它走得还要远。在那一年的《关于巩固党》（*Sobre el fortalecimiento del Partido*）一文中，还提出了“支部和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已经僵化，需要更为灵活的形式”。这件事对现实的冲击是相当强烈的。在 1966 年 12 月的全民公决<sup>22</sup>获得巨大胜利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集结起来并重新得到了政治主动权，因为这次全民公决是吸引公

---

<sup>21</sup>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 1913 年 9 月 27 日——1990 年 5 月 30 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后期重要人物，1951—1969 年任西班牙工会组织（即御用工会）全国代表，1957—1969 年任“国民运动”总书记，1975—1976 年任劳动部长。——校对者注

<sup>22</sup> 1966 年 12 月 14 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就《国家组织法》（*Ley Orgánica del Estado*, 即宪法）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有 98% 的投票赞成《国家组织法》草案，于是《国家组织法》便于 1967 年 1 月 1 日生效。——校对者注

众关注的绝好机会，所以资本为这次进攻做了充分准备。在 1967 年 10 月 27 日的斗争日之前，工委会的公众领袖遭到了监禁。警察重新介入了公司内的斗争。1968 年春季是工人委员会走下坡路的标志。受挫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结论很简单。由西共提倡并由工委会实施的政治路线已经完全失败。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必须研究它们与资本的发展计划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工人委员会中出现的其他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在西共的策略的指导下，工人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对弗朗哥国家干预主义逻辑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在资本的计划中，它不是破坏性的因素，而只起到了干扰的作用。西共把这种干预理解为，利用工人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西共一直都在尝试以各种方式，将工人的权力从工厂向社会转移，这不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国家进攻，也不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到新的合法权利，而是为了下面两个原因：一、在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创造更好的活动条件；二、重新向资产阶级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主导组织。这就是西共不想让工人委员会成为阶级自主组织的原因。如果工人委员会成了阶级自主组织，那么它的行动就会远远超出民主范畴，并打破资本的周期、打碎所有阶级间的联盟。西共的这一策略，可以很好地概括为同一文件中的一句话：“试图通过保卫争取取得的合法条件，以影响和扩大政权的自由化。”

对于这一策略，对其结果与贫乏的理论依据，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很多东西。关键是要指出它的用意何在，它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当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利用工人斗争来干预资本的计划时，这样做是为了引导工人阶级的扩大再生产。简而言之，它是在不改变阶级结构的情况下，推动民主化以减少独裁统治的社会支持基础。然而，作为危机结果的自由化（理论分析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的“巧妙结合”（战术上），以及全体人民为了反对政权而进行的重新组织（最终目的上），都将因官僚主义的盲目，而被弗朗哥政权的凶狠镇压打垮。西共的阶

级妥协策略的首次失败发生在 1966 年全民公决之前，当时由于它处于（虽然是很有限制的）资产阶级合法性以内，就无力发出哪怕是最微弱的质疑。紧接着，工委会在镇压下瓦解了，这就是它最终的失败。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主导着工委会的阶级妥协路线的可悲失败。它把左翼术语和阶级立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调和在了一起。

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做法，是极左路线的绝佳例证。它拒绝利用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合法性，也拒绝参加任何集体协议的谈判，并重申对无产阶级进行直接政治领导的必要性，将其定义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道路。严重的宗派主义使工委会分裂为一些有名无实的革命工人委员会<sup>23</sup>。这一事实至少在西亚特公司中非常重要，因为这妨碍了在工厂中建立任何形式的自主组织。总之，它的政治思路是为了向国家进攻，需要直接打破资本的周期，而这一切将在新的革命党的领导下进行。有关阶级路线的意见不一，从所谓列宁主义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各种立场都有。它关于工人斗争反对体制的计划是积累力量，也就是提高阶级觉悟和组织水平，朝着能够成为打破资本最薄弱环节的、作为真正阶级自主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发展。为此，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工厂内部的斗争，这将有助于提高阶级意识并建立起组织。从阶级立场出发虽然是最直观的方法，但它也正是无产阶级真正要走上的道路，实践能够证明唯一可行的路。利用工资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是工人阶级克服自身的地方主义与偏见所必要的过程。它在资本发展的内部，在阶级自主的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这一潜在的过程将在 1970 至 1971 年的斗争周期中达到高潮，继而彻底摧毁制度对于工人斗争的全部控制。

---

<sup>23</sup> 萨拉(Sala)与杜兰(Durán)合著,《1967-74 年加泰罗尼亚主流左派批判》(Crítica a la izquierda autoritaria en Cataluña 1967-74), 伊比利亚之轮(出版社)——原注

## 用资本主义危机反对工人运动

资本马上意识到工人委员会对它构成了威胁。尽管陷入了官僚化，尽管受到了种种蒙骗，工人委员会仍是阶级自主的一种表现，工人阶级觉得工人委员会是自己的代表。起初，弗朗哥国家果断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广泛的镇压，且比先前更具针对性，旨在彻底消灭工人运动。但它没能办到，恰恰相反，工人委员会遍地开花，出现在了更多地区。在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面前，资本试图采取调和的措施，即不是利用工会进行镇压，而是通过工会将工人委员会运动转变为体制的一部分。举行工会选举是为了在政治上抵消作为模范的工人委员会的影响，将其束缚在新的工会中，并首先通过合法性来控制它们。但是，如果从自主的角度来看，工人委员会的职能是无法再被继续阉割的，那么在西共的路线中，却允许“不可调和的”工人斗争与资本的发展计划之间的调和，而不管它们在根本上的矛盾。不管是雇主还是民团工会都无法接受具有最低限度民主的代表制，因为这会影响整个体制对工人斗争的镇压计划。情况朝这发展下去，局势将更尖锐。工人的抗争和国际形势的影响<sup>24</sup>，已经开始阻碍资本周期的正常运转了。

工资斗争的强大压力产生了新的问题，以扩大生产的方式越来越难解决这个问题了。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竞争的原因，物价上涨也没法再转嫁工资上涨的压力。其结果就是，大多数以小规模生产为经营方式的公司不得不依赖外部融资。例如，特别是在1964至1965年期间，有73%的融资是来自外部的短期信贷和债券<sup>25</sup>。在1967年初，投资开始减退，通货膨胀加剧，同时贸易逆差上升。在经济处

---

<sup>24</sup> 同上，见《货币政策简介》——原注

<sup>25</sup> 《乌尔吉诃银行调查报告》(Servicio de Estudios del Banco Urquijo)，1972年版——原注

于半瘫痪的总形势下，工人运动也在蓬勃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弗朗哥国家第一次意识到，面对民主化的诉求，它可以分离出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集团来躲避各阶级再生产出来的力量。在政治层面上，逐渐变得无助的资本，与仍有能力压制阶级运动、将其在政治上转向民主目标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之间，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尤其是工人委员会连续召开了几次全国大会，并且在1967年10月27日作出的反抗镇压、反抗生活成本上升的决定。

但是资本转向了进攻，并很好地认出了谁才是它的敌人。一方面，在工人运动中，工人委员会在政治上指导了最近的动员；另一方面，阶级运动内部的先进分子建立了许多自主的工人委员会，即“另类”的工人运动。对于资本来说，工人运动及其内部的先进分子应当被消灭，阶级运动应当在新的生产过程中被消除，不能再把它们纳入生产周期。本该进行的集体协议谈判被推迟了。比塞塔贬值了。但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进攻，之后将以“稳定计划”（Plan de Estabilización）的形式出现。工资冻结了。用于服务和补贴的公共开支冻结了。利率都上涨了。诸如此类。经济危机被资本顺手用来反对工人阶级。这本质上是一场镇压性的危机。整个1968年里，在以危机之名实行的勒索之下，实施了大量裁员。成百的工人、工委会有名的代表和联络员被监禁。镇压是残酷的。西共只能空谈“保卫合法性”，而工委会正在被打垮<sup>26</sup>。反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危机正在有力展开。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彻底输掉了这场战斗，并拖垮了整个无产阶级。真正的政治斗争从此刻开始。改良主义工人运动陷入危机，左翼重组了。

---

<sup>26</sup> 《分析工人委员会发展与诞生所需历史事件与年表》（Cronología de datos y hechos históricos a tener en cuenta para hacer un análisis del nacimiento y desarrollo de las CCOO），1969年版，匿名——原注

## 工人运动的分裂及其原因

改良主义政策的全面破产，在工人组织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西共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克劳丁<sup>27</sup>—桑切斯<sup>28</sup>脱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派也脱党了，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批党员即西共（马列）<sup>29</sup>又在1967年脱党<sup>30</sup>。党内的分裂主要是由“红旗”<sup>31</sup>的知识分子于1968

---

<sup>27</sup> 费尔南多·克劳丁·彭特斯（Fernando Claudín 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于萨拉戈萨。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参加了把共青团和社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曾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内负责报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西共书记处委员。1947年至1954年担任西共驻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担任西共执委会委员。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党的正式政策产生异议。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书记处委员。1964年就革命路线问题，与总书记卡里略发生冲突。1965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逐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担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基金会（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经理，1988年参加社会党。1990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sup>28</sup>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Simón Sánchez Montero，1915年7月31日—2006年3月30日），早年担任裁缝和面包师。1936年加入西共。内战结束后隐匿于塞维利亚。1944年返回马德里。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14年徒刑。1952年获释。1954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56年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年再次被捕。1966年获释。1973年再次被捕。1976年获释。1977—1979年任国会议员。1991年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sup>29</sup> 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marxista-leninista）），简称“西共（马列）”（PCE（m-l）），1964年2月由西共内部反对苏联政策的一派发起成立，支持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该党成立后即受弗朗哥政权的残酷镇压。1973年发起成立革命反法西斯爱国者阵线（FRAP）。1975年弗朗哥去世以后继续反对卡洛斯政权。1977年抵制大选。1982年取得合法地位，随后迅速陷入衰落。1992年解散。——中译者注

<sup>30</sup> 同上，见《1967-74年加泰罗尼亚主流左派批判》——原注

<sup>31</sup> 西班牙共产主义组织（红旗）（La Organización Comunista de España-Bandera Roja），简称红旗（OCE-BR），是西班牙的一个毛派组织，1970年成立。1989年解散。——中译者注

年领导的<sup>32</sup>。人民解放阵线在这过程中也脱党了。1968年共产主义行动<sup>33</sup>成立，1969年“怎么办”(Qué hacer)<sup>34</sup>成立。在这段时间内分裂出来的所有党派，都对工人委员会的堕落和改良主义的实践……等等，采取了自我批评的立场。但是总的来说，仅此而已。即便欧洲最重要的阶级运动正在他们眼前发生，西班牙革命左翼在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是无力的，始终没有超出肤浅的批判的水平。西共(马列)与“红旗”是两个例外，但两者都局限于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西共(马列)妄图把用中国的舶来思想包装的马列主义当做公理。对现实的分析使他们得出结论：现在处于前革命形势，需要追求的目标是“反对专制集团的人民武装起义。”他们批评工人委员会是工会中的受西共操纵的傀儡，又对西共的理论做了批判，即西共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堕落成了由叛徒集团领导的改良主义政党。“红旗”对于工人运动危机的分析要明智很多，但同时也更加中派主义。它批评西共已经转变为了修正主义政党，利用了工委会、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还与政权的“改革派”达成政治妥协。红旗重申自己坚决忠于马列主义，它将改组为政党，并提出“争取共和”的口号，同时作为对弗朗哥主义危机的正式理论分析的结果，它将提出新的阶级路线。

西共(马列)与“红旗”不同，但实际上差别不大。实际上，它们只是对于西共的改良主义调和实践进行了“经院式的”和“严肃的”反对。这两个组织都依赖于西共，围绕着西共打转，下的政治定义也总是关于西共的。这两个组织接下来的发展，也证实了它们的突破是很有限的。西共(马列)和“红旗”无力与阶级运动的真实需求建立

---

<sup>32</sup> 同上，见《1967-74年加泰罗尼亚主流左派批判》——原注

<sup>33</sup> 共产主义行动(Acción Comunista)是西班牙的一个左派共产主义政党，1964年成立。1978年解散。——中译者注

<sup>34</sup> “怎么办？”小组的一些文件，收录于J·A·迪亚斯(J. A. Díaz)，《工人委员会的内部斗争》，布鲁盖拉(Bruguera)。——原注



联系，它们也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解释工人运动危机的关键不在于西共的堕落，而在于改良主义与工人自主之间的矛盾仍然不可调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组织仍是自身教条的奴隶，最终它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必须要有“真正”的革命党。这就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西班牙阶级运动所下的结论：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路线分歧与在实践上进行创新的问题最终被阉割为：革命如何在它们的领导下更加迅速地发展。

对工人运动危机的另一种解读，是由围绕着“怎么办”杂志重组的小组所提出的。这个派别是在1969年的工人委员会危机中出现的，当时西共的势力减弱了，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sup>35</sup>虽然有着激进的外表，但这不过是为了掩盖它在政治上无力应对危机罢了。虽然这一重组得到了一些前加泰工阵积极分子的支持，但它是从工人委员会中发起的。这对于理解它们的政治立场很重要，“怎么办”反对左派的夸夸其谈，也反对改良主义。它主张工人委员会必须独立于政党，由工人自己在工人委员会当中进行讨论并决定一切。它坚持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统一，反对成立政党，反对由政党领导工人委员会的包办替代主义，也因此被指责为工团主义者。实际上，“怎么办”直觉认识到，阶级运动的发展已经明确表现出了（而在1970年更是如此）作为主观意识的阶级自主与政党组织的危机，这两个关键点是西班牙阶级斗争的基本特征。但是，尽管一致倾向于现实运动，“怎么办”、“工人社团”（los Círculos Obreros）与“纲领”（las Plataformas）等小组仍无法克服自身内部的混乱，以及它们在当时政治形势中的局限。它们对于包办替代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批判，其局限性可以归纳为：

---

<sup>35</sup> 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Front Obrer de Catalunya，FOC）是西班牙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1961年成立。该组织支持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59年古巴革命，主张效法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1974年解散。——中译者注

一. “怎么办”与“工人社团”仍被束缚于群众—先锋队辩证法的观念，他们只是试图更好地适应于它，而不是以确切的方式来解决它。

二. 为了不落入教条主义和替代主义，它们在实践中反对干预路线。面对一切它们所认为的阴谋和改良主义，它们的政治干预将缩减为政治教育以及对历史因素（阶级自主、工人民主……）的无条件辩护。到1971年，在它们后来的发展中，工人委员会中的“纲领”小组成为了所有新兴小党派参加的群众组织，而“工人社团”则分裂为了几条相互关联的政治路线。

在这些分裂中，我们能看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政治矛盾。一方面，列宁主义流派当中的异端派别没有放弃建党的想法（西班牙左派共产主义组织〔Organización de 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 OICE〕、共产主义解放同盟〔Unión Comunista de Liberación, UCL〕），此外还有主张完全自主的、更加倾向工团主义的路线（工人鼯鼠〔Topo Obrero〕），最后还有在组织倾向上更加自由的派别，它们批判政党的组织形式，并得出了阶级工团主义的结论（工人自主小组〔Grupos Obreros Autónomos, GOA〕）<sup>36</sup>。但是，尽管有着局限和分歧，围绕着“怎么办”杂志的重组是一项大工程，它也是对阶级运动进行激进解读的最严肃的尝试。阶级自主组织，是作为政治路线的工人自主达到最高点的产物。这是反对工人委员会把自己当作（西共所坚持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唯一真正可用的观点，这不是要倒退到古典工团主义。

---

<sup>36</sup> 《1968至1972年巴塞罗那工人运动组织形式的演化》（Evolución de las formas organizativas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Barcelona 1968-1972），匿名。——原注

## 阶级运动并没有消亡

虽然关于每年劳资冲突的统计数据能够直观地表现这一过程，但它并没有什么指导性的意义。在 1967 年，也就是工人委员会遭受镇压并被瓦解之前，共有 567 次劳资冲突。而在 1968 年，在工人组织的重组危机中，劳资冲突的数量下降到了 236 次，但在 1969 年又增至 459 次，到了 1970 年已超过了一千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68 年，尽管数量减少了，但斗争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越来越持久和顽强。工人通过召集全体工人大会来准备对雇主的抗争。为了向雇主施加压力，他们巧妙地结合了部分停工、降低产出和总罢工等斗争方式，从一开始就打破了雇主不肯妥协的态度，而且接下来几乎总能与被解雇的工人团结一致。这些斗争虽然没能扩展开来，但它们在政治上具有极大意义，这一点必须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衡量：

——它们是不受工人委员会机关影响的自主斗争，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它们自己的大会之外，不接受任何的政治指导。

——在这些自主斗争的过程中，在工厂内部不同部门的工人之间，产生了趋向工人统一的重新组合过程。在受到雇主和警察镇压之后，工人总是会提出“要么全走，要么全留”（O todos o ninguno）的口号，这正是培养阶级意识的关键。

——这些地方性的自主斗争成了工人阶级检验自己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实践的实验场所。其中包括自主委员会、秘密委员会、最高代表大会与罢工纠察队。以及新的实践：破坏、占领工厂、工会活动预留基金等等……

——这些斗争也为工人阶级树立了榜样。它们证明了工人具有共

同的利益，即使遭到了种种镇压，工人仍能斗争。此外，它们的初步尝试和示范的性质，也被赋予了 1969 至 1971 年的新一轮斗争。我们可以从长达 163 天的埃切瓦里班达斯轧制工人大罢工（1967 年）<sup>37</sup>与布兰索尔（Blansol）大罢工（1970 年）之间看出这种连续性，这一周期以哈里·沃克大罢工（1970 年）作为高潮——它们是到那时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撇开了政党，其中有些罢工甚至是反对那些政党的。它们都是无产阶级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领导的斗争的高潮。它们向我们证明：工人委员会组织上的危机，或者工人运动本身的危机并不等于工人自主的危机，而且这样的经验是必要的。从地下活动到阶级的政治重组，再到阶级自主的建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而置身运动之外且往往反对这一运动的，正是那些想要代表工人，却阻碍工人阶级运动的政党。



哈里·沃克大罢工（1970 年）

从 1968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了一系列不受工人委员会机关影响的

---

<sup>37</sup> 见《我们的罢工》（Nuestra Huelga），2021 年年中应译制完成，与本书同译者。这本书是由罢工工人集体书写的，关于这场弗朗哥时期最长久、最精彩的集体斗争的故事。——中译者注

斗争。西亚特、洛卡（Roca）与巴塞罗那港口；塞维利亚的伊塔萨（Hytasa）；毕尔巴鄂的巴伯尔·韦尔考克斯（Babor Wilcox）<sup>38</sup>……埃塔<sup>39</sup>开始对压迫势力发起攻势，巴斯克地区产生了动荡。政府在吉普斯夸（Guipúzcoa）宣布紧急状态，恢复《反暴徒与恐怖主义法》（Ley de Bandidaje y Terrorismo）的执行，为了安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还宣布到1969年才会解除5.9%的加薪上限<sup>40</sup>。但是，面对集体协议谈判的临近和学生运动的激进化，也为了避免1962年那种经济复苏被自主斗争压倒的情况再次出现，中央政府宣布西班牙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尽管如此，工人阶级还是进行了反击，向5.9%的加薪限制发起冲击。工人斗争的新周期开始了。它的规模小于1962年，但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意义。

### 1969至1971年。工人运动的新周期的开始

资本从来没能击溃工人阶级。利用体制将工人阶级纳入发展计划之中、利用经济危机……等等，这些都不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政治失败。相反，六十年代的内部斗争，使无产阶级能够创造出真正统一所必须的主观条件。在此期间，在产业链工作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而职员和农业工人的数量都减少了。重点是，所有的前农业短工、移民、青

---

<sup>38</sup> 同上，见《分析工人委员会……》——原注

<sup>39</sup> 巴斯克祖国与自由（Euskadi Ta Askatasuna），简称“埃塔”（ETA），是一个巴斯克民族主义组织。1958年成立。该组织主张在巴斯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脱离西班牙和法国。1961年起开始进行暴力活动。1973年炸死了弗朗哥的接班人、时任西班牙首相的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1975年以后继续反对卡洛斯政权。80年代初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1987年以后多次与西班牙政府展开谈判。1992年以后遭受残酷镇压。2010年发动了最后一次恐怖袭击。2011年10月21日宣布永久停火。2018年5月3日宣布解散。——中译者注

<sup>40</sup> 同上，见《分析工人委员会……》——原注

年工人、服务业工人、老工人……等等通过多重的斗争目标，学会了以自我组织的形式统一起来。正是在阶级的政治组成（主观方面、斗争经验等）和阶级的技术构成（薪水、奖金等）之间存在着重叠，才使之成为可能。在大多数工厂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模式逐渐使工人阶级的客观结构与其主观构成相一致。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在政治上更加均匀的新无产阶级。工人的统一走出了工厂，使其成为了阶级的政治统一。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劳动条件统一化的过程。当工人阶级在资本内部进行政治重组的同时，还经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过程，即“正式”的工人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决裂。这是改良主义在工人阶级当中逐渐丧失影响力的迹象，它根本不是思想斗争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普遍反映。由西共的政策而造成的工人委员会的危机将加剧这一趋势。由于西共在 1971 年拒绝参加工会选举，这导致了工人阶级与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大企业中——之间的决裂，也就是群众在政治上与之决裂。而无产阶级能够熟练地运用集体协议谈判、用斗争反对镇压、进行声援斗争……等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统一之际突飞猛进的政治经验，直接导致了这一决裂。没有前些年自主斗争的实践、没有改良主义的危机，1969 至 1971 年的斗争周期便是不可想象的，它在弗朗哥主义的历史上，将计划 / 收编工人阶级模式打开了裂痕。即使只用货币主义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证明它。在 1961 至 1963 年、1964 至 1967 年的周期中，信贷利率的上升与投资利率的上升之间保持正相关。但到了 1971 年，尽管公共开支有所增加，信贷扩张却首次无法抑制投资的下降趋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闪烁其词的：体制已经对膨胀和紧缩交替运用的经济政策感到麻木了。而政治未来也前途未卜<sup>41</sup>。

值得纪念的是，同年 10 月，西亚特公司的工人占领了公司，并在

---

<sup>41</sup> 基督教领袖协会（Asociación Cristiana de Dirigentes），《1971 年社会报告》（Informe Social 1971）——原注

警察前来驱散他们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 周期的特性

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就只是膨胀和紧缩交替。唯一的新颖之处在于，它首次尝试对流通进行更持久和更严格的控制。在 1969 年的“政变”中，主业会完全接管政府之后，并没有改变这一发展计划。它采取了紧缩措施（限制分期付款、进口前定金等），到 1970 年为止，贸易顺差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的水平也水涨船高。当需求开始减少、危机的最初迹象出现时，大约在 1970 年底和 1971 年初，便开始了新的扩张措施。直到年底，新的繁荣阶段才得到稳固，并持续了 1972 至 1973 年这两年的时间。面对着不断上涨的物价，工人为了提高购买力而发起了斗争，为此，资本在 1969 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先是在巴斯克地区，然后扩大到全国。镇压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甚至还影响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神父被监禁，出版社被袭击，大学教授也被驱逐。另一方面，主业会政府基本上保留了计划 / 收编工人阶级的体制，并采取了更巧妙的行动。在布尔戈斯审判<sup>42</sup>之后，它没有在西班牙全境宣布紧急状态，或者采取以限制斗争扩展为目的的国家干预，而是宣布在六个月内（1970 至 1971 年间）《西班牙宪章》第 18 条无效。这样它就可以

---

<sup>42</sup> 布尔戈斯审判（El Proceso de Burgos）指 1970 年 12 月 3—9 日针对 16 位巴斯克民族主义组织“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埃塔”）成员谋杀 3 名弗朗哥政府官员的案件。法庭企图以“持续叛乱”罪判处 16 名被告 6 项死刑和 752 年监禁。各反对派组织号召反对审判，巴斯克和纳瓦拉地区发动总罢工以示抗议，天主教会也表示反对审判。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掀起了反对审判的运动。案件 15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被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1977 年获大赦出狱。这次审判被视为敲响了弗朗哥政权垮台的丧钟。——中译者注

随意逮捕，警察可以把被拘留者关押 72 小时以上……通过这种符合“自由化”新气象的、阴险且针对性的镇压，它企图终结在布尔戈斯审判期间出现的，尤其是巴斯克地区的阶级运动。但它没能办到。尽管书报审查制度让“舆论”对残酷的镇压视而不见，但阶级运动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巴塞罗那达到了最激进的高度。

斗争的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布尔戈斯审判前的 1969 至 1970 年斗争；11 月至 12 月期间声援埃塔战士的运动；1971 年审判后的斗争。

1969 年至 1971 年的斗争周期，始于在紧急状态下反对 5.9% 的加薪限制所进行的动员。运动集中在巴斯克地区，于年底扩展到了阿斯图里亚斯，并且要争取的目标变得更为丰富。例如，在乌诺萨(Hunosa)，工资斗争同时伴随着争取改善劳动安全措施与反对厂内规章制度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陪审团与办事机关通常都与雇主们（比斯开高炉〔Altos Hornos〕……<sup>43</sup>）密切配合，在塞斯陶（Sestao）和巴拉卡尔多（Baracaldo）地区，镇压达到了出动军队占领的程度。但是资本在很多情况下都让步了。加薪上限被打破。高炉公司的工人赢得了高达 30% 的加薪<sup>44</sup>。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最初阶段中，在埃兰迪奥（比斯开）的人民动员起来反对陶氏—恩奎内萨（Dow-Unquinesa）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运动中，警察的镇压造成了一名抗议者死亡。在整个周期内，埃兰迪奥的斗争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为新的阶级统一与斗争的不同形式打下了基础。

斗争在 1970 年蔓延开来。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赫雷斯（Jerez）的短工、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的运输工人、小货车司机、巴

---

<sup>43</sup> 《巴斯克地区斗争报告》《Informe sobre la lucha en el País Vasco》，1972 年，匿名——原注

<sup>44</sup> 同上，见《巴斯克地区斗争报告》——原注



塞罗那的迷你瓦特（Miniwatt）和海陆机械<sup>45</sup>的职工、格拉纳达的建筑工人、马德里的铁路工人、巴塞罗那的码头工人……全部都发动起来，参与斗争的产业数量达到了顶点。他们的要求很少仅限于工资，而常常是为了集体协议（争取增加工资和更多的补贴）、声援运动、反对经济危机（裁员和降低工资等）或者为了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而进行动员的。斗争目标的多样性并没有将运动分散，反而集中到了一点上：反对压迫、为工人的需求而斗争，并对国家的镇压予以还击。他们在运动中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组织。集会、厂内外的游行示威、罢工、占厂……最重要的是，他们赢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局部胜利。“另类”工人运动，即有别于正式工人运动的另一种工人运动，怀着十足的力量走上了舞台。



在这场斗争周期中，根据记载，反对布尔戈斯审判的动员（声援罢工与游行）在巴斯克比起国内的其他地区更加普遍。这里存在着矛

---

<sup>45</sup> 海陆机械（La Maquinista Terrestre y Marítima, MTM）是巴塞罗那一家老牌冶金企业，1855年9月14日成立，1989年并入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stom）。——中译者注

盾。这些动员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因为它们揭露了弗朗哥国家的压迫性质，但是它们脱离了周期内的其他斗争，也就是说，至少在巴斯克地区之外，（就像改良主义那样）作为特殊的政治斗争而被孤立了。它们带有超阶级的人民反抗的性质。

1971年，劳资冲突的数量大约减少了一半，只有六百次左右。但这并不代表着战斗性的降低。如果对比一下停工的时间和生产上的损失，很容易就能看出斗争正在加剧，它变得更加坚定了。斗争发生了质的飞跃。它在次数上减少，但在经济上变得更长久和更顽强。在1970年，劳资冲突平均持续2天，这一数字在1971年增加了三倍，即平均达到了8天<sup>46</sup>。斗争的策略是有意识的、经过周密计划的。比较积极参加斗争的，不是工资较低的工人，反而是工资较高的工人。禁止声援斗争、允许有条件罢工的有关集体劳资纠纷的法律（1970年5月22日）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近93%的劳资纠纷是无视这一法令进行的。金属业是斗争最坚决的部门，其次是服务业与纺织业。毫无疑问，走得最远的是在西亚特和哈里·沃克工厂的斗争，两者都表现出了工人自主的高度水平。在西亚特公司的斗争中，自主表现为占领工厂和阶级暴力。在哈里·沃克的斗争中，则是直接民主和反对镇压的暴力抗争<sup>47</sup>。尽管警察以宪法第18条被中止为由进行了镇压，工人斗争还是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周期的连续性不可能被政治手段打垮。尽管西共号召为根据新颁布的《工会法》举行的工会选举进行投票，它还是在斗争传统悠久的公司中遭到了抵制，最有觉悟的工人选择了弃权。1971年7月的《公共秩序法》（Ley de Orden Público）与同年11月的《军事刑法》（Código Penal y el Militar），为了能够进行更有效和更掩人眼目的镇压而进行了修改。不久之后，新闻与旅游部长桑切斯·贝

---

<sup>46</sup> 同上，见《1971年社会报告》——原注

<sup>47</sup> 《哈里·沃克斗争》（La lucha de Harry Walker），由工人自己编写的书。——原注

拉<sup>48</sup>宣布：“没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政府有足够的手段来控制 and 保障公共秩序。”对此不要忘记，在发给民团工会的那份关于针对工人斗争的战略的著名秘密报告中提到：“劳资冲突始终是一项政治和公共秩序问题。<sup>49</sup>”这句话完全正确。

1969 至 1971 的斗争周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但在此之前，需要指出该周期的总体性质。公司内的斗争结合了两个不同的目标：一，反对资本占有绝对剩余价值（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二，反对资本占有相对剩余价值（反对计时工资和奖金制度，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要进行声援斗争，并且在经济危机面前联合起来。这些目标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的本质相同。这就是进行政治统一的关键之处。不应当把他们的主张仅仅理解为要实现的目标，这同样也是工人权力的直接实践。工人阶级既反对那种声称必须通过直接斗争来反对政治权力或者国家的幼稚空谈，也反对无视政权问题的改良主义，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答。现在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向政权发起进攻，他们懂得了只有起来反抗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阶级的统一在反抗镇压的斗争中找到了它的总目标，但它是在要求自身权力的观念下，从斗争的不同动机中找到了融合的真正基础。

在 1969 至 1971 年的斗争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各种斗争具有各自的局部目标，斗争扩展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斗争的经验在阶级内部传播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这一点也证明了阶级内部的一致。自我组织的形式始终存在，而在被改良主义掌控的少数

---

<sup>48</sup> 阿尔弗雷多·桑切斯·贝拉 (Alfredo Sánchez Bella, 1916 年 10 月 2 日——1999 年 4 月 24 日)，西班牙外交官和历史学家。1948—1956 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所长。1959—1962 年任西班牙驻哥伦比亚大使。1962—1969 年任西班牙驻意大利大使。1969—1973 年任新闻与旅游部长。——中译者注

<sup>49</sup> 《劳工世界 1971》(Mundo laboral 1971)，巴塞罗那，1972 年 11 月。——原注

斗争中，也必须允许召开集会和进行直接斗争。总的来讲，政党组织的危机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政党这种组织已经不能适应阶级构成与斗争的需要。当没有公开面对工人自主的挑战时，政党这样的组织还能够站在工厂和阶级运动之上。就像 1968 年 5 月的法国和 1969 年秋季的意大利……那样，周期中的主角是被称为大众工人（*obrero-masa*）的社会群体：大众工人是在产业链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人。而这类工人在整个阶级中的政治行动会扩展到其他部门的工人中间。举行集会、自主斗争并要求平等的权利，这些并不是这类工人的特权，其他部门的工人（如银行业、卫生保健业等）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干起来。斗争中最明显的倾向就是，面对经典的要求（谈判、协商等），工人能够团结起来斗争。但同样也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动员。后来，巴斯克地区将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反压迫斗争，并发动真正的政治总罢工<sup>50</sup>。

## 政治意义

1969 至 1971 年的工人斗争周期，使弗朗哥国家陷入了危机，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六十年代的资本扩张机制。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与整合是建立在生产力与工资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但即便是建立了法律和经济上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资本积累，整个体制还是开始了崩溃。工人阶级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并不是与之不相关的。资本并没有再生产出受等级制度控制的劳动力，而是再生产出了冲突与对立。资本的发展计划分离崩析，这个体制上的所有环节都断裂了。无产阶级，或者更恰当地说，工人的自主在社会中短暂地形成了。赋予自主力量的

---

<sup>50</sup> 详见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MCE）的《为人民服务》（*Servir al Pueblo*）1974 年十二月号。——原注

阶级运动并没有被束缚在社会中，而是走向了真正的政治领域，向国家发起进攻。或者说，工人阶级是以另一种方式走到了斗争的最前面，它在没有被任何人代表的情况下，从事着自己的政治。它起来反对国家，使其陷入危机。显然，弗朗哥主义的危机不是最后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危机。弗朗哥主义衰落的时期就此开始了。

资本为了反对这一周期的主角即工人阶级，制定了分阶段策略。应当再一次指出，资产阶级的对策不是资本主义自觉的结果，而是它试图克服出现的矛盾所产生的实际需要。资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工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抵挡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为此，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政治上将工厂与社会隔离开来。具体来说意味着：

——将工厂变为封闭的隔离区，将之与社会隔离，这样一来镇压就能轻易打破阶级自主，而不会对外部造成危险的影响。在实践中，其想法是利用社会反对工厂，将后者作为骚乱的源头，也就是对整个体制来说是不稳定的部分。像这样，国家试图扩大其背后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上，利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将其分化为在大公司工作的工人和在小公司工作的工人。通过在经济上赋予前者特权，以此来挑拨两者；再用煽动性的宣传，将大公司中的工人说成是“不负责任和自私的”。

——在政治上利用通货膨胀。货币资本已经成为了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有效手段，这使得价值形成过程得以保持连续，因为新的资本构成不受工人斗争的制约。同时，被工人阶级作为工具来使用、作为衡量工人在斗争中实现了多少诉求的工资，成了一个政治变量，它也将被改变，同样也变得无用，被从斗争过程中分离出来。这一点对于抵抗工人的力量至关重要。通货膨胀正是其必要的手段。

为了成功地瓦解和重新吸收工人斗争周期的进攻，资本的对策一如既往，必须同样也要是一项稳定计划。通过紧缩是有可能在政治上击败工人阶级，并收回此前许诺的工资增长。但是资本不能这么做，因为与当前的阶级构成进行直接对抗需要大量的镇压，而这会违背自由化的开放主张。因此，资本的进攻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着。通货膨胀通过扩大货币基数，允许财政自主（autofinanciamiento）并增加公共开支来抵消工资的提高。而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最初的阶段，通货膨胀阻止了危机的爆发。但是，这一斗争周期带来了统治危机，这次的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政治措施。资本完全懂得，由于社会与真正政治性的社会领域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渗透作用，阶级运动并不能被削弱，甚至能够通过自我组织和暴力等形式，直接向国家发起进攻。资产阶级看到“一切都政治化了”，都成为了公共秩序问题。为了消除这一危险，资本一直都试图建立一种“冲突过滤器”，即在社会和社会领域之间进行调和（缓冲矛盾）的虚拟政治场所。1971年的国会选举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需要进行的政治改革是无止境的。直到1974年，阿里亚斯·纳瓦罗<sup>51</sup>才敢颁布《结社法》（Estatuto de Asociaciones），但在几个月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失败。

对工厂的政治孤立、通货膨胀和政治改革，是资本主义攻势的重心。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攻势最重要的后果不是资本的重组，而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改良主义被重新引入了工人阶级中间。改良主义企图通过支持“民主化”运动，对弗朗哥独裁政权施加政治危机，不用说，这一尝试自然失败了。在1969至1971年的周期中，

---

<sup>51</sup> 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1908年12月11日—1989年11月27日），早年担任法官。内战爆发后支持叛军。1944—1949年任莱昂省长。1951—1954年任特内里费省长。1957—1965年任安全总局局长。1965—1973年任马德里市长。1973—1974年任内政部长。1973—1976年任首相。1976年辞职。1977年国会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对阶级运动进行划分还是非常困难的。工人阶级不受改良主义控制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资本为了反对斗争的阶级主角，在革命缺少出路的情况下，创造出了能使改良主义被重新引入工人阶级的条件，我们接下来就将会看到这一点。1969 至 1971 年的周期撼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和政治上产生了变数，引入了真正的破坏性因素。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危机，它将制度的再生产，与其在工厂、社区和学校的统治相分离。从独裁统治产生裂缝的那一刻起，随着阶级力量冲破束缚，一个持久的斗争周期开启了。

### 1972 至 1973 年，独裁政权的危机与经济扩张

独裁政权克服了危机。工人的斗争达到了政治层面，虽然并未产生革命性突破，但还是给弗朗哥国家造成了内部裂痕。尽管政权显然实现了最后一次经济扩张，独裁统治还是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危机。1973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sup>52</sup>。经济的复苏从 1971 年底起，一直持续到 1973 年，其与先前的阶段（1966 至 1969 年）完全不同。在短时间内，对外贸易的业绩和通货膨胀的提高反映了经济扩张的真正代价。毫无疑问，这一次由通货膨胀推动的经济复苏，即使没有国际债务的重组，也是不可阻挡的。旅游业贡献的收入、移民寄给国内的汇款，以及工业品出口的增加，这些因素是决定性的，也正因为此，国际收支失衡没有成为发展的外部限制。此时，发展的限制在于通货膨胀带来的紧张局势。资本要做的选择是很清楚的。要么吸收斗争周期并借助通货膨胀来发展，要么就是维稳与镇压，它无疑

---

<sup>52</sup> 西班牙银行（Banco de España），《年度公报》（Informe Annual），1973 年。——原注

选择了前者，但也没有放弃后面那种手段，正如波耶尔<sup>53</sup>所说：“充分就业带来的社会紧张度，要比社会停滞的平静更加健康<sup>54</sup>。”工人阶级承受了不多不少的通货膨胀。同时，对阶级运动的政治控制也加强了，1973年颁布的新《工会法》直接反映了这一点。集体协议谈判的期限减少并受到限制、工人的强制行为受到处罚、合法程序被简化、签署的协议被允许扩展到其他地区等等。在这项法律下，国家的干预得到增加，垂直工会<sup>55</sup>也有了介入集体协议的可能，从而将工人的参与和阶级运动的形成降低到最小限度。

此外，还有一种旨在避免冲突和斗争扩大化的新办法。对工资增加的系统性控制被废除了，虽然这意味着价格上涨，但可以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而得到补偿。这样公司就可以利用提高工资来解决劳资纠纷。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西亚特公司，它在1972年进行了历史性的加薪。工人为了反对剥削的加剧，向这家公司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在1970至1975年间，生产率增加了261%，而工资增加了703%。工资现在不仅与生产率，而且也与总体政治形势挂钩了。工资成为了政治因素，它表现了当前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为体制向工人的工资进攻的通货膨胀，为了摧毁工人自主而加强的对阶级运动的控制，以及对整个无产阶级的镇压，这些就是资本为了将工人斗争重新纳入自己发展计划而打出的牌。自从1971年起，资本主义的扩张都持续不了多久，但这一次的繁荣直接取决于工人阶级。资本内化了它发展的局限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矛盾。在通货膨胀的加剧与对外政治依赖的增加背后，

---

<sup>53</sup> 米盖尔·波耶尔·萨尔瓦多 (Miguel Boyer Salvador, 1939年2月5日——2014年9月29日)，西班牙经济学家。1977年加入社工党。1979—1980年任国会议员。1982—1985年任财政大臣。1985年辞职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sup>54</sup> 《IEL资料文件》(Documento Informativo IEL)，1973年11月。——原注

<sup>55</sup> 所谓“垂直工会”(sindicato vertical)，就是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炮制的御用工会，由于它禁止工人之间发生横向的联系，只允许对工人进行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所以又称“垂直工会”。——校对者注



在斗争中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幽灵，即阶级自治。

1973年12月20日，由于卡雷罗·布兰科<sup>56</sup>的死，政治危机猛烈地爆发了。同年10月，“石油战争”开始。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已昭然若揭。经济复苏不过是黄粱一梦。

工人斗争蔓延开来……



西亚特 (SEAT) 罢工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持续的公开斗争的周期包括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其间有短暂的休战期。尽管这两个阶段都是由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扩张与危机）以及斗争的性质进行区分的，我们仍可以将其视为同一周期内的不同阶段。在数百家工厂中，西亚特公司的斗争仍是最好的例子，在1970至1975年间，在那里发生了一场真正持久不断的斗争。尽管卡雷罗·布兰科在死前不久采取了稳定措施，我们仍可以将他的死看做两个阶段间的过渡期。他的死引起的短暂休战，并没有影响在潘普洛纳进行的抗议运动，也没能阻止任何东西。1974年1月6日，马德里部分公交汽车司机发起罢工，6500名ASTANO的工人参加了这场罢工……<sup>57</sup>1972至1973年期间的工人斗争，是在资本主

<sup>56</sup> 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 (Luis Carrero Blanco, 1904年3月4日—1973年12月20日)，西班牙海军上将。1921年入伍。1924—1926年参加了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流亡法国。1939年弗朗哥上台后回国。1939—1941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941—1973年任总统府副秘书长。1967—1973年任副首相。1973年6—12月任首相。1973年12月20日被“埃塔”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sup>57</sup> 工人革命组织 (ORT) 的公报《在斗争中》(En Lucha), 1974年1月。——原注

义积累加速、工业与金融的集中以及通货膨胀加剧的背景下进行的。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从1972年9月到1973年9月）几乎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中最高的。如果将1970至1973年的时期考虑在内，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葡萄牙和土耳其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在此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35%<sup>58</sup>。由于维持生活水平的成本不断上升，工人阶级便起来反抗。在经济扩张期间，工人的斗争在原则上意味着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没有失业的威胁（在1972年失业率下降到劳动人口的1.5%）、能从雇主那里争取到让步等等。实际上，雇主的处境要比以往更加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协议谈判都会以援引《强制性规定》（Norma de Obligado Cumplimiento）告终。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军事法庭、大规模裁员、逮捕以及著名的黑名单，这些将在最完美的时机发挥作用。资产阶级不仅拒绝工人让步，而且还引进了现代的劳动集约化技术。为了提高生产率，它把为加快劳动速度而设置的奖金，以及为扩展工资等级制而设置的“劳动评估”（job evaluation）作为主要手段。

但要注意的是1970至1971年周期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他们没有屈服于雇主与警察的镇压。民团工会被甩在了后面，举行集会成为了惯例。在工委会的组织于危机中饱受争议的同时，工人阶级开始了自我组织，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为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而斗争。从工人委员会性质问题引出的关于自主组织的政治争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已经表明了阶级的自主组织只能是这一阶级的自我组织<sup>59</sup>。但除此之外，在1972年还出现了新的实践，这是工人阶级反抗弗朗哥独裁统治的这许多年中最重要的发现/成果之一。1972年3月，总罢工使费罗尔瘫痪了。同年9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比戈（Vigo）。之后的一年，即1973年，总罢工蔓延开来了，

---

<sup>58</sup> 《经济学家》（El economista），1978年1月。——原注

<sup>59</sup> “解放”（Liberación）杂志非常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演化过程。——原注

它扩展到了塞尔达尼奥拉—里波莱特（Cerdanyola-Ripollet）和潘普洛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塞罗那<sup>60</sup>。作为工人对雇主与警察的镇压所做出的回应，总罢工真正达到了质的飞跃。作为自主斗争的形式而发起的总罢工，在费罗尔施展了它的全部威力。这是不足为奇的。费罗尔是城市—工厂的典范之一，因为整个城市的经济实际上都围绕着巴桑<sup>61</sup>进行。在巴桑产生的冲突直接反映在了整座城市中。因此，工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本地的总罢工来扩大他们的团结，坚定他们反对国家和雇主的立场。他们是完全自发地，也就是说在没有受到任何外界指导的情况下，将劳资冲突扩展到了街上，勇敢地起来反抗压迫。没有组织就没有扩大和巩固工人运动的可能。巴桑—费罗尔，以及其他诸如 AEG—特拉萨、雪铁龙—比戈、伊比利亚汽车—潘普洛纳……等等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凭借本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这些地方能更好地重整自己的力量，并再次统一起来。应当以工厂内部的斗争作为出发点，如果把斗争局限于厂内，那将是严重的错误，为此工人们付出了受到镇压、解雇和遭受失败的代价。这些地方同样也使得工人斗争的社会化成为可能。正如 1971 年在哈里·沃克罢工中我们能看到的那样，学生与周围居民等也参与了广泛的声援运动。1973 年 4 月在圣阿德里安的特尔米加（巴塞罗那）的斗争中，同样也是如此。1973 年的新《工会法》本来打算通过工会来调解阶级冲突，却为工人运动开启了黄金时代。从费罗尔到潘普洛纳，从巴塞罗那到比戈，都产生了同样的运动。只有阶级斗争的不平衡发展才能够解释这一点：为何在相隔如此遥远、斗争传统又如此迥异的不同城市中，无产阶级

---

<sup>60</sup> 由伊比利亚解放运动（MIL）出版，关于圣阿德里安·德尔·贝索斯（S. Adrián del Besós）地区的事件。——原注

<sup>61</sup> 全称“巴桑国营军事造船有限公司”（Empresa Nacional Bazán de Construcciones Navales Militares S.A），1947 年成立，2000 年与西班牙造船公司（Astilleros Españoles SA）合并为 IZAR。——校对者注

的各个成分却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对于广大的工人运动，改良主义只能表现出无能和吃惊。它无力掺和进去避免阶级暴力，或是阻止自主斗争成为民主斗争和政治罢工的典范。

## 1974 和 1975 年：轮到弗朗哥国家面临危机

七十年代的稳定机制，主要是将生产成本的上涨转移给商品价格，这种转移既不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重新吸收，也不能通过降低利润率来维持。由此，避免了结构调整并改善了社会的紧张程度，同时也维持了利润率。为了维持表面的利润率，政府推动了通货膨胀并开放了经济特区，它们对于不同行业与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且重新分配了利润。因为腐败问题，这些很容易到手的横财并不总是流入工厂，而通常是参与到投机活动中。因此，通货膨胀成为了直接和间接向工人的工资进攻的手段。它的表现形式与劳资谈判中的困难无关，这一点使其成为逐步降低工资的购买力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权重的合适手段。1973 年，劳动收入（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占西班牙国民总收入的 54.8%，这一数字在英国为 77%，在法国为 62.5%<sup>62</sup>。1973 年底，物价上涨造成了恐慌。资本懂得通货膨胀已经从一种稳定机制，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通货膨胀不再是解毒剂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资本未能打破工资的刚性，还面临着阶级成分与自主实践在工资斗争下逐渐一致的、工人阶级的挑战。为了反对食品价格上涨并对资本施加压力，无产阶级发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并且发起了集体协议谈判，这一举措影响了上百万工人。工人在纲领中要求：一次性发放 4000 比塞塔、规定每周 40 小时工作日、每年一个

---

<sup>62</sup> 《危机中的西班牙经济》(La economía española en crisis)，1974 年与 1975 年的报告 (APIE)。——原注

月的假期、结社自由……成千上万的工人投入了斗争中，民团工会被甩在了后面。刚刚才受到生活成本上涨影响的行业，也加入到了工人阶级的运动中。卫生保健业、银行业和教育业等领域的工人都聚集在了同一目标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求。在社区中，由于生活成本的提高而进行的争取社会保障的斗争，也在不断加剧着。

货币管控，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遭受了失败。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价格与工资——确切地说，工资与利润的螺旋上升——公共开支的增加，这些都是经济上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刚性的抽象表现<sup>63</sup>。资本现在已经不能控制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总工资（直接或间接收入）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导致了货币自主。货币脱离了交换价值，成为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总体与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一事实，还在不断加剧。1974年石油价格的上涨，也无法掩盖收入/工资之比的变化。如果将1973年、1974年、1975年和1976年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工资每年都在增加，产业收入则在减少，1975年增长率为-5.6%，这一比率在1976年保持不变。货币管控没有破坏阶级构成，相反，在争取工资的斗争统一以前，它已经失效了。资本对工人的攻势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不能采取货币的中间手段，而要进行直接的攻击。在进行惯常的武力镇压以前，经济危机再次成为了一——资本徒劳无功地挽救局面的一——救命稻草。

危机和紧急状态一样，作为反对无产阶级，以及重建对社会控制的政治手段，具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在政治上破坏阶级自主；二，重建新的社会支持与权力集团。这些都得在国家形式的相对变化的范围内进行，即国家形式应当从波拿巴专制（弗朗哥国家），转变为由统治集团中不同势力掌权的多元化统治的国家。简而言之，保留弗朗哥主义，但是改变统治的形式，并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两个目标，采取了

---

<sup>63</sup> 《经济学家》(El Economista)，1977年9月。——原注

辩证地结合镇压与开放的政策，以及紧缩计划。开放进程始于 1974 年 2 月 12 日阿里亚斯的著名演讲。阿里亚斯允许建立政治社团，允许出售色情杂志，甚至允许知名的反对派领袖举行公开集会。开放进程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对巴斯克地区的镇压也开始了，并以支持埃塔为借口对所有反弗朗哥的战士进行了镇压。开放是与镇压相结合的。西共声明“变革已经开始”<sup>64</sup>，这说明它还是没有理解资本政策的真正辩证的性质。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改良主义玩弄起了把资产阶级分成“好”与“坏”的把戏。我们在分析中需要记住这一点。阿里亚斯的政策“高明”之处在于，他将镇压与开放相结合。开放要求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其中。他援引各种反恐法令来直接镇压革命。正如我们所说，它所使用的不是二分法，而是辩证法<sup>65</sup>。但这一计划注定要失败。镇压（以及警察手段和部长们的命令）依照它自身的规律，脱离了计划并打破了对于开放的设想。更不用说“自上而下”的镇压了，例如在关于开放的演讲几个月后不久，普奇·安蒂奇<sup>66</sup>遭到暗杀、宣布了紧急状态……等等。从皮奥·卡瓦尼亚斯<sup>67</sup>和伊里莫<sup>68</sup>等亲开放派部长的离职，不难预料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在 1975

---

<sup>64</sup> 《等待掌舵人》(Esperando a los capitanes)，伊比利亚之轮出版社(Ruedo ibérico)的小册子，第 46—48 期，多人合著。——原注

<sup>65</sup> 同上，见《等待掌舵人》。——原注

<sup>66</sup> 萨尔瓦多·普奇·安蒂奇(Salvador Puig Antich，1948 年 5 月 30 日—1974 年 3 月 2 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1973 年被捕。1974 年遇害。——中译者注

<sup>67</sup> 彼奥·卡瓦尼亚斯·加亚斯(Pío Cabanillas Gallas，1923 年 11 月 13 日—1991 年 10 月 10 日)，政治家。1974 年 1—10 月任信息和旅游部长。1976 年加入自由党。1977—1986 年任国会议员。1981—1982 年任司法部长。1982—1986 年、1989—1991 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6—1989 年任自由党副主席。1989 年加入人民党。1991 年逝世。——中译者注

<sup>68</sup> 安东尼奥·巴雷拉·德·伊里莫(Antonio Barrera de Irimo，1929 年 1 月 4 日—2014 年 9 月 24 日)，西班牙经济学家，曾于 1973 年 6 月 9 日—1974 年 10 月 29 日担任西班牙财政部长。——校对者注

年的头几个月里，原本的“开放”计划最终崩溃了。弗拉加<sup>69</sup>也难逃其责。针对两名埃塔积极分子和三名人民解放阵线积极分子的合法谋杀，也是其可预见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国家的这项导致各种形式的镇压加剧的、虚伪的开放政策中，包括了对无产阶级采取的严厉手段。这项计划于1973年底开始，在1973年10月30日与1974年11月22日颁布了相关法令，但这不足以阻挡工人斗争的攻势。这项计划的大致思路，是将抗通胀计划与镇压政策结合在一起。为了保持利润率，需要通过减少国内消费来降低工资，并促进出口以弥补对外赤字。在同时存在失业、通货膨胀、国民生产总值低增长和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实行经济政策也无能为力。通过分析1974年间接连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它的计划是完全不连贯的。我们可以将危机的第一年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月份，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五月开始，通货受到限制。然后到了十月，面对经济放缓，它又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后到了第二年二月，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它又回到了限制通货的政策。1975年4月，工资被再次冻结<sup>70</sup>。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对工资的削减，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条件的攻击。在实践中，它又暴露了一个问题：面对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它无法在抗通胀与镇压政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系列的尝试都未能阻止工资的增长，因此也无法重新开展投资活动。1974年，人均工资比上一年增长了25%。1975年，这一

---

<sup>69</sup>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 (Manuel Fraga Iribarne, 1922年11月23日—2012年1月15日)，西班牙外交家、法学家。1951—1953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秘书长。1953—1956年任教育部教育委员会主席。1962—1969年任通讯与旅游部长，在任期间大肆迫害反弗朗哥左翼战士。1966年参与制定《新闻法》。1967年参与制定《宗教自由法》。1973—1975年任驻英国大使。1975—1976年任内政部长。1976年发起成立民主改革党，1977年改组为“人民联盟”，并于1979—1987年担任党主席。1977—1987年任国会议员。1987—1989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9—1990年任人民党主席。2012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sup>70</sup> 同上，见《货币政策简介》——原注

增长达到 20.4%。考虑到生活成本的增加，实际的增长率分别为 15.7% 和 17%。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工人的反抗是在极为严厉的镇压下进行的。在巴塞罗那，仅在三月份就有 470 名工人被解雇<sup>71</sup>。

如果说开放——其旨在通过整合，建立更稳定的阶级联盟——遭受了失败，那么紧缩计划也在工人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阶级自主现在要么是被武力镇压，要么是被所谓“工人代表”所“自由接受”的社会契约给破坏了。在这一形势下所能采取的政策，只能是将镇压与开放相结合的政策。换句话说：正在解体中的国家，再也不能利用危机为资本主义服务了。自 1970 年以来，在政治上深陷统治危机的弗朗哥国家，无法再利用失业、限制工资和镇压等方法来阻挡工人的攻势了。相反，这些剥削和压迫的条件成为了经济斗争的主要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危机，反过来加剧了独裁统治自身的危机。这场危机不再是资本手里的工具，而是掉转过头来反对同一个资本的国家。工人斗争与危机进入了辩证的循环，相互刺激（feed-back）<sup>72</sup>并且迅速蔓延开来，它们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已经势不可挡了。改良主义等待那么多年的就是这一刻。

显然，对于弗朗哥主义的最终崩溃，必须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应当全面分析各阶级的具体反应。这种分析的优势在于：与传统的认识——弗朗哥主义的崩溃是由于各种形式的危机（经济、社会或政治等）的积累而导致的——相比，它把工人斗争置于首要位置。

## 弗朗哥主义的崩溃

从七十年代初期的斗争周期开始，随着弗朗哥专制独裁的内部分

---

<sup>71</sup> 《Avui》，1974 年 3 月。——原注

<sup>72</sup> feed-back 是控制论的一个术语，可以被译为“反馈”。——原注



裂，这种统治形式的衰退过程开始了。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压迫：无视最基本的人权、对自决权的剥夺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压制。国家只关注自己，将自己孤立，并越来越作为压迫性的、干涉的手段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已经不再是缓和社会关系的地方，它具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引导阶级运动的尝试，反而加剧了这一运动。这一过程成为了孕育社会矛盾的物质基础。在前几年间，社会矛盾的根源是工厂，即生产关系；社会矛盾集中在了阶级运动上，以工人自主的形式进行它的政治表达。随着弗朗哥主义的衰弱，产生出阶级运动（无产阶级化、工人拒绝工作……）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了，至少也是随着独裁统治的瓦解而陷入了危机。这样一来，工厂就不再是产生社会矛盾的唯一根源，而是日益作为了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矛盾必然会抛弃它的阶级性质，带上人民和超阶级的性质。但是新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出现。新脱离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小商人等等），并没有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或是成为新的无产阶级。他们和无产阶级在一起，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劳动人民”（el pueblo trabajador），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人民运动”（movimiento popular）。跨阶级的联盟得到了越来越强的政治向心力，并且随着独裁统治危机的加剧，它将在政治的总动员（独裁统治结束前后，为了争取自治和大赦等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扮演主要角色。只有在巴斯克，我们才能看到没有仅限于工人阶级的、新的社会矛盾的产生。埃塔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面对着弗朗哥国家，埃塔在得不到被“西班牙化”的巴斯克资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在保持自身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方案。在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下，巴斯克形成了行动—镇压—行动的群众动态，并由此产生了在政治上高度统一的群众运动。巴斯克地区的危机，西共影响力的衰弱等等，都是从这种政治现象开始的。

自 1974 年起，政权加速瓦解。以前从未发生过如此多的声援斗争，

如此顽强而广泛的罢工。作为对镇压的回应，运动脱离了合法轨道。在这个漫长的、势不可挡的瓦解过程中，（资本主义）衰退 / 重新适应的辩证法是其最明显的体现，它创造出了种种空隙，让虚拟的政治有了生存空间。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过程将为其阶级调和的政策打开大门。因此它也懂得，在能够使阶级运动继续发展下去的革命出路出现之前，必须先利用独裁统治的内部危机。于是它抓紧成立了政治协商组织。于是在 1971 年，在加泰罗尼亚诞生了加泰罗尼亚群众大会（la Asamblea de Catalunya），它很快成为了这一地区最重要的阶级调和运动的平台。由于其内部矛盾，改良主义只能对诸如普奇·安蒂奇之死或维多利亚惨案之类的重大事件保持沉默。随着政权的加速瓦解，虚拟政治的空间逐渐向上层建筑扩展。到了 1974 年 9 月，仅在加泰罗尼亚就出现了这些政治组织：民主集中派（Concentració Democràtica）、争取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团结（Per la unitat dels socialistes catalans）、共产党革命社会主义集团（Convergència dels socialistes revolucionaris dels PC）以及争取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民主（Pel reagrupament dels socialistes-democràtics de Catalunya）等等。然而，与随后成立的西班牙民主委员会<sup>73</sup>和民主统一平台<sup>74</sup>相比，这些都

---

<sup>73</sup> 西班牙民主委员会（La Junta Democràtica de España）是西班牙的一个政治团体，旨在反对弗朗哥统治，1974 年成立。成员包括西班牙共产党、人民社会党（El 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PSP）、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安达卢西亚社会主义联盟（La Alianza Socialista de Andalucía，ASA）、“民主正义”协会（Justicia Democràtica）、卡洛斯党（El Partido Carlista，PC）、西班牙劳动党（El Partido del Trabajo de España，PTE）和其他无党派人士。1976 年解散。——中译者注

<sup>74</sup> 民主统一平台（La Plataforma de Convergència Democràtica）是西班牙的一个政治团体，旨在反对弗朗哥统治。1975 年成立。成员包括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工人总同盟、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El Movimiento Comunista，MC）、“民主左翼”（Izquierda Democràtica）、西班牙社会民主联盟（Unió Social Demòcrata Espanyola，USDE）、卡洛斯党、加泰罗尼亚重建社会党（El Partit Socialista de

不过是小打小闹。政治空间的扩展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红旗”中占大多数的亲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sup>75</sup>的派别脱离了“红旗”，以及普遍右转的情绪，几乎影响了所有工人组织（西班牙工人党<sup>76</sup>、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sup>77</sup>、共产主义左派组织<sup>78</sup>等等），它们都渴望在政治领域上分到一块地盘。但是，这些新的重组、这些突然的转变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它们只有在协商的空间与我们所说的“虚拟政治”的出现下才能产生。资产阶级发觉独裁统治已经无力回天，也懂得镇压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镇压直接助长了政权的崩溃，只有到了这一刻，它才决定协商。

---

Catalunya-Reagrupament)、巴伦西亚国家民主联盟 (Uni ó Democr à tica del Pa í s Valenci à (Uni ó n Democr á tica del Pa í s Valenciano en castellano, UDPV)、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 (El Partido Galego Social Dem ó crata , PGSD)、工人革命组织 (La Organizaci ó n Revolucionaria de Trabajadores , ORT)、巴斯克咨询委员会 (Consejo Consultivo Vasco) 等。1976 年与西班牙民主委员会合并。——中译者注

<sup>75</sup>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PSUC): 简称“统社党”，1936 年 7 月 23 日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 (Partit Comunista de Catalunya, 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 (Uni 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 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 (Partit Catal à Proletari) 合并而成。该党是共产国际成员。共和国覆灭后转入地下，1977 年恢复合法地位。——中译者注

<sup>76</sup> 西班牙工人党 (Partido del Trabajo del España, PTE) 成立于 1967 年，其前身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的“统一”派 (Unidad)，原名西班牙共产党 (国际派)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internacional))。在 1975 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西班牙工人党。1979 年该党与革命工人组织 (Organización Revolucionaria de los Trabajadores) 合并为工人党 (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校对者注

<sup>77</sup> 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 (Liga Comunista Revolucionaria, LCR) 是西班牙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1971 年成立。该党成立后即加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1977 年取得合法地位。1991 年解散。——中译者注

<sup>78</sup> 共产主义左派组织 (Organización de Izquierda Comunista, OIC) 是 1974 年从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中脱离出来的一个小党，1979 年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Movimiento Comunista)。——校对者注

资本，或至少是大部分的资本，选择将协商作为避免事态扩大的，也就是说避免无产阶级利用这场危机的、唯一理性的出路。为了给协商开路，弗朗哥政权放宽了法律：允许罢工（但给予的“权利”非常有限），允许民团工会的改革（即允许罢工工人保留活动基金）。协商需要有对象，显然这一对象只能让改良主义来充当。在下洛夫雷加特<sup>79</sup>总罢工（1975年1月—2月）期间，警察袭击并拘捕了工人。同时在民团工会的内部，协商者和工委会的领袖们却受着同一批警察的保护。现在警察只有在工人组织占上风的时候才会插手<sup>80</sup>。资产阶级政治转了180度。资本放弃了对阶级自主的正面攻击，并为了避免自主的扩大，转向工人阶级内部寻求合作。只有从工人阶级的“内部”，资本才能打破其阶级构成的一致与政治凝聚。改良主义与亲改良主义的资本不谋而合，双方都把谈判作为目标，并在最关键的地方达成了一致。这只是第一步。

从这一刻起，资本就成了改良主义的最好帮手，因为它需要与一个在工人阶级中间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进行协商。改良主义经资本之手，被重新引入了工人阶级。它渗入了西亚特和佩加索的工厂中，并在下洛夫雷加特那样的地区中开始了社会契约的试点。在它无法渗入的地方——比如北方（潘普洛纳，比斯开等地），那里高度发展的阶级自主只有在被更激进的左翼政治力量（工人革命组织<sup>81</sup>，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sup>82</sup>）渗入之后，才能停下一切动员，就像1974年12月11日的总

---

<sup>79</sup> 下洛夫雷加特（Baix Llobregat）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省的一个县。——校对者注

<sup>80</sup> 《无产阶级行动》（Acción Proletaria），第2期，1974年9月。——原注

<sup>81</sup> 工人革命组织（La Organización Revolucionaria de Trabajadores，ORT）是西班牙一个马列毛主义组织，1969年成立。1979年并入西班牙工人党。——中译者注

<sup>82</sup>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Movimiento Comunista de España，MCE）是西班牙一个马列毛主义政党，1972年成立。1978年取得合法地位后急剧衰落。1991年解

罢工当中那样，为了阻止运动走得更远，甚至要许诺“解散镇压机关”。改良主义认识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加泰统社党的书记说道：“应当了解我们已经处在了新形势下，这使得我们能够提出要求，并且公开地实现它。原先有入狱危险的事情，现在已经能够‘合法地’进行了<sup>83</sup>。”改良主义试图利用工人斗争的动力来达到其目的。1975年工人参与度很高的工会选举，（尤其是经过对葡萄牙经验的分析）成了“用笼头套住工人运动”的最佳机会<sup>84</sup>。工人阶级之所以参加选举，是因为改良主义已经完美地履行了蒙骗与麻痹工人斗争的作用。它提出“保卫文明”，并利用人们的恐惧。在实践中，它在面对罢工时反对罢工权；在工人集会时，它又反对集会议；针对阶级的自主组织，它提出阶级的工会。当无产阶级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之后，资产阶级才终于承认了资本主义的政治自由与合法权利。最终，因改良主义的胜利，工人得到的只有许诺——而且马上又反悔了——和参加投票的资格等。

随着弗朗哥主义的加速崩溃，改良主义能够越来越有力地让阶级运动屈服于维持跨阶级联盟的稳定。对占领工厂的过火行为的恐惧，在改良主义的眼中成为一件头疼的事。通过名不符实的“工人委员会”——这么说是因为，它对无产阶级的控制是通过改组后的民团工会进行的——西共战胜了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但它没能摧毁阶级团结及其自主实践的成果。其证据就是，在后弗朗哥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斗争周期内——其中又以维多利亚与洛卡的斗争作为最重要的典范——它们直接继承了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斗争的经验。西共反对无产阶级的“战斗”让它很快忘记了，此前自我组织与直接民主的实践不过才刚刚开始，而且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975年11月20日

---

散。——中译者注

<sup>83</sup> G·洛佩斯·莱蒙多（G. López Raimundo）的报告，1974年，具体日期不明。  
——原注

<sup>84</sup> 《我们的旗帜》（Nuestra bandera），第82期，1975年11月特刊。——原注

星期四凌晨 4 点 20 分，弗朗哥死了。在他最后的几天里，陪伴他的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恐怖主义与镇压的气氛。西班牙重新回到了最初完全孤立的状态，但是出路已经打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积极进行着社会改良措施。资本的和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在目标上达成了一致：进行改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都不去改变。瓦解中的弗朗哥主义并没有远去，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工人自主最后还是被打败了。资本主义统治危机在西班牙体现为更政治化的形式，但最终并未产生阶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而是产生了与资本苟合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面对弗朗哥主义的垮台，彻底的真正民主斗争无法实现，出现的只有替代品。随着工人运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倒退，漫长的虚无主义旅程开始了。

# 1970 年格拉纳达罢工

雷米吉奥·梅萨·恩西纳斯

## 公司的帝国

从苦难的土地里  
话语升起  
在沉痛的打击下  
我们直白地提出证词

我们要讲述的是 1970 年发生在格拉达纳这座城市的斗争，它是在新一轮建筑业的协议谈判中，由格拉纳达劳动人民的新仇旧恨所引发的斗争。在这段阶级斗争的史诗所发生的城市里，过去三十年来，还没有出现过类似规模的运动。造成这场大罢工的原因有很多，最早还可以追溯到 1936 年的内战失败。由于武装起义的失败，格拉纳达自内战开始以来就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在三十年代上半叶的以城市和外省为主战场的社会冲突中，由于雇主得到了军队、国民警卫队和长枪党的有力支持，所以冲突具有异常严酷的性质。镇压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在过去曾付出巨大牺牲的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在战后的几十年间，格拉纳达的工人阶级几乎不曾反抗过，或者说没有能力这么做。他们被打倒了、忍受着战胜者的恐怖统治。他们为家人与同胞哀悼，为了死去的人而饱受折磨。他们度过了悲惨的、受残酷剥削与羞辱的漫漫长夜。此外，在 1947 年间，尽管生活成本成倍增加，格拉纳达的

公司仍然支付与战前相同的工资。

无论如何，盲目的反抗体现在了成千上万人移民出逃的本能上，他们的出走是为了远离如此深沉的苦难。毫无疑问，这也造成了农业的长期停滞。因此，在 1950 至 1970 年间，格拉纳达失去了将近 30 万人口，相当于总人口的一半。每年大约有 15000 名格拉纳达人拖家带口离开，他们大部分去了加泰罗尼亚，但也会去国内其他地区或欧洲更富庶的国家。同样，从农村到格拉纳达城市里定居的人也有很多。那些留下来的人必须在这个西欧外围的欠发达地区，忍受落后的严酷工作条件。因此，六十年代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解决该地区深刻的根本问题，而是让它变得更为野蛮落后。由于所有的弗朗哥国家发展计划都将它忽视了，格拉纳达在 1970 年不过是一个尚未工业化的农业城市<sup>85</sup>。它由官僚和办事员组成，其人口主要从事商业与运输业，他们都在各种小作坊中干活，在过去十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建筑业中工作。除此之外，格拉纳达和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一样，是消费其他地区所生产产品的市场。

在这座城市里，建筑工人占劳动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大部分是刚从农村来的。他们这一代人在生活条件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从乡村中被连根拔起，他们的生活更依赖工资，也更加多样化。但是在这里，泥瓦工人的薪水是没有保障的，更不要说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消费水平相比了。在充足的劳动力和对雇主有利的立法下，建筑业的雇主最大限度地压榨当地工人阶级，只给他们勉强糊口的工资。事实上，格拉纳达建筑业的恶劣劳动条件有：工人每周只能拿 1200 比塞塔，包括工

---

<sup>85</sup> 在格拉纳达省，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加上建筑业就是该省几乎全部的经济活动了。城市的工业组织仅限于中央牛奶（la Central Lechera, PULEVA）与阿尔罕布拉啤酒（las Cervezas Alhambra），此外在阿尔基费（Alquife）地区有一个采矿中心，埃尔法尔格（El Fargue）有圣芭芭拉（Santa Bárbara）国有公司，以及国家工业研究所在莫特里尔（Motril）设立的一家制浆公司。——原注



资、奖金和家庭补贴；每天工作 10 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还有导致高失业率的计件工资制<sup>86</sup>和加班的普及；合同的期限通常为 4 到 6 个月，但此前有 15 天的试用期。因此，除了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之外，工人也会频繁跳槽。一旦工人被解雇或者跳了槽，他就失去了固定工作，一直会保持临时工的状态。许多公司不跟工人签订合同，雇主还经常在社会保障中耍诈。工资单上填的从来不是真实的工资，一些公司甚至强迫工人签署收据，让他们说明自己欠公司的钱。公司的这些行为在地方法院面前是不会被追责的<sup>87</sup>。由于工作压力，工伤事故频发。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工作场所的秩序，工头经常会进行虐待和欺凌：

“我们从八点就开始干活。我当时是坑道里的矿工，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记得在 1969 年冬天，我们在斗牛场附近干活。当时下起了雪。老板站在露天的楼顶，我们在下面干着活，他身上裹着大衣，戴着皮手套、围巾和帽子，还撑着雨伞。他就盯着我们，看看谁敢跑到底楼去躲雨雪，或者向公司索要雨衣，这两样都写在了合同里。没有人敢这么做。”<sup>88</sup>

此外，他们解雇或者不给抗议的人续签合同，还用弗朗哥国家的恐怖统治进行威吓。

---

<sup>86</sup> 计件工资制是根据完成的工作来支付的。通常，雇主会给出要获得基本工资的最低绩效，以此来提高工作速度。——原注

<sup>87</sup> 安东尼奥·拉莫斯·埃斯贝霍 (Antonio Ramos Espejo)，《安达卢西亚农村的工作与镇压》，格拉纳达，阿尔希韦 (Aljibe) 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9 页——原注

<sup>88</sup> 何塞·加尼维特·萨尔科斯 (José Ganivet Zarcos) 的证词，见：A. Quitian, A. Aguado, J. Ganivet y M. Ganivet，《格拉纳达的工人神父》(Curas obreros en Granada)，阿尔卡拉拉雷亚尔 (Alcalá la Real)，恩里奎·托拉尔与比拉·索雷尔文化协会 (Asociación Cultural Enrique Toral y Pilar Soler)，2006 年版第 261 页——原注

## 准备斗争

这是我们的声音与斗争  
是我们的血  
如同辛苦的汗水  
挥洒在无止境的工作中

在这些条件下，让工人们组织起来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座城市的商业规模是小庄园式的，几乎没有超过五名员工的企业。六十年代末，在格拉纳达积极活跃的组织只有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工人委员会，还有天主教行动兄弟会<sup>89</sup>。它们的斗争风格截然不同。自六十年代以来，共产党在首都和附近城镇的某些地区站稳了脚跟<sup>90</sup>。1965年，工委会出现在了格拉纳达，但是与国内其他地方不同，它并非是由于广泛的集会产生的，而是出于西共的政治决定，按照党的口号<sup>91</sup>所建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了利用独裁统治开始全面自由化的背景，同时为了进行改良主义的实践，共产党设法打入垂直工会。在1966年的工会选举中，他们包揽了工会组织中泥瓦工人们的代表席位。

兄弟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在比尔亨西卡（La Virgencica）的贫民区活跃开展了工作。这个街区是由一些相邻的、规模很小的临时建筑组成

---

<sup>89</sup> 天主教行动兄弟会（La Hermandad Obrera de Acción Católica，HOAC）是西班牙的一个天主教工会，1946年成立。这个工会的成立对西班牙工人运动的复苏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工人工会联盟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中译者注

<sup>90</sup> 其中尤其是马拉赛纳（Maracena），它被称为“俄国女孩”（Rusia la chica）——原注

<sup>91</sup> “工人委员会里也有天主教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但他们和共产党相比处于绝对少数。”拉斐尔·莫拉雷斯·鲁伊斯（Rafael Morales Ruiz），《1970年7月21日至29日格拉纳达建筑业罢工的历史意义》，见 Delgado, Santiago y Veléz, 安东尼奥·何塞（coord.），《社会主义的未来》，格拉纳达，格拉纳达省理事会，1996年版第21页——原注

的。它位于城市的北部，起初是为了收容像是原先住在阿尔巴辛和萨克罗蒙特地下室——他们受到 1962 至 1963 年秋冬洪水影响——这些老街区里的人们。比尔亨西卡这里基本上住的都是工人，大多数男子从事建筑业，女子都做家政服务。这里的一些居民是共产党或者教会的积极分子，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保持着高度自尊、没有加入任何组织的人们。尽管居住条件是临时性的，但环境恶劣的临时住处却变成了长期的居住地：由于房屋的水泥板结构只有十厘米厚，所以夏季非常热，冬季却非常冷。此外，这里也严重缺少基础设施和服务，比如柏油路、照明、交通、学校与垃圾收集等。

这些情况导致了在 1967 年，在来自毕尔巴鄂的一些兄弟会积极分子的提议下，街区中开展了争取邻里协会（Asociación de Vecinos）合法化的运动，该地区的运动在全国是最先发起的<sup>92</sup>。协会的所在地是教区，每周那里都会举行集会，以便计划一些改善街区条件的大动作，妇女们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西共的人不同，兄弟会的积极分子对推动自我组织更感兴趣。通过协会，他们致力于提高人们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仅是在街区内，也要在他们工作的场所进行斗争；鼓舞他们，并向他们提供能够发展组织形式的工具，而且始终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即人们应当自己解放自己。

“在协会中，我们谈到了有关现存的不公正，现有的体制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想法。而工人世界之所以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工人们没法团结和组织起来，还没能准备好与这种局面作斗争，让事情有所改变。”<sup>93</sup>

---

<sup>92</sup> 根据 1964 年的《结社法》，毕尔巴鄂的雷卡尔德（Rekalde）社区建立了雷卡尔德家庭协会，它是全国第一个协会。同样根据这项法令，在格拉纳达成立了比尔亨西卡邻里协会，它这是第二个合法组织。——原注

<sup>93</sup> 这段话出自安东尼奥·奎迪安（Antonio Quitian），他是比尔亨西卡当时的教区

在六十年代后几年里，这两个组织的男性积极分子都与组织外的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都是从城市的各个街区中，甚至附近城市来的建筑工人。在干活的地方，“点心时间”对于相互了解和引起政治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在牢骚和玩笑中，有时工人们会大声朗读报纸，并在聊天中回想起过去斗争中发生的一切，以及尚待完成的一切：

“这些工作场所是真正的学校，在这里我们年轻人学到了生活的意义，以及为了不一样的生活而斗争的理由。在点心时间、在早上十点还有午餐时间，所有的工人都围坐在篝火旁（如果是冬天的话），或者坐在水桶边上（如果是夏天）。在这样的小会上，我们能够畅所欲言，几乎完全自由地谈论。就和现在已经五十多岁的许多人一样，我们就这样树立起了反叛精神。”<sup>94</sup>

这种气氛促成了集体意识的增长和对剥削的认识，并有助于积极分子们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推动省建筑业的集体谈判计划。由于弗朗哥当局把格拉纳达视为“安分”的地区，在那些年里，泥瓦工们就利用了该政权为了保持“开放”的门面所提供的许多合法手段，进行着有足够回旋余地的反抗。这基本上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工人中进行民意调查，以便让他们能够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以及在当地工会中开展便于交流的集会。

像这样，在开始协议谈判之前，社区里的社会部成员<sup>95</sup>就打印了

---

牧师、兄弟会的积极分子和建筑业工人。——原注

<sup>94</sup> 节选自佩德罗·奥尔特加（Pedro Ortega）的未出版的回忆录，他曾是建筑工人，参加过1970年的罢工，目前是总工会的成员。——原注

<sup>95</sup> 社会部成员由工人代表组成，而经济部成员由雇主代表组成。双方组成了审议委员会。——原注

问卷调查，其中涉及了有关工资、工作时长、加班、计件工资制、解雇、工资单以及编制等问题。这一套问卷打印了约 400 份，通过工会分发给了各个公司的工人，并将其作为讨论如何改善劳动条件的基础。一段时间后，许多接受调查的人为了准备集体谈判，开始在比尔亨西卡和其他城市的邻里协会举行集会。这些集会大约都有一两百人参加。准备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要求有：减少不同工种的工资差别、要求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八小时工作日支付 240 比塞塔、取消为了威慑工人和增加失业而实行的加班和计件工资制度，以此减少工作的不稳定和工人被解雇的数量。

在格拉纳达泥瓦工之间，为了谈判而进行的沟通工作，使得有组织的积极分子和参与进来的个人，都做好了将交流大会变成一场大型活动的准备<sup>96</sup>。这场大会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原则，即与雇主达成的协议要在大会通过后才有效。在另一方面，筹备 1970 年协议的积极分子们的目的不是要争取具体的某项协议，而是要推动能够使每年都进行新的谈判的势头，并以此作为提高格拉纳达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组织水平的基础。

在可以举行群众集会的情况下，群众正在形成争取



格拉纳达的工人斗争

---

<sup>96</sup> 那几个月的事件对安达卢西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鼓舞了共产党积极分子在塞维利亚发起的建筑业总罢工。罢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3 月，第二阶段是在 1970 年 6 月底。这是内战后西班牙国家的首次建筑业总罢工。——原注

协议的期望和压力。是的，工人举行集会，提出意见，看见自己有这么多人，彼此分享共同情感，并认识到他们可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消灭那么多的不公正，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想到的。这些都成为了直面冲突的最好武器。

### 罢工如何产生

皮肤被刺痛，这一刻  
悲伤男子的皮肤浮现  
不在光明中，而从死亡里  
在雨、阳光和睫毛之下

1970年6月17日，新协议的谈判开始了。面对资方的不妥协和他们与工人讨价还价的强硬态度，同月30日在工会大厅召开了首次工人交流大会。700名泥瓦工参加了这次会议。社会部（工会的社会委员会）要求在7月7日举行超过一千名工人参加的审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同时，召开一场新的大会。除了年龄比较大的人以外，没多少人记得格拉纳达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尽管有着善良的愿望，经验的缺乏还是导致大会在交流上出现了混乱。另一方面，危险已经浮出水面。秘密警察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事件的进展情况，守在了工会大楼前面恐吓工人。在这场交流大会结束时，人们决定在第二天举行第三次会议。这场大会没能开成，它被推迟到了16号，后来在20号举行了协议谈判审议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雇主们的态度相当顽固，很多人怀疑谈判很快就会破裂。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审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蔓延的紧张气氛，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意见分歧主要在于工资问题。工人们降低了最初每天300比塞塔的要

求，现在只要求给泥瓦工们每天不折不扣的 240 比塞塔，但雇主们不愿意提供每天（包括各方面的福利在内）超过 170 比塞塔的工资。雇主们同样拒绝了工人们为了工作稳定提出的要求：将临时工转正的时间由六个月改为四个月。同样，工人们关于规定劳动时间、有偿加班、发生事故和职业病时能够得到赔偿，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尽管工人代表多次做出了让步，雇主们的强硬态度还是让谈判落空了。

在这种情况下，满足工人们要求的合法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按照当时的劳动法，如果双方之间未达成协议，仍有可能进一步谈判并对当前协议进行修改。如果这样也不行，那么还可以援引《强制性规定》。无论如何，工人代表的合法行动对谈判是毫无效力的，因为整个过程完全取决于弗朗哥当局。

在 7 月 20 日当天下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协议谈判破裂。面对上千名听众——他们挤满了工会大厅，还有很多人在街上等着——大会宣读了双方的要求，以及最终谈判破裂的会议记录。气氛中充满了沮丧和不满，在宣读决议时社会部主席一直受到台下的起哄。雇主留下的话是没有余地的，工人的绝望引起了强烈的愤怒。大厅中群情激奋。宣布谈判破裂后，有话想说的人都开始发言，人们纷纷提出要雇主施加压力。所有人都认为谈判已经没用了，必须用其他手段来使雇主屈服。各个组织的积极分子都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他们建议工会发动两天带薪罢工，社会部主席反对了这一提议并再次遭到了台下的起哄。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在工人的要求得到有利回应之前，不要离开工会大楼，但激动的人们不会接受它。面对这些建议，大会还是果断地采取无限期罢工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许多积极分子没能看清楚局面，还花了很大力气来阻止群众的前进。他们从根本上怀疑格拉纳达工人阶级是否为罢工做好了准备，因为在此前所有的动员尝试中，人们都是无动于衷的。人们没有保留多少罢工基金，也没有做好应对长期斗争的准备。不愿罢工的大部分都是有着更多政治经验的人，他

们选择了磨洋工，这样的做法对雇主同样非常不利，对工人们也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这些积极分子不能够、不希望或者不敢违抗集会的普遍意愿，因为人们在大会上热烈地为罢工欢呼。终于有时间进行思考，举手表决的时候到了。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决定：“罢工！明早八点把不在会场的人也都叫上，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上的活。”

大会在晚上十点半结束，开了三个小时。那时它已经成为了最高领导机关，与以前的所有集会相比，它举办得更迅速、有序和明确。自六月的鲜明教训以来，集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已经成熟起来了，它在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中，也让人们对会议上的决定产生了极大的集体认同。以下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谈判的破裂被认为是所有人的共同决定。毫无疑问，这是格拉纳达大多数建筑工人的协议，他们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用罢工推动它，而无惧承担这一决定带来的任何后果。大会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宣布罢工的消息在街区和附近城镇之间口口相传。那晚是一个不眠夜。

### 罢工开始

不止有如此孤寂的三人。我们  
留在震惊的大地上  
突然再次，发现  
事物的隐藏原因

从第二天，7月21日星期一上午8点开始，工人们就集中在工会大楼前的林荫大道上，总共不下6000人：

“泥瓦工们在早上八点发起了集会，他们从格拉纳达的



各处出发，一路上，昨天没有参加会议的人也加入了进来。想要人们加入，无需威胁，至少没有人见到谁有这么做过。很多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也都自发乘坐公交汽车来参加活动。”<sup>97</sup>

罢工几乎遍及格拉纳达和周围的城镇，据估计有超过 12000 名工人参加了运动。考虑到此前从当局那里得到的便利，很多人相信这场运动是合法的。泥瓦工们和平地要求继续进行协议的谈判，并充分满足他们的要求。几乎所有人都打算在这里度过一天，所以，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篮子里放着食物的摩托车和自行车，而就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大群看守大楼的武装警察：

“所有在场的人都带有一种淳朴的气质。全部的人都加入了这场运动——这种事还是头一回，这样的场面也只有在本书里才能见到。我们大多数人都穿着休闲服，无不欣喜若狂地谈论起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功。我记得一些来自教区青年俱乐部（来自比尔亨西卡社区）的男孩，他们脸上带着喜悦和发自内心的激情。就像是经过圣火的洗礼”<sup>98</sup>

那里积累了巨大的能量，人们也充满了激情，于是动员开始了。目光被首先转向了旁边的隆达大道（Camino de Ronda），这是为了让至今还未参与的地区，也就是当时建造大学新大楼的地方加入罢工。像这样，一支上千人的工人队伍和平地走上街头，停下了所有的工作并迎接了更多泥瓦工的加入。尽管游行队伍没有采取过激行为，他们

---

<sup>97</sup> 写于罢工后不久，匿名证人的未公开证词。——原注

<sup>98</sup> 同上，见何塞·加尼维特·萨尔科斯（José Ganivet Zarcos）的证词，第 271 页——原注

没有阻碍交通，甚至要求一路上由国民警卫队护送，但警察还是勒令他们在三分钟之内解散。

为了避免冲突，并表明自己只是进行单纯的经济抗议，许多泥瓦工抬起双臂并开始喊“弗朗哥！弗朗哥！弗朗哥……”但这并没有阻止警察的干涉。面对打击，人群退回了堆满建筑材料的地方，并从那里进行了还击。石块向警察队伍倾泻而来，造成五人受伤。这场遭遇战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人们没有动摇，决定返回工会的大门口。在返回的路上，工人和警察双方都试图平息第一次暴力冲突后彼此之间的情绪。尽管如此，没有人能说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间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从早上 9 点到 11 点，泥瓦工们再次和平地聚集在了林荫大道上，一些人甚至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开始了交谈，并对刚才的冲突开起了玩笑，因为警察里面有他们认识的人，这些人和工人们住在相同的社区，也来自相同的镇子。在休战期间，人们要求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为了与敦促他们结束罢工的省劳工代表和工会当局进行对话，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在大约 11 点，这一委员会的成员用警察那里借来的喇叭在人群面前喊话，要求人们立即解散，泥瓦工要在下午 2 点重新上工，同时声称委员会将设法为他们争取早上的工资，并保证协议的谈判会继续进行。这些提议被人们拒绝了。当时就有一个人抢来喇叭，号召人们继续罢工并在明早 8 点召开另一场集会，这个提议被人们接受了。那时，格拉纳达的泥瓦工们已经完全懂得了，雇主们不会接受他们的要求，只有通过罢工来展现出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争取到自己的要求。他们当然也很害怕，但他们知道自己参加的是格拉纳达工人阶级在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行动。他们的决定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证明：一个月后，在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下，他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坚定地召开了集会。

虽然在早上的第一次冲突中，警察十分克制，但中午他们的态度

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警察先前的自制，是因为省长还在等待马拉加和哈恩（Jaén）的警察来增援。工人断然拒绝工会提出的条件后，维持秩序的警队后退，同时命令人群散开，如果三声警告后还不散去，就要开火。没有人听见第三次警告。当第二次警告响起时，进攻就开始了，工人们也被打散并分成了两队。

大多数工人撤退到拉卡莱塔（La Caleta）区，有一些人受了伤。当他们到达奥洛里兹博士（Doctor Oloriz）街的街角处时，碰到了一桩决定整件事情发展的偶发事件。碰巧有一辆装满建筑石材的卡车穿过街道，因为遇到人群而不得不停了下来。随即，几个年轻人爬上卡车，开始将建筑材料砸向路面，把它们摔成碎片。这些碎片和从街上撬下来的石块一起被工人当作了弹药，他们用这些石块发起了反攻，让警察先是撤退到工会，然后又到处逃窜。

烟雾弹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大多数都被泥瓦工们扔了回去。他们一路上掀翻并砸坏了看到的所有警车。在冲突中产生了激烈的暴力行为。在最混乱的时刻，有人喊道“保持冷静”，但没人听。警察追赶着分散在街上的人们，并且开了枪。即便警察已经开枪射击，一些泥瓦工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坚定地反抗着：

“在此之前，警察用警棍和烟雾弹袭击了我们，但很快他们就开枪了，一开始是往天上，后来就朝正在移动的人开火，我们有三名同伴被打死了。虽然听上去是在吹牛，一开始工人们并不害怕他们开枪，但看到同伴们沾满血倒在地上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所有人都开始逃命，在街上乱跑、向警察扔砖头或者被逮捕等等。”<sup>99</sup>

并不是所有的射击都是对着人的，很多时候都是朝着天上开火。

---

<sup>99</sup> 同上，见佩德罗·奥尔特加的故事——原注

但这场极其混乱的战斗，还是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结果：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很多人是在腿部或者重要部位上中了枪。警察方面约有 30 人受伤，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除了因伤势严重必须住院的人以外，由于担心受到报复，大多数受伤的工人都在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一百多名工人被逮捕，有许多人是在秘密警察在工会门口等他们骑车回家时被抓的。

### 罢工仍在继续

我们没有流泪，是的。只因这份痛苦  
装不进我们干涸的眼泪。  
只有它被每个人分享  
才会发生，并化为行动。<sup>100</sup>

第二天，7月22日星期二，尽管格拉纳达充斥着沮丧和恐慌，罢工仍在继续。国民警卫队把守着通往城市的所有入口，在检查站阻止泥瓦工到附近的城镇去。根据省长的命令，前一天死亡的三人被紧急地秘密下葬，以免引起公众的争议。大部分的工人失去了方向。没有人能保证罢工会继续下去，有些人已经重新回去干活了。只是当马拉赛纳镇里有一名工人被谋杀时，人们才发起了总罢工。罢工是由格拉

---

<sup>100</sup> 路易斯·冈萨雷斯·帕伦西亚（Luis González Palencia）的《格拉纳达 1970 年 7 月》（Granada, julio 1970），安达卢西亚围垦地（Andalucía tierra cercada），“零号”（Zero）出版社，1977 年版第 91 页。这首诗由匿名作者创造，共有五节，它附在了由兄弟会积极分子写的 1970 年罢工报告的开头。这份报告以及另一份在 1971 年由工人写的匿名报告，总结了罢工后一年发生的情况，并提供了口头证词和主要依据，这些内容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两者都对我们非常有用。——原注

纳达大教堂里一些受兄弟会影响的工人发起的。他们在教堂给死者举行了葬礼，坚持已做出的集体决定，并举行集会，以决定如何继续斗争。工人神父和教堂教长一定程度上所起到的中间作用，对罢工的继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平息群众的情绪，并防止人们袭击对前天发生事件散布谣言的报纸，比如“理想”（ideal）日报总部和该市其他报社发起袭击，工人神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sup>101</sup>

教堂一整天都开放，人们也陆续前来。成千上万的男女克服了恐惧，参加了那里的长期集会。为了在之后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分成了讨论小组。在这些集会上，人们达成了一致，准备好了给媒体和当局的发言，最重要的是，准备好了给其他格拉纳达建筑工人的话。在大教堂中，洋溢着深入到每个人心中的、从斗争中产生的集体智慧与集体归属感，这一切让他们起而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都有义务向其他人介绍自己，并由他的同伴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确认身份。多亏了这样做，不止一名混入其中的警察只好悄悄溜走。他们所作的声明都署上了“教堂工人小组”的名字，以下是当时有意保存下来的一份副本：

- 我们在一起能保持团结一致、得知任何消息并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我们也欢迎妇女的加入。此外，整个格拉纳达正在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意愿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

- 如果罢工只在我们自己家里进行，那我们将被孤立，永远不会知道该怎么办。而在这里，我们相聚在一起，交谈、讨论，阐明我们的想法，做出我们的决定。

- 我们感受到自己肩上负有责任，整个西班牙的工人们都将目光投向我们，他们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以及将要做的事

---

<sup>101</sup> 《格拉纳达 1970：三位死者》（Granada 1970: tres muertos），《伊比利亚之轮》，第 26 与 27 号，1970 年 8 至 11 月，第 99 页——原注

情。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于西班牙工人的历史将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晚上该关门的时候，一些人留在教堂里面，其他人都走了。矛盾的是，参加战斗的妇女也想留下来睡觉，但她们在集会上受到了重视，所以拒绝留下来。这是因为留下来的工人想做出表率，避免流言蜚语。然而，她们的谨慎没起到作用，媒体仍然撒谎说妇女和儿童在教堂里睡觉。

第二天，警察包围了这个地方，不让任何人进入，食物也不能送进去。警察是要让里面的人因缺少食物和补给而屈服。实际上，一些离开教堂去用募捐的钱买些啤酒的人，一走出教堂就被抓回警察局并且受到了拷打。即使省长施加了压力，教会仍然支持里面的人，不允许警察进去驱逐他们<sup>102</sup>。这场行动的自发性质以及它被众多人支持的事实，在一些工委会和西共领导人中引起了奇怪的反应，他们认为这是对其组织在工人运动中地位的严重威胁：

“集会发生的次数迅速减少，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工委会没有参与进来。我曾经目睹工委会一位出名的积极分子，他是怎样要求自己的儿子离开教堂的，因为里面的人都被神甫操控了……后来，同一位非常重要的工委会和西共的积极分子，在离包围教堂的警察不远的帕西加斯广场上分发小册子，然后导致了他被捕。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天里发生了好多这样的事。当时，他们还用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在小册子上

---

<sup>102</sup> 当时的格拉纳达大主教埃米利奥·贝纳万特（Emilio Benavent）宣布自己支持工人的要求，并捍卫了工人神职人员的工作，虽然罢工的时候他正好在旅行中。  
——原注

署名。”<sup>103</sup>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警察还保证不会对自愿从里面离开的人追究责任，在第二天，23日，很多人就从里面离开了。24日，最终大约离开了80人。

同时，在外界和当局的压力下，工委会的成员通过广播和报纸呼吁结束罢工。23日，警察允许他们进入大教堂去和里面的人谈话。经过对话之后，他们给当局写了一份文件，上面认为只要工人自愿返回工作岗位，就可以更方便地重新开始协议的谈判。但是罢工仍在继续。在（工会的）社会与经济两部的联合声明中，也要求重新开始商议。继续协议谈判的要求得到了劳工代表的支持，但是要以工人恢复工作为条件。然而，直到29号工人们才开始恢复工作。当建筑工人回去上班时，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由一些工人写在传单上，在7月30日分发。简而言之，他们要求在一周内签署协议。如果在这之后仍未达成协议，他们就威胁采取新的行动。这就是说，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回去工作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但在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协议，工人们必须保持反抗的态度，比如只工作八小时、抵制加班和计件工资制，并且在开始工作前沉默肃立，为死去的同伴默哀一周。为了确保协议的后续进展，他们提出在那一周里让联络员代表他们，每天六点半到工会去。在没有联络员的地方，他们就会让两个同伴每天都到工会去。最后，工人之间彼此号召要在经济要求下团结一致：

“谁需要钱，就提出来。有钱的就把钱给缺钱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现在有些人失去了工资，还有一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我们不能忘记受伤的同伴和还关在里面

---

<sup>103</sup> 同上，何塞·加尼维特·萨尔科斯（José Ganivet Zarcos）的证词，第270和274页——原注

的人。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但是没有人想过必须讨回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能，我们也必须相互支持。”

在那几周里，全国甚至整个欧洲，都为格拉纳达泥瓦工们的斗争进行了壮观的声援运动。人们募集了资金来帮助死者的家庭，还有伤者以及因为参加罢工受到报复而被解雇的人，以便将斗争继续下去。他们募集到了一笔可观的钱，埃塔还宣布从抢劫所得中，把那笔著名的“百万比塞塔”捐给死者的家属，但没人了解具体的情况。最后，8月3日清晨，在广场上签署了新的省建筑业集体协议。这条消息第二天出现在了报纸上。

### 赢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从字面上看，协议是很正常的。但协议里充满了陷阱。即使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在内，几乎没有任何能让雇主执行协定内容的保证。雇主们系统性地降低了所有的要求，尤其是与工资有关的那一部分。临时工仅能获得175比塞塔的工资。工人复工后就不能举行群众集会，再加上协议已经签署，还有解雇和失业日渐严重，工人没法继续等待下去，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工人的力量。让受兄弟会影响的人和自主积极分子们感到遗憾的是，这场斗争始终没有超出合法的范围。虽然围绕着新的建筑业协议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这次斗争还是不够大胆。他们主要的自我批评，不仅是对斗争的目标看得不够长远，缺乏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暴露出了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在21日那天，工人的激进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一点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或是提到过。尽管罢工从第一天起就受到了严厉的镇压，格拉纳达泥瓦工们战斗的意志仍然极其高昂，即使在几天



后，当积极分子们都认为人们不能再坚持下去，并且提出复工时，工人的行动再次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工人们继续进行了很多天的罢工。最终，他们为了签署协议才回去工作了，尽管抱有极大的不满，但协议一经签署，他们就没有再提出继续罢工了。协议的签署，就相当于放弃进一步的动员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此外，协议还从后面拖住了积极分子们。他们认为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足够了，现实不允许他们实现更多的目标了。所以，现在的目标只有：签署协议并执行它，虽然 1970 年争取到的也只有这份协议了。很明显，对于这些积极分子而言，争取协议的签署从各方面来讲至多不过是一个前景，而决不应该成为斗争的首要目标。<sup>104</sup>

关于 1970 年罢工的另一个结论是，集会是决定性的地方，这些集会具有发展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动员的最广大的可能性。弗朗哥当局在允许群众举行集会后，便吸取了教训。这正是 1970 至 1971 年科尔多瓦建筑业新协议讨论期间，不允许进行大规模集会的原因。事实上，在格拉纳达地区，集会的缺失正是工人阶级失去力量的主要原因。当失去了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失去了交流、讨论和做出集体决定的地方，工人们的力量与团结程度就被削弱了。不能够召开集会，这就使得由少数工人参加的行动重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时候，积极分子们重新变得重要起来，但他们的呼声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回应。即便经过了协调的尝试，兄弟会与工委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是恶化了。主要的分歧是在考虑采取更大的行动时产生的，例如 8 月 21 日、9 月 21 日和 10 月 21 日的罢工。在这几天，举行罢工是为了纪念三名死去的同伴，巩固和扩大协议取得的让步（八小时工作日），并反对雇主的报复

---

<sup>104</sup> 所有这些思考，以及动员期间写作和被引用的文章，都被收集在自主斗争工人们于 1971 年编写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文件总结了罢工一年后发生的事。这份文件中的出处依据和口头证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发生了什么。它对我们起了很大的帮助。——原注

行为。

工委会的目的是利用泥瓦工人的斗争来实现西共政治鼓动的目标，以及服务于他们不愿与其他团体平等合作的恶意。于是，工委会与兄弟会的协调工作失败了。1970年10月21日的停工是恢复罢工的最后一次尝试，但它的广度与强度都无法与7月那两周相提并论。

由于格拉纳达的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的分散，也由于不能举行集会或者在更大范围内把工人们协调起来，工人们开始尝试用公司委员会、街区集会和呼吁号召等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然而，建立公司委员会的尝试落了空。一旦失去了举行群众集会的可行性，公司委员会就无法提高组织水平，也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工人们建立这些委员会的尝试，还是能产生一些作用的。证据就是在大公司中，由于工人的集中程度较高，他们自己就能够争取到比已签署协议更好的一些条件。

为了对仍被关押着的人进行声援，有人号召罢工或者是采取其他手段施压，但这些尝试很少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格拉纳达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经过7月的罢工大大提高了，政治组织也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展起来。然而，1970年三位工人的死还是给人们造成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也许正是这一点，再加上组织与经验的缺乏，就是当地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进行过声援泥瓦工人的总罢工的原因。

无论如何，这次罢工的经验对于随后几年是有用的，那时人们为了支持自己的需求，又重新用罢工来推动新的协议了。人们对于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泥瓦工中间，这一转变尤为明显。声援活动也变得更为频繁了：

“不仅如此，管事的人也懂得人们有团结起来的愿望和可能性。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如果是在以前，要是有人被管事的找上了麻烦，其他人只能默不作声往旁边看……我记得去办公室的路上放了一个筐，大家都默契地往里面放钱来

支持受迫害的同伴。这里面的钱足够被赶走的同伴度过接下来的足足十五天时间了。”<sup>105</sup>

由于工人所施加的压力，协议中的某些部分才从纸面上得到了执行。但对于格拉纳达的泥瓦工人们来说，他们应该能够有尊严地工作八个小时。由于加班和计件工资制增加了失业人数和移民现象，这项要求也理应被视为工人们共同的目标。像每天只工作八小时，还有消极怠工这样的日常做法保持了很长的时间，即使在罢工结束数周后也是如此，这是为了要求落实在协议中承诺过的条件改善。工人们所做的事情还包括了不在空白的表格上签名，以及到工会和劳工代表那里去检举。事实上，劳工代表们收到了大量有关资方出于报复而解雇工人的检举信。

在1970年7月，工人或许还不够精明，没能结合部分停工、降低产量乃至总罢工的方式施加压力，打破雇主的顽固态度。格拉纳达的泥瓦工人在没有任何组织进行指导的情况下，走上了充满荆棘的道路，并且承担了所有随之而来的后果。镇压的极端严厉，主要是由于警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人民爆发的怒火，而且在工业区和传统的运动中心以外的地方，一旦爆发民众集会与工人抗议的蔓延，弗朗哥政权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

在缺少工人组织的情况下，教会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被报刊和当局作为“反弗朗哥集团”而备受指责。尽管他们也犯过错误，但他们在工人中的巨大声望和对工人群众的不断教育，这些对于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工人集会掌握了局面。而西共没能控制住群众的动员。没有他们的教育和分析，没有他们的布道，这场斗争就不会如此深刻地鼓动起每个阶层的人们。这些教会自主积极分子中

---

<sup>105</sup> 安东尼奥·奎迪安在证词中还提到大量工人对雇主提出了上诉。——原注

的许多人都住在比尔亨西卡的街区里，现在他们又搬去了卡图哈（Cartuja）与阿尔曼哈亚尔（Almanjayar）的工业区。他们创建的组织也随之移动，不久之后，那里的工业区也建立了邻里协会。在那些年里，这些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例如在 1975 年，为了抗议教会反对罢工，他们占领了大主教的宫殿。这些地区同样也建立了建筑工人合作社。然而，那个地方本来是格拉纳达市最富战斗性的街区，最终却没能抵挡住不断与骇人的堕落。随后的毒品和犯罪，摧毁了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社区的构想。当时参加斗争最积极的人，最终都离开了。

几十年后，格拉纳达建筑业的形势依然严峻。总体而言，它并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化：它仍是该省主要的经济支柱，人们对工作的不稳定和工伤事故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年，人们都会纪念在 1970 年 7 月 21 日那天被警察杀死的那三名工人。按照传统，那天格拉纳达不会开展建筑工作，大多数工会会借此机会开展活动，通常是在著名的拉卡莱塔（La Caleta）广场的纪念碑处，在他们被杀害的地方旁边举行集会。如果仔细观察纪念碑的浮雕，我们会看到这上边的工人举着标语，上面写着 CCOO（工人委员会）、UGT（工人总同盟），甚至是 CGT（总工会）<sup>106</sup>。这些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当时，格拉纳达既没有工人总同盟，也没有类似总工会的东西。1970 年，他们也没有举起带有非法组织简称的标语，这主要是因为泥瓦工自己永远不会允许这样做。这些是与真正的历史不相关的错误。在纪念碑的另一侧，我们能读到大写的“民主”字样，但我们知道参加 1970 年罢工的成千上万格拉纳达泥瓦工并不是在政治口号下动员起来的，他们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才起来反抗的，并且他们成为了自己的斗争中唯一的主角。在此

---

<sup>106</sup> 总工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CGT）是 1979 年由全劳联内部主张参加工会选举的一个派别脱离全劳联后建立的无政府主义工会，目前是西班牙第四大工会组织。——中译者注

举中有三人丧失了生命。他们的名字是：来自马拉赛纳的 22 岁男孩，安东尼奥·韦尔塔斯·雷米希奥（Antonio Huertas Remigio），来自阿米亚（Armillá）的 24 岁的曼努埃尔·桑切斯·梅萨（Manuel Sánchez Mesa）；还有 43 岁的五个孩子的父亲，克里斯托瓦尔·伊巴涅兹·恩西纳斯（Cristóbal Ibáñez Encinas）。他们用血写下了格拉纳达历史的这一章。

2007 年于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工人斗争纪念碑浮雕

# 洛卡罢工，反抗社会契约的自我组织

阿尔贝托·阿隆索·奎诺斯

## 对这场冲突的简介

1976年在加瓦，发生了西班牙过渡时期以至工人运动历史上一场重要的冲突：洛卡工厂的工人斗争。在长达96天的时间里，这座卫浴工厂的工人们为了声援被解雇的同事发起了罢工，为工人运动提供了七十年代自我组织最重要的典范。

这场斗争与它发生的地方，加泰罗尼亚区的下洛布雷加特（Baix Llobregat），也与过渡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这场罢工的政治意义非常鲜明：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正在不断加剧。

洛卡罢工发生于1976年11月至1977年2月。它是与新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展开的。国家为了进行政治改革，颁布了新的法令，在1976年11月18日由西班牙议会批准，并于12月15日在公投中通过。这场罢工还在1977年1月至4月间，见证了政党和工会的合法化。洛卡工人的命运与这一政治背景、与弗朗哥政权跟温和反对派之间的协议以及态度，始终紧密相连。事实上，在这些协议谈拢之前的几个月，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直到那时，反对派的主要政治领导还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sup>107</sup>。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最大的组织是

---

<sup>107</sup>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简称“统社党”，1936年7月23日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

工人委员会，它同样也由统社党领导。因此，当这两个组织与体制内的改良主义派别走近时，它们的言行和斗争方式也变得温和了。实际上，统社党和工委会转向了，它们反对群众活动，将其瓦解并纳入社会秩序，还将体制外的与集会的斗争方式宣布为非法活动<sup>108</sup>。从那一刻起，以往的罢工就被遗忘了。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彻底变成了通过武力手段来制服工人的斗争。

在谈判与协商的背景下，巴塞罗那工人委员会——西共-统社党的人在其中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领导人位置——在1976年7月举行的集会上，一致同意将其转变成统一的工会，通过了工人委员会转向社会政治运动方向的提案<sup>109</sup>。它在语气上的变化显而易见：“罢工是不受欢迎的，它扰乱了公共秩序和共同的经济与集体生活<sup>110</sup>。”罢工应当从斗争的手段变为纯粹的示威。参与协定的工会（工人委员会、工人总同盟和工人工会联盟）开始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便为将来的选举做准备。同时，在工人阶级内部关于工会应当是唯一的还是多元化的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多元化的工会能够满足工人阶级的历史需求。工会与政党已经为了夺取势力范围而开始了争斗，为此它们需要稳定的社会气氛，这样才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重大要求被放在一边，并且被遗忘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政府采取的经济措施，即允许随意解雇（第35条）、生活成本的

---

（Partit Comunista de Catalunya，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Partit Català Proletari）合并而成。该党是共产国际成员。共和国被颠覆后转入地下，1977年恢复合法地位。——中译者注

<sup>108</sup> 《进步》（Avenç）第207号，《过渡时期的西班牙极左翼》（L'extrema Esquerra espanyola durant la transició），1996年10月——原注

<sup>109</sup> 何塞·安东尼奥·迪亚斯（José Antonio Díaz），《工人委员会中的内部斗争》（Luchas internas en las comisiones Obreras），巴塞罗那，布鲁盖拉（Bruguera），《弗朗哥时代系列》（serie La era franquista），1977年版——原注

<sup>110</sup> 胜利（Triunfo）出版社，1976年12月18日——原注

极大提高、限制工资水平……这些都是改良主义工会（工委会、工总和工盟）没法正面回答的问题。改革需要代价，很显然，只能是工人阶级来付代价。

“洛卡是一场重大的意外，是未经许可就在下洛布雷加特的心脏中出现的‘顽疾’。本来按照传统，那里的无产阶级都会支持主流的工委会的策略。”<sup>111</sup>”

洛卡的罢工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工人冲突，如果是这样，那就无法理解声援罢工委员会成立时在群众中间激起的巨大同情，以及它在那些用各种手段孤立和镇压工人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中间引发的恐惧。反对垂直工会<sup>112</sup>和工委会的干涉，标志着洛卡斗争的开始。在洛卡对现存法律、政治改革进程、社会契约、未来的政党与工会制度提出质疑时，罢工已经被主流政治视为了过激的、不负责任的野蛮行为。改良主义向工厂、社区和街道发起攻势，为的是让这些地方脱离政治舞台，再将政治活动的行使权交到职业人士的手上。洛卡罢工扩大了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进程，因为它是在议会制度到来、工人阶级遭受分裂与失败之前，也就是说，在工厂从政治舞台上被赶出去之前，工人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最后堡垒。工人集会与工会之间的对抗，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的对抗，它们不仅是工人组织，同时还是

---

<sup>111</sup> 赫罗尼莫·卡萨索拉（Jerónimo Cassasola），《洛卡大罢工》（La gran huelga de Roca），加瓦，2005年，未出版——原注

<sup>112</sup> 由于工人和雇主都包含在内，民团工会（CNS）或垂直工会是独裁统治时期的唯一工会，当然这是强制的从属关系。在1966年举行了首次“自由的”工会选举。为此，工人委员会决定用打入的方式来控制工会。这种控制比起理论而言更是实践上的，并且在七十年代期间，人们始终在抵制选举、要求解散民团工会并将权力交给工人集会。——原注



社会组织。在工会<sup>113</sup>（除了全国劳工联盟<sup>114</sup>以外）和政党都捍卫基于代表制的官方选举制度的同时，工人只承认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自始至终只承认集会上做出的决定。

这场冲突以历史时刻为背景，但地理环境对它也相当重要。下洛布雷加特位于巴塞罗那南部，它由于半岛南部农村人口的迁入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上百万的劳动者来到这个工作条件不稳定、缺乏福利和基础设施的地方，来找一份强过农村生活的产业工人的活。在这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有几家大型公司：拉福尔萨（Laforsa）、西门子（Siemens）、苏威（Solvay）、艾尔莎（Elsa）、拉塞达（La Seda）……新的移民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造成了大量冲突，其中就包括使得这个地区名声大噪并且获得“巴塞罗那红腰带”称号的1971年总罢工。因此，该地区成为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社会党加泰罗尼亚支部）和它的群众组织工委会的重镇。在七十年代中期，工委会的领导人囊括了当地所有行业的工会职务。资本在协商结束独裁统治的需求中，得到了改良主义这个至关重要的盟友，而工委会也转向了新方针。这样一来，该地区就成为了新社会契约的试验品。尤其是在当地的大公司（苏威、西门子……）中，弗朗哥国家允许了协商谈判。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这一协定（1977年《蒙克洛亚协定》）正在全国落实的历史关键时期中，在它的正中央爆发了洛卡的冲突。

---

<sup>113</sup> 全国劳工联盟是工会中的例外，它始终站在了罢工者及其组织方式的这一边，它提供了工会上的帮助并让工人的代表能够出国。由于其无条件的支持，尽管全劳联没有在洛卡斗争中扮演主要角色，它还是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似乎是对其革命工会路线的肯定。——原注

<sup>114</sup>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也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 工厂简史

洛卡工厂位于巴塞罗那的加瓦和比拉德坎斯镇（Viladecans），与它在 1917 年的所在地相同。这两个镇子的所有社会与经济生活都将卫浴工厂作为轴心，工人的收入完全依赖于经济活动。洛卡家族在弗朗哥国家中享有经济特权，拥有实行垄断的条件，并且在官商勾结的地方政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六十年代，下洛布雷加特地区接收了大量工人。扩张中的公司不愿冒失去劳动力的风险，于是在政府和银行的帮助下，当地建立了“洛卡镇”这个社区。这里的住房只有最低限度的居住条件，租金低廉但入住条件是要有雇佣合同。在洛卡不仅建造了房屋，还建起了包括学校、医院、娱乐中心、剧院和文化中心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所有这些设施都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它们服从的当然还是公司的利益：

“住户被迫在经理要求加班时不能进行抗议，且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公司安排。”<sup>115</sup>

这些公司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人染上硅肺的现象也很普遍，他们还指责公司和巴塞罗那医院隐瞒他们的病情，说成只是普通的流感或支气管炎。严酷的条件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导致了最早一批的工人斗争，但最后那些工人都被解雇了。刚开始，觉悟的工人只是少数，但是公司的强硬态度让想要争取更有尊严生活的人变多了。主要的冲突发生在 1969 年、1971 年、1975 年和 1976 年 2 月。而在 1976 年持续了 42 天的斗争中，出现了新型的组织形式：代表可以随时撤换的群众集会的自我组织。

---

<sup>115</sup> 同上，见赫罗尼莫·卡萨索拉——原注

最初，1976年2月的冲突是在由工委会推动和领导，并在协议谈判的热潮中产生的。在洛卡镇的教堂<sup>116</sup>中，年轻的工人们提出要摆脱民团工会和其他工会，让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是的，工人们最后被打败并返回了工厂，但是这场罢工的过程却值得探讨。他们在这次罢工中吸取了经验，并且得出了一些结论：法律手段、和平游行、由民团工会组织的投票活动以及与当局进行的谈判都是没用的。在工人们甩开工会之前，最富战斗性的工人已经在罢工中崭露头角，正是他们推动了后来一系列的斗争。

从二月罢工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为人们建立新的组织提供了力量。在食堂里，工厂内部头一次对这一问题开展了讨论。1976年6月，这些讨论开始有了成果。在无提名选举中，各部门选出了43位代表，然后由群众集会表决通过。由于工厂中有着“双重政权”，即在工人中间同时有群众集会与民团工会两方的代表，集会就要求工会联络员提出辞职，他们在九月也都辞职了：

“此外，我们在三月罢工中还意识到，只要敌人还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们选出自己的代表，将一切权力归于群众集会，同时为了瓦解工厂里垂直工会的组织，我们开始了自我组织的过程。为了确保我们运动的成功，避免在身后受到攻击，就必须要求所有和民团工会扯上关系的人辞职。然后，要用洛卡群众集会取代它。”<sup>117</sup>

新的洛卡工人组织向公司和劳工代表写了一封信，告知工会的成

---

<sup>116</sup> 当时正好发生了维多利亚（Vitoria）工人被杀的事件，这起事件无疑影响了工人们和他们未来的组织。——原注

<sup>117</sup> 出自工人自己写的未经出版的书，材料由“圈子”集团（Colectivo Ronda）提供。——原注

员都辞去了职务，新的工人组织和新的工人代表已经产生。这个新的组织基于《推动洛卡暖气片公司工人工会建立的基本方案》成立了，其中宣布这个工会是唯一、自主、独立和民主的。工人集会是这个新组织的中央机关，工人必须服从它的决定。它的代表是可撤换的，选举和换届当然也由集会决定。方案里明确指出，工人的要求不仅涉及改善经济条件与劳动条件，还谴责了政府为了削弱工人运动而将其分割为不同工会的行径。对于工会应当统一还是多元化的争论，它的回应也是很明确的：

“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因此应当建立一个工会，让工人运动的所有倾向在里面共存。”

于是，工人们建立了一个由 15 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目的是协调和执行集会的决议，并且为了“让工作带有尊严”的目标又成立了不同的委员会。工人们认为这是唯一能够代表所有不同派别和思想的工人，同时又不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组织，而且作为决策机关的集会不可能受到操纵。

集会同样还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新协议的谈判。但是，公司管理层拒绝与这些代表谈判，借口是他们未得到劳工代表的承认。于是，工人们在 9 月 27 日发起了 24 小时罢工，那天正好是弗朗哥时期最后一次枪杀民众的周年纪念日。在那次罢工之后，管理层才认识到，它只能跟这个委员会进行新协议的谈判。由工人的集会选出的代表，首次得到了公司的承认：

“第一场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们在群众集会上的自我组织，它跳过了所有官僚和法律的程序。<sup>118</sup>”

---

<sup>118</sup> 同上，见赫罗尼莫·卡萨索拉——原注

## 冲突的开始

那次胜利之后，工人组织又增选到了 60 名代表，以便在所有部门里都有一位集会代表。代表们起草了新协议的要求：由



洛卡工人集会

原本的 33 条减至 24 条。在这些要求中，不仅包括了对经济和劳动条件的要求（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重新分配、每周 40 小时工作日加上假期），还包括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要求，例如要求所有被解雇的工人回来上班、公司要负责工人子女（4 到 16 岁）的教育、给予工人无需任何程序就能举行集会的权力……

公司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只愿意每周增加 1400 比塞塔的工资。工人人们的回应是在 10 月 28 日发起新的 24 小时罢工。

作为示威活动的结果，工人们收到了第一份警告：在工人举行集会的地方（公司的货运站台），出现了基督王游击队<sup>119</sup>的巨幅涂鸦，上面威胁要杀死参加谈判的五名代表。由于这幅涂鸦，工人们指控公司方面肯定和极右翼组织有勾结。

随着谈判的破裂，事态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公司在 11 月 8 日开除了一名参与非法罢工，并且鼓动其他同事支持 10 月 28 日罢工的代表。集会的代表要求公司管理层解释，经理加西亚·布（García Bou）的答

---

<sup>119</sup> 基督王别动队（los Guerrilleros de Cristo Rey），1968 年在西班牙成立的一个极右翼准军事组织，支持弗朗哥政府，大肆迫害工人运动。1978 年西班牙宪法颁布后走向衰落，80 年代初解散。——中译者注

复是“现在才开除了一个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开掉 25 个人<sup>120</sup>”，25 人就是所有代表的人数。最后，经理还重复了一遍他的警句，“生产，生产，生产，纪律，纪律，纪律”。面对这样的挑衅态度，工人们把发生的事情传遍了工厂。他们离开了工作岗位，都跟着叫作“蛇头”的传消息的人走了。局势一触即发，其中有一个场面：当一位专家威胁工人时，工人们把他扔到了装煤的推车上。在几位代表的制止下，才没发生更多的这类事情。工人们临时举行了一场聚会，决定发起罢工，直到公司把被解雇的工人请回来。在各自举行了集会之后，夜班和白班的工人也加入了厂内的无限期罢工。

同样在 11 月 9 日那天，警察进入了工厂，并在加瓦街头用暴力驱赶工人。街上的所有人都成为了警察镇压的受害者。而街上的工人们在警察面前毫无畏惧。当天下午，一些代表去了康奈亚（Cornellá），想找帕蒂布劳（Pati Blau）的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令他们意外的是，工委会的领导们不仅拒绝与他们对话，甚至还找借口把他们赶走了。从一开始工人就很清楚，裁员就是公司对工人组织的攻击。如果工人默许了它，那么他们的运动就完了：

“当选的代表接受了我们全体赋予他们的职责，他们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肩上担负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如果有谁被金钱收买或者帮洛卡的管理层说话，那他就会被所有人唾弃，而他们唯一的力量是与领导层的对抗中所获得的群众的支持，正是他们的同事们决定了斗争的方向。<sup>121</sup>”

冲突的头几天里，媒体指责激进的工人离开了工作，对设备和锅

---

<sup>120</sup> 出自那场会议上工人的发言代表桑切斯·巴哈雷斯（Sánchez Pajares）的说明。  
——原注

<sup>121</sup> 同上，见“圈子”集团——原注

炉造成了损害。事实上，锅炉的损坏是罢工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最后，法官委托巴塞罗那工业技术学院进行调查，结论是公司自己操作失误，导致锅炉受损。调查结果显示，锅炉在几个月前就该更换了，但公司为了保持生产而没有这么做。尽管受到无端的指责，工人从不觉得自己该对此负责：

“我们让炉子工作时，公司本来可以避免它的损耗。我们没有义务来照看公司的财产。如果管理层认为这是我们的义务，那好吧，那就让我们照看你们的所有财产吧，还要包括你们的银行户头！”<sup>122</sup>”

1976年11月10日，在被赶出工厂的第二天，工人们在工厂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冒着大雨举行了第一次罢工集会。警察没有警告就包围了他们。在最初的混乱中，数名工人遭到了暴力殴打。为了自卫，一些工人开始用石头反击、制作投石索（onda）、推倒电线杆搭起街垒阻挡了警察的前进。由于工人中的很多人来自农村，他们都能够熟练使用投石索，这也是他们能抵抗住警察一个半小时的关键。警察先是撤退，之后又回来用机枪往镇上扫射。子弹倾泻在了建筑的外墙上、路灯上，甚至射到了房间内。事后收集到了200多枚不同大小的弹壳。在这一系列的冲突和警察的严厉镇压之后，许多工人发誓自己再也不会被打得束手无策，也再不会无力自卫了。

11月12日，洛卡罢工和参与协定的工会（工委会、工总和工盟）号召的总罢工撞在了同一天，这是对新政治制度协商进程的示威。

“12日，为了缓解西班牙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局面，民主反对派的主流工会组织了政治活动……它们谈到了社会契

---

<sup>122</sup> 《世界报》（El Mundo），1976年12月11日，第1903号——原注

约，想要将‘独立’改为‘自主’、将‘武装斗争’改为‘协商’、将‘统一工会’改为‘工会自由’……在这一天里举行了一场和平与受控制的罢工。<sup>123</sup>”

在整个地区内，群众的动员受到了工委会的控制，但与此同时，洛卡工人瘫痪了加瓦和比拉德坎斯。现在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比如公交），只能出动军队了。从早上开始，这座镇子就被国民警卫队包围了。工人们用街垒堵住了通往镇子的路，只留下一条通行的道路并对它严加看守。冲突持续了一整天，共有 40 人被拘捕，其中 8 人被移交军事法庭。

### 洛卡的自我组织

在最初的几天之后，工人们意识到这场冲突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们有必要为了抗争而组织起来。于是，工人们建立了提供保障和宣传这场斗争的委员会。

主要的委员会分别是斗争扩展委员会、罢工基金委员会、书记委员会、自卫委员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和进行内部协调的内务委员会。所有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每天都要接受群众集会的监督。

为了将罢工扩展开来，工人们建立了一个后援委员会，称为斗争扩展委员会。为了避免工人在媒体的煽动下被社会孤立起来，他们跑遍了工厂和街区。就这样，工人们一点一点地打破了封锁。洛卡工人的话语和斗争，从工厂扩展到了邻里协会、学生团体和所有对工人的斗争与组织方法表示同情的组织中。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努力和很多市

---

<sup>123</sup> 同上，见“圈子”集团——原注



民的声援运动，支持洛卡自主斗争委员会诞生了，它填补了政党和工会的空白。

该委员会制作并分发了超过 100,000 份告示、70,000 份传单和 15,000 张海报，以声援洛卡的罢工者。他们不仅在西班牙境内开展活动，还走访了多个欧洲国家。23 日，让洛卡工人得以发声的第一份报纸出版了，到最后总共出版了六期。在这份刊物中讲述了冲突是怎样开始的，批判了工委会和工盟的立场：对工人来说，工委会和工盟对这场冲突的看法与公司无异。

另一方面，经过了 15 天的罢工，因缺少经济来源，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要撑不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人组织了一个负责罢工基金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分为三个下属委员会：接收经济援助委员会、需求调查委员会和资金分配委员会。工人及其家人不仅从工厂募集资金，并且还跑遍了广场（人们至今对那次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的集会印象深刻）、超市、剧院、电影院、地铁、公路和音乐会……

书记委员会负责收集报纸上有关洛卡的消息，对其进行分析，并通过写信或者直接联系媒体，把这场冲突的事实告诉公众。工人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工人和公司不一样，后者有能帮自己讲话的媒体。该委员会及其工作和整个洛卡的斗争一样，不断陷入了被孤立的状态。此外，在国民警卫队对镇上集会进行了第一次袭击之后，工人发誓自己不会再光挨打了，一定要反击。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小组来保护参加示威和集会的工人、代表及其家人，这些人都是本地和外地来的法西斯团体袭击的目标。于是工人们组建了自卫委员会。在无法袭击代表的情况下，法西斯团体无数次地把该委员会的工人当成了宣泄怒火的目標。在他们的努力下，代表们始终受到保护，每晚都在委员会选定的房屋内睡觉。

为了理解这些措施，我们得先讲一讲，那段时间躲在雇主身后、为雇主提供支持的法西斯恐怖主义的强大势力。极右势力不断对工人

发动袭击：威胁、殴打（很多工人因此进了医院）、企图抢走罢工基金、袭击工人代表，还好几次企图用炸弹袭击工人、工人家庭或街区里开的小商店。我们应当牢记，极右团体——包括基督王别动队和三 A 团<sup>124</sup>和其他一些组织——在这场冲突中（就像在其他冲突中一样）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它们在过渡时期内共造成数十人死亡。所有这些团体都和“新力量”<sup>125</sup>有关，它们是由在本国（尤其是意大利和南美）受到通缉的流亡者组成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无论如何，它们不是什么固定的组织，只是极右势力犯下罪行的伪装而已。后来由其中的几名武装人员供认，它们的活动是由特勤部门资助和协调的。这些供词也证实了洛卡工人的说法，即国民警卫队指导和保护了这些极右团体。

无论如何，尽管警察禁止举行集会，工人们还是在城镇、教堂或者山上开了会。工人还在警察骚扰最频繁的时候，设下哨卡阻止他们前进。

自卫委员会由最年轻的工人组成。但是，在镇上的一些战斗中，妇女和工人的孩子们也都参加进来了。

“（对警察的镇压）我们的回答只有一个：有组织的自卫。

国民警卫队的进攻教会了我们，要建立街垒来阻断通往镇子

---

<sup>124</sup> “三 A 团”（La Triple A），又名天主教反共联盟（Alianza Católica Anticomunista），是巴斯克地区的一个极右翼准军事组织，1977 年成立。过渡时期“3A 团”在政府授意下大肆迫害巴斯克人，暗杀巴斯克民族主义领导人，制造大规模恐怖事件。1982 年解散。至于缩写明明是 ACA，这里为什么是 3A，也许是受到了臭名昭著的阿根廷反共联盟（La Alianza Anticomunista Argentina, AAA）简称“三 A 团”（Triple A）的影响，后者在七十年代阿根廷制造了大量暗杀和绑架事件。——中译者注

<sup>125</sup> 新力量（Fuerza Nueva），1976 年 10 月 19 日在西班牙成立的一个极右翼政党，鼓吹天主教弗朗哥主义。过渡时期大肆迫害左翼工人运动及学生运动。1982 年国会选举失利之后，于 11 月 20 日解散。——中译者注

的道路，烟雾弹和子弹教会了我们用石头进行反击，而对我们的代表进行的袭击，教会了我们组织纠察队来保卫我们的家园。<sup>126</sup>”

最后，法律咨询委员会尽力通过法律的手段让被解雇的人能够回来。委员会的成员与“圈子”集团（Col·lectiu Ronda）的年轻律师们建立了联系，这些律师投身于洛卡工人的斗争，并为被解雇者夺回工作而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些律师在为罢工工人辩护时所遇到的困难。我们被解雇同事的案子开庭时，在马德里发生了阿托查街谋杀案，九人受了致命伤，包括六名为工人辩护的律师。这场袭击是一支极右翼的突击队干的，同时凶手和警察的关系又非常密切。

### 罢工在延续，自主组织在扩展… …

日子一天天过去，公司还没有同意让被解雇的同事回去。声援活动和工人的自主组织发展壮大。事实上，人们对这场斗争，对斗争所捍卫的直接民主的同情只会不断增加。

但是，公司仍然拒绝谈判，并声明被解雇的人（其中包括所有的代表）不可能再回去上班。工会也参与了公司的阴谋，派出了最得力的干部到罢工中去，企图指挥罢工或者至少是挫败它。同时，比如卡雷斯·纳瓦雷斯<sup>127</sup>（工委会）和卡雷斯·拉涅（工总）等的工会领导

---

<sup>126</sup> 加泰罗尼亚国家档案馆，《洛卡罢工》，一位代表的讲话，624号录音，1976年12月14日——原注

<sup>127</sup> 卡雷斯·纳瓦雷斯·图尔莫斯（Carles Navales Turmos，1952年？月？日——2011年6月11日），玻璃工人，早年加入西共（红旗）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74年在加泰罗尼亚领导了玻璃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同年被捕。1977年以后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晚年加入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在工会杂志工作。2011

人试图说服工人回去工作，但他们的做法没能奏效。

媒体不断在宣称洛卡的工人组织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暴力和混乱。主流工会也表示，只有它们才是走出冲突的唯一途径。

工人和这些主流工会之间的差别，就跟他们各自的工人与政治组织在结构上的差别一样明显。工盟和工委会<sup>128</sup>尝试说服工人，复工对于谈判非常重要，但工人还是不停地重复这句口号：“要么全走，有么全留”。主流工会拒绝承认工人的举手表决结果。工人们则对前几次罢工中的投票结果表示怀疑，拒绝改变自己的表决方式。

在12月1日，工人委员会的E·赛尔丹（E. Cerdan），M·萨拉斯（M.Salas）和卡雷斯·纳瓦雷斯等人与洛卡工人进行了谈判。参加谈判的是由未被解雇的工人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四位代表，以及该地区的六位工会领导人（他们自然都是工委会的人）。洛卡工人拒绝让工委会掌控谈判<sup>129</sup>，后者则辩称道：

“在我们的地区进行的斗争，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在拉福尔萨、伊比利亚矿车、堂波托（Tombauto）等等的罢工中，我们在对话中保持着灵活性，正是我们的人代表了那些公司的工人进行谈判。”

工人的回应是，不允许他们介入该地区任何工厂中的谈判，其他工厂里的任何人也不行。此外，工人还指责工委会和雇主在背后达成了秘密协议，谈判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另一方面，1月14日在康奈亚（当地标志性的工人阶级中心）举行的声援被解雇工人的抗议中，工人和主流工会之间爆发了新的冲突。

---

年逝世。——中译者注

<sup>128</sup> 虽然工总在洛卡有一位代表，但它的组织在当地几乎不存在。——原注

<sup>129</sup> 这些工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在弗朗哥主义的民团工会中也担任职务。——原注

这场抗议活动的发起，曾得到了各个工会和组织的支持。在开始前不久，工盟和工委会退缩了。和罢工中的其他许多时候一样，全劳联是唯一支持示威的工会。但在开始之前，工人及其家人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年轻工人再次挺身而出。第二天，工人再次展示了警察向他们射出的子弹，而统社党等组织却反过来斥责工人，说他们暴力和激进。由于这些冲突以及工人为了自卫而组织的纠察队，工盟和工委会拒绝召集它们的成员去声援洛卡，而那天正好是开庭的日子。

因此，所谓的“民主”反对派就是这样背对工人的。反之，许多其他反对弗朗哥国家重组的社会组织对声援活动采取了公开的支持态度。自主或自我管理不仅为工人阶级，而且也为学生、妇女、商人以及银行雇员等反对独裁的人们打开了道路，给国家的未来政治规划构成了严重威胁。

洛卡罢工引起了这些人的极大同情，并鼓舞了其中的许多人。许多时候，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学生们都会前往加瓦和比拉德坎斯，为的是能够参加集会，并从内部观察工人们的组织运作情况。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方法用在了自己的公司或组织里。

值得一提的还有妇女们在罢工期间的的作用。与其他罢工不同，妇女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斗争的最面前：在冲突和抗议中，她们为了防止工贼进入工厂而组成了纠察队，帮忙建立援助基金，举行妇女自己的集会并行使自己的发言和投票权。

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是工人的女儿，她们非常了解公司：“这家公司曾经粉碎了我们的父母，现在也粉碎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那我们



洛卡工人罢工

的孩子也会被它粉碎。<sup>130</sup>”在以前由工委会-统社党领导的冲突中，妇女们都扮演了消极的角色，做决策的都是男人，而在这次罢工中，妇女们组织起来并做出自己的决定。第一次妇女集会在11月21日召开，在它的声明中明确表示，男人在外战斗，女人只能留在家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这场战斗同样也是她们的战斗。

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发起了声援活动：学生、银行业者、医生、演员……其中最重要和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在斗争期间过个好的圣诞节而发起的收集礼物的活动。的确，1976年的圣诞节相当艰苦。各个组织（法国人民援助（Socors Popular Francès）——这个组织在跨境运送玩具时遭遇了很多困难、全劳联、自由女性（Dones Lliures）、圣安德列乌的自由集团（Col·lectius Llibertaris）、波利格诺波尔塔（Polígono Porta）与格拉西亚（Gràcia）还有博布列赛科（Poble Sec）的邻里协会、以及巴塞罗纳电台和青年电台）决定为工人子女收集玩具。最后，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玩具，媒体也可以证实工人们在组织这场活动中的良好表现。

从那时起，镇上教堂的教区牧师也开始帮助工人。除了分发罢工基金会筹集到的资金，还在教堂内举行了多次集会。

巴塞罗纳医学院也组织起来，为那些失去社会保障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医疗服务。教师们组织了儿童节，提供了日托服务，以便父母能够继续战斗下去，至少是减轻一些他们照顾孩子的压力。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情这场罢工。对于一些受其影响的居民来说，这场冲突意味着在街头发生暴力以及弗朗哥国家的“社会和平”的终结。此外，罢工还影响了外来工消费带动的商业繁荣。罢工意味着他们的经济利益受损。据计算，罢工期间共有3亿比塞塔停止了流通，相当于罢工期间工人的未付工资。

---

<sup>130</sup> 同上，出自加泰罗尼亚国家档案馆《洛卡罢工》第611号录音——原注

## 冲突的结局

在这样的气氛下，审判在劳工法院举行。这时发生了整场罢工中最激烈的讨论。在审判期间，工人们讨论了被解雇的工人是否应该出庭，还是说因为弗朗哥国家的法律不过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闹剧，他们就应该拒绝参加审判。在工人们自己写的话中可以读到：

“审判我们的应该是工人阶级。我们不会屈服于这样的劳工法院，你们为的只是老板的利益，听从的只是这个国家的独裁法律。<sup>131</sup>”

大多数代表（33 位代表中的 19 位）拒绝接受法官的判决，但集会表决赞成参加审判。最后代表们接受了参加审判，但是他们让法官知道，这是由集会的意见决定的。在代表们中间产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见分歧。

审判是在严密的安保之下进行的。就在审判开始的同时，即 1 月 20 日、21 日和 22 日，声援洛卡工人的运动开始了。根据国民警卫队的统计<sup>132</sup>，在那些天里，该地区的工厂总计有 17000 名工人停下了工作。

同时，警察与洛卡工人斗争的支持者在巴塞罗那街头发生了数次冲突：几辆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被烧毁，西班牙信贷银行挨了四枚莫

---

<sup>131</sup> 同上，出自“圈子”集团——原注

<sup>132</sup> 国民警卫队只计算了 17 家停工的工厂。根据工人和报纸的说法，停工的工厂有 35 家。——原注

洛托夫鸡尾酒并燃起了大火。证券交易所等其他机构也遭到了攻击。附近城镇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洛卡的六名律师为审判做好了准备：要让法官驳回解雇工人的决定，并让公众了解到一直以来被媒体操控和隐瞒的、有关这场冲突的真实情况。在审判的第一天，工人们的律师把公司对谈判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告诉了法官。法官随后推迟了判决，让双方坐下来进行谈判。公司向被解雇者开出了条件，而被解雇者告诉法官：他们在做出回应之前，必须先经过集会的表决。尽管法院试图让他们理解，判决不能由第三者进行，但还是接受了工人推迟审理的要求，以便让他们向集会征求意见。

集会于 25 日举行，超过 3000 人参加；它的决定是明白的：“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在重新开庭的前一晚，即 28 日，华金·桑切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拘捕了，他是在冲突开始的那一天与公司进行交涉的代表，也是出庭的关键证人。工人的自卫委员会阻止了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2 月 1 日上午，法院宣布判决：公司必须用与以前相同的职位和条件将所有被解雇的工人重新雇回来。

判决还将这场冲突定义为：“劳动秩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生产者甚至占领了工厂。”其中还总结了工人进行自我组织、代表的选举以及协议谈判的经过：“当然，资方清楚所有代表的名字，包括今日在场的工人代表”以及资方拒绝进行谈判，甚至开除了还在休假的工人，“这些代表与其他参与此次罢工的工人，服从的只有工人们在集会上做出的决定。”

然而，尽管判决要求被解雇的人重返岗位，但洛卡斗争本身所反对的第 35 条（允许随意解雇）却让公司能够通过简单的赔偿就把工人们再次赶回街上。虽然上诉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雇主进行这样的报复，集会决定不让工人复工。



无论如何，即便考虑到公司的手段和第 35 条的威胁，还是有些人在考虑是否应该复工。这样的情况让一部分人想要退出，并且鼓励了公司“用饥饿击败工人”的决心。于是，通过在整个罢工期间都在试图说服工人回去工作的工委会地区代表卡雷斯·纳瓦雷斯，工人得到了一个复工的条件：只要他们回去工作，公司就不会解雇或者报复他们。工人的处境非常艰难，失去这八个月工资，对病人和退休工人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使他们陷入了动摇。

公司给出条件的最终期限是在 2 月 10 日。9 日，比拉德坎斯的体育中心举行了集会，超过 3000 人参加。当然，这场集会得到了官方的许可，因为当局也对群众活动产生了兴趣。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工人投票支持复工，绝大多数人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并将其视为公司和卡雷斯·纳瓦雷斯的勒索。

10 日，即使下过了最后通牒，上班的只有包括管理层、保安以及办公室文员在内的几百人。看到这样的结果后，公司决定将留给工人的答复时间延长 24 小时。

在代表中间再次出现了分歧<sup>133</sup>。支持复工的代表说，这是工人保持团结的唯一方法，而且可以对希望制造工人分裂、让工人不经集会批准就复工的公司和雇主，保持胜利的姿态。经过公平的投票之后，他们决定回去工作，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取得胜利，斗争将在回到工厂后继续进行。

在镇上的最后几次集会中，普利埃格（Priego）代表对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做了充满激情的演讲：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不断实现更加困难、更加不可能

---

<sup>133</sup> 原文为“Por primera vez”即首次，但前文提到“在代表们中间产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见分歧。”（“Se trató de la primera división importante de los delegados.”）故此处译为“再次出现了分歧”。——中译者注

的目标。不管是公司还是政府，它们都不愿意给工人阶级哪怕一点好处。他们和主流工会勾结在了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愚弄我们，他们不允许我们集会，更不要说像我们洛卡一样坚持了整整 96 天的集会。我们集会的代表很清楚，我们无法违背集会的决定。当公司不想和任何人谈判时，它把眼光转向了我们的代表，但这样的集会是不能被收买的〔……〕绝不要将你们的决策权交到任何代表的手中，因为没有任何人，无论他多么合法、多么诚实、无论他又是怎样的一名战士，也就是说，没有人能永远代表群众集会。工人阶级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必须由自己来行使权力。”

11 月 11 日早上 7 点，在警察的包围下，工人们举行了最后的一场集会。工人和警队之间保持着紧张的状态，西班牙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下了的画面告诉了全国观众，洛卡在这一天里复工了。同时，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卡雷斯·纳瓦雷斯就在工厂的大门口看着工人回来上班。他要确保工人回来工作，确保罢工是被瓦解了。数年后，一位研究工人委员会的历史学家称赞了卡雷斯·纳瓦雷斯所扮演的角色：“经过了多年，他在摆平那些在加瓦的洛卡罢工中蛊惑人心的煽动者时表现出的勇气，依然使我印象深刻……<sup>134</sup>”

复工后，尽管公司在罢工期间曾表示过，不会同任何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工人进行谈判，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着。工人回去工作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代表们最终争取到让工资涨了 29%，超过了《蒙克洛亚协定》规定的 22% 的限制。

但是，罢工最后两天的故事以及本文的收尾，应当重新交给工人们。因为历史学家的话很难超出他们的解释。

---

<sup>134</sup> 伊格纳西·里艾拉 (Ignasi Riera), 《卡雷斯·纳瓦雷斯》, 《Avui》, 1984 年 2 月 2 日, 第 12 页——原注

“下午四点半，一千多名工人离开了镇子，前往山上举行集会。代表们站在一块巨石上。所有人都站着并保持沉默，不耐烦地等着轮流发言。工人委员会的领导卡雷斯·纳瓦雷斯也在场，一如既往地劝说我们回去工作。

纳瓦雷斯知道怎么讲话，他在自己曾经领导的许多罢工中学了很多，但在以前，那会还没有什么“野蛮的罢工”和“文明的罢工”，而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并且所有的罢工都遭到了镇压。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很无助。我们感到无助，感到被蔑视和愤怒。这是被压迫者的被蔑视、愤怒和无助。纳瓦雷斯，你早就知道公司不愿意谈判了！你知道公司不会和我们的集会与代表妥协！你在罢工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你和你那帮人，还把我们叫作‘不受控制的团体’、‘极左先锋队’和‘煽动者’。

我们大家都感到被蔑视了：我们让你赢了这一出。你们就高兴去吧。但是你们赢得的不过就是这些。战斗是漫长的，时间也不等人。你们赢了这一出，但要知道战斗还在继续：你们决不能让我们低头；你们绝不能再挫败我们，再操纵我们，再愚弄我们了。

我们从山上下来时，已经晚上了。我们向比拉德坎斯，向镇子，向加瓦的方向走去。事情不能这样结束。事情不会这样结束。

现在他们还给了我们举行集会的‘许可’！这帮人就像秃鹫围着尸体一样，围着我们。这次我们是在体育中心开会的，去了三千人。

但我们没有失去信心，我们没有向公司的24小时通牒投

降。我们没有被打败！集会的回答是继续罢工。2000多名参加集会的人举起拳头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回去干活，但我们要和自己的代表在一起，公司绝不能让我们低头。

第二天，工厂被警察包围了。他们这样做，是要让不尊重集会决议的人进来。他们想让我们跟蚂蚁一样排成一排，一个一个进到工厂里面。

他们没能得逞。但他们手中握有很多武器。

同一天里，在镇上召开的集会上通过了撤退的决定。我们会回去工作，但我们所有人都要进行示威，告诉老板们战斗仍在继续，我们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所有人都集中在镇上，集会带领我们游行，我们抬起了头，把拳头高高举起。我们和走在前面的代表一起高喊：团结！团结！高喊：你们是法西斯，你们是恐怖主义者！喊出我们的仇恨和我们的蔑视，喊出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喊出这一百天的罢工没有白费，集会连同我们的代表将坚定不移，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等待时机进行新的战斗。

我们眼中含着泪水，看着被解雇的代表们怎样走到边上让我们其他人进去的，同时他们还为我们鼓掌；他们为我们的战斗、我们的抵抗、我们的团结、为我们觉醒的工人意识而鼓掌。我们也为他们鼓掌，并用行动告诉他们：我们的团结没有被打破，而且永远不会被打破。

我们的罢工已经结束：但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在95天里，我们成为了加泰罗尼亚乃至整个西班牙的工人运动的领头人。在这段时间里，这场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迫害。他们希望说服我们工人，我们的问题会随着政治

改革结束，或者无论如何，改良主义者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也明确地表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斗争。

我们还表明，我们要摆脱任何不支持我们的战斗，反而只拖我们后腿、想要控制我们，还让我们采取老板们最喜欢的方式来行动的组织。

我们已经实践了一种组织形式，对于我们正所处的这一时刻来说，它已经被证明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正确的组织形式：

- 唯一的权力机关是工人的集会，它所使用的是无产阶级民主。

- 代表由工人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是集会上的大多数人意志的代表者。

我们的罢工已经结束：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 巴塞罗那港口 1976-1988

米盖尔·加劳

那是 1976 年 12 月 12 日，在巴塞罗那港口发生的码头工人人们的斗争。那一天，工会组织协调会<sup>135</sup>召集了大多数在当时仍是非法的工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场总罢工。这是工会的最后一次总动员，它是为了在新的民主国家的协商过程中衡量自己的力量。就像在很多地方一样，罢工都以裁员而告终，港口被解雇了七个人，他们都是码头工人和工委会的成员。即使是这样，工会还是拒绝继续动员，放弃让被解雇的工人回来。为了让他们复职，同事们接着进行了二十一天的斗争。

“二十一个无法忘记的日子！我们的集体意志发出了呼喊：为捍卫我们的同伴而罢工！”<sup>136</sup>

这场罢工引发了 1969 年至 1970 年的西班牙自主斗争的周期，又在后来的 1979 年至 1988 年间引起了港口范围内的一系列罢工。罢工就像导火索一样，点燃了整个七十年代。勃兰索尔、哈里·沃克、布尔塔科（Bultaco）和洛卡等等罢工，都是工人阶级甩开地下工会，自我组织起来的典范。在港口上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们，在先前的这些罢工中看到了榜样。在关键的政治时期（过渡时期），正是这些榜样让

---

<sup>135</sup> 工会组织协调会（la Coordinadora de Organizaciones Sindicales, COS）

<sup>136</sup> 《货堆》（La Estiba），《港口的声音》（Voz de los puertos），第 5 号，1985 年 10 月——原注

自主与自发的罢工，让工人们与官僚等级制的工人委员会分道扬镳。

对工会的立场感到失望的工人，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了起来：他们发起了集会。港口的工人组织本身也为这项工作提供了便利。在港口上，每天早晨要在港口工作组织<sup>137</sup>的门口开会，开完会后，各就各位到港口上开工。这些晨会促进了码头工人之间的联系。它帮助了工人们思考和讨论各自的生活与工作状况，从中培养同志情谊，促进集体意识，并提出一系列的共同要求。

在同事被解雇的第二天，为了让他们复职，码头工人们决定开始罢工。在一场临时发起的集会上，他们成立了一个可以随时撤换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协调抗议行动。尽管这次罢工没能让被解雇的人回来，但它成功地在港口的工人中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们必须自己起来捍卫工作，否则没法保住它。”绝大多数码头工人在这句口号下，建立了一个群众集会式的、统一的、阶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组织：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sup>138</sup>，这就是码头工人的自我组织。几乎从它成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从更为实际的、而不是形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催促工会联络员脱离垂直工会，将所有人纳入集会。对此，码头工人们解释道：

“罢工需要每天举行集会，以获取消息并直接协调我们的活动。我们自己来做决策。集会也要求垂直工会的联络员辞去职务〔……〕集会选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代表没有决策和谈判权，他们必须服从于集会的决议，而且可以随时撤换。”<sup>139</sup>

---

<sup>137</sup> 港口工作组织（la Organización de Trabajos Portuarios, OTP）

<sup>138</sup> 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la Organización de Estibadores Portuarios de Barcelona, OEPB）

<sup>139</sup> 《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及协调组织的起源》（Origen de la OEPB y de la

## 港口简史

多年来，码头工人都得不到法律保障，也享受不到社会福利。码头工人们要自己来到港口上找活干。人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工资按日结算，但在这里没有最低工资的限制。一般来讲，这些条件让港口的工作变得不受欢迎。港口是许多人工作的最后选择。当我们谈到七八十年代间的罢工时，它们同样也是西班牙港口的历史上不为人知的、码头工人自己的工作夺回尊严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斗争使轮班制得以建立。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局试图废除这一制度。码头工人——他们大部分属于全劳联——以八个月的罢工来应对。最终，八名码头工人牺牲，轮班制度恢复。这一制度宣告了码头工人之间，不用再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相互竞争，并通过“手”（工作小组）来交替工作，确保了所有人的工作量都是最少的。另一方面，“手”的制度在同一小组的同伴中间建立起团结和信任的纽带，而这也是开展危险的装卸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无疑，在这里产生的同志情谊，就是多年以后，在七十年代港口发生的集会与自主运动的基础。

随着内战的爆发，与大多数产业一样，巴塞罗那港口的控制权在集体化过程中转移到了码头工人们的手上。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一控制权被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于1937年5月颁布的法令剥夺了。随着独裁统治的开始，颁布了第一部《劳动法》，这是全国所有港口上的工人的第一部共同的法律。在这项法律中确立了轮班工作制。它在整个独裁统治前后被反复修改，也因此导致了一家垂直性质的公司，

---

Coordinadora), 《港口大会上的文件》(Ponencia al Congreso de Puertos), 巴塞罗那1979年10月12-14日——原注



即“港口工作组织”的成立。港口工作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执行当时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对港口上的所有工人进行登记注册和控制。因此，港口工作组织不仅是职业介绍所，还是码头工人的工会。于是，它把码头工人强制地联系起来，这也保证了同样属于港口工作组织的垂直工会，即民团工会在其中建立组织。不出所料，民团工会以外的工会组织都遭到了禁止和迫害。

六十年代，港口的工人运动主要在于夺取港口工作组织的控制权。这样，渐渐地，码头工人们控制了轮班，也能够进行互助和安排退休等等。就是说，在独裁者死后，这个由港口雇主创造的用来压迫和束缚他们的组织，已经变成了同一个港口雇主的主要敌人。

在这十年内，港口也开始了大规模机械化，逐渐改变了码头工人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的机械，所以码头工人也必须专业化，也就是说，装卸货物都要变成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港口工作组织不断对码头工人进行审查，确保工人接受了进行装卸工作的适当培训。另一方面，在港口运营的货运公司也很欢迎这样的做法。

在港口和工会的层面上，消除垂直工会影响的途径有两个。第一个途径是，就和整个西班牙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些码头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它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独立的协调机构，最后被西共吸收。此后，它就走上了合法斗争的道路：参加工会选举，以便在民团工会中实践“打入主义”，在工会里对劳动条件讨价还价。而另一个途径是，港口上出现了一些不属于主流组织的工人，虽然只有自己人的支持，但他们挺身而出，每天都在进行活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这些活动包括就码头上的计件工资进行谈判，或是要求公司遵守卫生和安全规范等等<sup>140</sup>。

---

<sup>140</sup> 见 J·伊瓦尔斯 (J. Ibarz)，《协调组织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 Coordinadora)，由海上劳动者全国协调组织 (Coordinadora Estatal de Trabajadores del Mar) 出版，巴塞罗那，1998 年版，第 29 和 30 页——原注

码头工人以这种独特方式体现的觉悟，促进了工人自主组织的建立，它与大部分“代表”工人的工会不同，在港口上享有亲密关系与合法性。至于“民主工会”的另一个首选，即工人总同盟，只需指出它在港口和其他产业都毫无存在感就可以了。实际上，要等到弗朗哥独裁的最后几年，一些港口上才能建立起工总的小组。后来，这个工会主要在和巴港工人组织及全国港口工人协调组织进行对抗，而不是去争取改善港口的工作条件。此外，工委会的代表在1975年当选为工会联络员。仅仅一年之后，巴塞罗那港口集会就蔓延了开来。



巴塞罗那港口工人的斗争，1976

### 协调组织

经过上述的1976年罢工之后，巴港工人组织成为了所有港口的组织模式。例如，加纳利的港口建立起了同样的组织，它和巴港工人组织也具有同样的基础。于是，后来在1978年，在加纳利港口和其他地

方的组织建立之后，就具备了建立全国港口工人协调组织的条件。1978年5月19日，它在阿利坎特港口的集会上宣布成立<sup>141</sup>。

这一协调组织的建立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

一、协调不同港口之间的斗争与组织建立。

二、在港口工作组织接受协调组织作为自己的代表之前，它首先要作为代言人：

1) 为各港口中的冲突提供帮助并予以声援。

2) 与欧洲各国其他码头工人团体保持稳定的联系。

这一组织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对令人生畏的产业转型的斗争。历届政府都试图整治港口区域的管理。这次转型意味着，包括装卸在内的所有货物运输的工作都将转交给私人公司承包。对大资本来说，它们感兴趣的显然是港口的战略位置，在民主过渡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时期，这些地方是非常关键的。

对港口私有化日益加剧的反对，并不意味着码头工人认为没有进行现代化的必要。相反，他们首先将机械化（起重机、电梯，尤其是集装箱运输的机械化）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因为他们本身就苦于工作中的结构性缺陷。但是，资本家与工人在逻辑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的不是把工人放在集装箱边上，而是把工人完全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码头工人的斗争，更有远见地看，本质上是为了生存和劳动的尊严而进行的斗争，而非局限于某些具体主张。

自成立以来，由于港口集会的组织形式极为高效，协调组织具有强大的实力。集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成立不是出于工会官僚的

---

<sup>141</sup>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比戈港、科鲁尼亚港、巴塞罗那港、加那利群岛八座港口、阿里坎特港与马略卡岛帕尔马港的代表。后来，西班牙的其他港口都派出了代表参会。同上，第43页——原注

指示，而是来自工人的意志。这使得这场运动在处理日常问题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在港口中也拥有完全的合法性，这和主流工会截然相反。每个港口都是自主开展斗争的，同时，它们还会在尊重各个港口的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尽量与所有港口达成一致，提出共同的要求。

它的反官僚主义运作方式，及其仅限于传达港口集会所作决定的职能，使得协调组织成为了一个极其灵活和有效的机制。协调组织全体大会提出的也是已经做出的决定。参加集会的来自不同港口的工人，在地方大会上按照地理位置（比如来自西班牙北部、东部等等）就座。会议结果将移交全体大会，以便执行这些各地的下级组织做出的决定。因此，决策是由下而上，而不是反过来作出的。

### 争取集体协议的斗争

1979年，民主联合会<sup>142</sup>赢得大选。苏亚雷斯<sup>143</sup>领导的政府（1979至1981年）经历着内部分裂。它不顾工人利益受损，打算开展工业改造计划。为了争取有利于工人的协议，巴港工人组织和协调组织在巴塞罗那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为此，码头工人全体大会通过了先前在各

---

<sup>142</sup> 民主联合会（Unión de Centro Democrático，UCD）是阿道夫·苏亚雷斯·冈萨雷斯于1977年成立的一个政治联盟，旨在使西班牙从弗朗哥专政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1982年解散。——中译者注

<sup>143</sup> 阿道夫·苏亚雷斯·冈萨雷斯（Adolfo Suárez González，1932年9月25日——2014年3月23日），早年担任律师。1968—1969年任塞戈维亚省长。1969—1973年任西班牙广播电视总局局长。1975年3—7月任“民族运动”副秘书长。弗朗哥去世后，于1975年12月—1976年7月任“民族运动”秘书长。1976—1981年任西班牙首相，在任期间积极推动民主政治发展。1981年辞职，被授予公爵头衔。1982年发起成立民主社会中心党并担任党主席

（El Centro Democrático y Social，CDS）。1977—1991年任国会议员。1991年辞职后退出政坛。2014年逝世。——中译者注

个港口讨论的一系列基本要求，这将是这一行业的第一份集体协议。全国货运公司联合会<sup>144</sup>的雇主们的回应是，他们不接受与非法工会进行谈判，因此不接受与协调组织进行谈判，此外，他们也不接受集体协议，只允许每个港口各自提出单独的条件。

货联会的意图与码头工人的首要要求，即工人的团结相冲突。因此，工人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码头工人的想法是将港口工作组织变成全国性的国营公司，让里面所有的码头工人享受相同的工作制度。工人们同样也捍卫轮班工作制，反对政府为了损害它而增加固定工资的企图。对于码头工人而言，保持团结就意味着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专门性。他们坚持，要在港口工作首先要接受必要的培训。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冲突中不受老板使用工贼的损害。

当政府和雇主不肯妥协时，码头工人们便设想了各种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等待着雇主们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罢工，而这场罢工将会是漫长的。根据货联会的判断，货运中断的结果很快将引起人们的注意，让人们对罢工产生敌意。此外，鉴于其他的工人阶级可能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估计码头工人的组织会从内部迅速瓦解。

但事情完全相反。码头工人决定在自己的标准下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在满足安全与卫生条件的情况下，仅按最低产量来工作。对于港口每日运输的货物量，规定的最低产量显然是不够的。同样，工作的安全与卫生条件基本上没有达标过。因此，在码头工人严格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货运公司其实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以这种方式，码头工人和政府与雇主坐在一起进行了集体协议的谈判。于是，1979年春，在劳工部里，协调组织代表与港口工作组织

---

<sup>144</sup> 全国货运公司联合会（Asociación Nacional de Empresas Consignatarias, ANESCO）

的总经理进行了几次谈话。这是为了避免政府不顾工人的利益，单方面或者与公司一起通过港口重建的政策。而当谈判很快僵持时，动员仍在继续。

当巴港协调组织和工总正在协议谈判时，雇主们企图釜底抽薪。他们告诉码头工人，公司会支持没那么激进的工会，这样工人就能实现一直以来想要的协议。但实际上，他们所指的协议不包括码头工人的任何主张，也不具有任何真实效力。而协调组织代表了整个西班牙 13500 名码头工人中的 12000 名。

“保持最低效率”的总工一直持续到 1979 年 6 月。当时，由于雇主仍然不肯妥协，工人决定采取和工总谈判时相同的口号：“分别取得胜利”（divide y vencerás）。因此，保持最低产出的策略只被用于最不愿意谈判的公司。

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调组织已经遍布了所有港口，码头工人们就是这场自发运动的主角，他们展现了自己的首创精神和自发性，没人会知道明天将做出什么决定，所有的意见都会被听取。只有理解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即它真正打破了“景观社会”，我们才能够理解：1979 年 12 月，他们在短短数小时内就发起了一场罢工。在这场间断式的罢工中，工人们没有离开工作岗位，而只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停下工作，这样就防止了工贼搞破坏。这就是一个崭新且富有想象力的斗争方式的典范。

几天后，码头工人决定举行数天的全国性罢工（12 月 21 日、27 日和 28 日）。虽然这一方式令人惊讶，但还是没能迫使谈判服从他们的利益。当雇主们希望破坏罢工，在港口放下一群工贼时，他们与工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巴塞罗那港口来说，我们谈到工贼时，指的并不是反对进行罢工的码头工人。在港口工人组织注册过的码头工人中，没有任何人反对集会上商议的决定。相反，工贼都不是港口工人，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进行装卸工作，雇佣他们显然构成了非法用工。出

现在港口的三百名工贼中，有两百名属于极右翼的国家劳动力量（Fuerza Nacional del Trabajo）<sup>145</sup>。

罢工的后续行动在由协调组织主导的港口（实际上就是所有港口）进行着，它得到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声援，尤其是来自英国的声援。当时有两艘货船抵达英国。在协调组织的告知下，英国码头工人拒绝卸下货物，用罢工威胁雇主向西班牙码头工人的组织进行书面致歉。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等待，英国雇主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声援活动，这样的场面还出现过不止一次。港口工人的团结以这种方式超越了国界。毕竟，它和码头工人生死攸关，不仅在西班牙，在整个欧洲也是如此。它是自由化的代价。

同时在巴塞罗那，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为了阻止事态的发展，政府试图介入。1980年1月，政府准备清算码头工人依靠的港口工作组织，这是港口私有化政策中的当务之急。但是，在与码头工人发生冲突时，为防吓跑新的投资者，政府和货联会都希望避免动荡。同时，码头工人准备了一份声明，列出了一系列对工资的要求，作为未来谈判的起点。他们还要求这些公司的子公司加入新集体协议的谈判。最终，通过间断式的罢工与以最低效率进行工作，工人们的斗争得到了回报。较小的公司同意签署这份文件，恢复了正常营业。于是货联会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80年的夏季至圣诞节期间，所有公司都签署了协调组织提出的“最低协议”。

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远远不能补偿工人们付出的牺牲：他们遭到袭击，与警察发生冲突，被逮捕，受重伤甚至死去。1980年7月21日，码头工人的女儿贝琳·玛利亚（Belén María）在一场和平静坐中被汽车压死了。今天，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还保存着她的照片。五年后，她的父亲因特内里费（Tenerife）港口的一场致命事故去

---

<sup>145</sup> 《麻木》（Indolencia），1980年12月，第8页——原注

世。这只是港口职业事故高发的一个例子，它对码头工人的家庭造成了威胁。因此，巴港工人组织与协调组织全体成员为建立互助基金（给退休人员、寡妇等的养老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码头工人们还决定在吃点心的二十分钟里进行工作来为互助基金凑钱，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现在。协调组织，尤其是巴塞罗那港口的协调组织，它以这样的方式表明，它不仅是作为工会参加斗争的。工人之间的互助，对其他公司工人的声援活动，尤其是国际声援活动，在集会议程上占据了很长的时间。这些都证明了码头工人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了解，以及他们始终都不受政党摆布的事实。他们拒绝为拉美的军事独裁者运输战争物资，但免费为尼加拉瓜和索马里装运生活必需品。因此，码头工人的组织不仅是对单纯的经济和工会斗争的回应，而且还提出了激进的、不同于主流的主张，将之与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糅合起来，其特点就是对现存的生活方式采取高度的蔑视与排斥。



巴塞罗那港码头工人罢工，1980



## 1980 年立法

在集体协议签署之后，码头工人几乎没有时间享受胜利。货联会的雇主们宣布：“只要在工会的战斗上失败，我们会开始政治上的战斗”。因此，1980年10月23日，颁布了装卸工作重组相关的法律，这项法律让码头工人争取到的东西都作废了。货联会在工会上没得到的东西，现在通过政府的法律在政治上得到了。那时，码头工人意识到他们受骗了，政府和雇主一直在举行秘密会议，在统治者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放下对市场化的渴望。

工人们的回应是，提出四项要求来避免法律中对他们最不利的方面。他们希望所有公司都遵守要求，这些要求关乎工作稳定性、遵守轮班制度、保留“手”的小组工作形式以及履行最低协议上的内容，最后是取消公司的纪律制度的要求<sup>146</sup>。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雇主选择在巴塞罗那执行该法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码头工人的自主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开始了码头工人们必须经历的，最艰苦和最持久的冲突的一个阶段。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码头工人们始终在罢工和动员中与其他港口保持着团结。于是，巴塞罗那为了阻止这项法律的实施而展开了行动……

“我们运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斗争方式，就是不同时间向所有公司和雇主展开进攻。我们称之为选择性罢工。这样的罢工只打击一部分公司，其他公司则不受影响。在当时的竞

---

<sup>146</sup> 见埃斯蒂瓦纳（Estibarna），《巴塞罗那港口装卸国营公司》（Sociedad Estatal de Estiba y Desestiba del Puerto de Barcelona），由阿汉达里亚（Argentaria）出版，第十三章《码头工人的社会主义》第189-213页。对这一内容的解释更为详尽——原注

争环境下，这对于雇主来说，也就是在开始崭露头角的大公司，还有看到自己可能会被吞并的小公司之间……小公司很快就会签字，当然了，剩下没签字的就是最大的几家……好吧，说实话，我们能把它们从港口上干掉<sup>147</sup>。”

如此这般，他们对四家敌意最大的公司发起了选择性罢工：马波（Mapor）、赛欧萨（Ceosa）、孔代内马（Contenemar）以及玛丽蒂玛·拉耶达那（Marítima Layetana）。这些策略确实打破了雇主的一致，但同时也意味着码头工人要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超过 5000 件处罚，这意味着至少要停三天的工作和薪水，解雇参与罢工的 2300 名员工中的 172 名。这些处罚是根据各个公司（视情况而定）的纪律制度而实施的。当然，工人的选择性罢工只是制裁的原因之一。到最后，所有的码头工人都受到了处罚。经济上的打击报复——特别是裁员——会让罢工难以继续进行。工人需要想办法应对这种局面。如果没有办法谋生，又怎么继续他们的斗争呢？于是，他们决定将工资也公有化。

“我们去上班，来到工会，那里有一群同事负责会计工作，然后我们把钱交给他们。我们都分到了相同的钱，172 个被解雇者跟我们还有工作的拿的一样多<sup>148</sup>。”

码头工人的自我组织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面对每个新问题，都会出现新的解决方式。也许他们不知道明天将要面对什么，但他们表现出了充分的团结意识。只有这样，码头工人才能完全团结起来，通过分配最低工资，他们感受到身后有着集体的支持，于是就能毫无畏惧

---

<sup>147</sup> 2006 年 11 月 17 日，对码头工人和巴港工人组织代表弗兰西斯科·阿洛卡（Francisco Aroca）的采访。——原注

<sup>148</sup> 2007 年 1 月 28 日，对前协调组织总书记胡里安·加西亚（Julián García）的采访。——原注

地投入战斗。

另一方面，码头工人们不仅得到了协调组织的支持，还得到了港口所在社区的声援。11月1日那天，附近的商店为了声援自己的邻居——码头工人，而举行了罢市。同样，工人的妻子们也参加了声援活动。超过400名妇女参与了一场集体行动，甚至其中有些人的丈夫都没参加过运动，她们占领了哥伦布号帆船，要求让被解雇的丈夫能够复职。它表明了在许多情况下，港口工人及其家庭的觉醒程度是与斗争同步发展的。

总之，码头工人的自主运动首先是一场实践，它采用的方法并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产生于具体斗争的需要中。因此，这里没有来自港口之外的喊着口号的政党，也没有什么伟大理论，只有他们在不同时刻所面对的具体情况，决定着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这些行动会在每次新举行的工人集会中得到变更和调整。

1981年1月26日，选择性罢工结束了。有几百名工贼在干活。尽管如此，码头工人们每天都在为恢复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斗争，日益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将工贼赶出了工作场所，甚至将一些人丢进了海里。媒体将这些至今为止被孤立的行动传了出去，想让整个社会反对这些码头工人的斗争。工贼则得到警察的保护，后者对工人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武器。他们动用了很多警力，许多警察晚上还驻扎在港口，防止码头工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同时，172名被解雇的同伴仍在等待着。为了施加压力，工人重新以最低产量进行工作。而被解雇的码头工人组织了新的斗争方式，包括将一艘叫安奎利亚（Aquila）的意大利船占领了几个小时。全国其他码头工人的声援运动也引发了2月23日至24日两天的总罢工。

与此同时，2月23日的政变失败了。一些码头工人建议在政治局势动荡面前保持克制，但集会仍然公开号召继续抗议活动，不要停下总罢工的准备。于是总罢工开始了。之后的几天里，在码头工人、工

贼和支持他们的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突然有一声枪响，一名码头工人倒在了地上，当时他担心自己要完了。这名工人没有为这样失去生命而后悔，最后也从枪伤中恢复了。但是，之后的几个月都没有停止过冲突。对局外人来说，港口的局面好似回到了激荡的独裁时期一样。三个月内，工贼们直接或间接地发起了 56 场袭击<sup>149</sup>。但是，紧张和暴力的局面正在逐步缓解。毫无疑问，这是由巴塞罗那劳工法院对解雇的判决促成的，在 172 例解雇中，它（已审理并）宣布了 23 例无效。为了表示诚意，码头工人决定恢复正常的工作速度，他们相信法院会让其他同事也回到身边。但必须说明的是，大公司仍然不愿意遵守判决。同一个夏天，法院判决所有的解雇“无效”，就是说，除了企业被判处违法，它还意味着工人们能够恢复轮班制度。工贼最终都撤出了港口。然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集体协议的谈判，它于 1981 年 8 月 31 日签字生效。但是，参与战斗的各方都明白，这不过是暂时的休战。

### 港口的斗争还在继续

正如我们所见，自从弗朗哥死后，巴塞罗那与全国其他的港口都处在不断的沸腾状态。工人与货运公司之间的任何口角都有可能引发停工和动员。1982 年，社会党赢得了选举，码头工人们担心让他们付出如此多努力的协议会轻易化为泡影。这几年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后来在 1985 年，最高法院废除了 1980 年的《皇家法》，这项法令连实力最强的四家公司都几乎无法实施。很快在 5 月 23 日，社会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试图改组装卸工作，并重新引发了冲突。

---

<sup>149</sup> 同上，《麻木》1980 年 12 月，第 12 页——原注

政府明确地表明了该法令的目的：建立“装卸公司”，也就是港口私有化，将港口工作组织从港口的经营与贸易中消灭。在消灭港口工作组织后，工人将根据当日交易情况被分为轮班小组，并被分到三十个新的“装卸公司”（它们都是混资的，51%的股份在国家手中，49%在私人手中），也就是分配到各个公司中去。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巴港工人组织的消失。就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该组织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它的“主导动机”（leit-motiv）——就是让港口工作组织成为国营公司。工人分散打破了码头工人的团结。最后，除了造成码头工人之间的分裂以外，政府还打算对“第三类群体”实行提前退休，这将导致近 5000 名工人流落街头。

5 月 27 日，为了决定事态的发展，1200 名码头工人聚集在了一起。起初，他们要进行罢工，但一些人提出要想新的办法。应当记住，这场几乎不断的冲突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此外，媒体也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了作用。所有的公共舆论，都给码头工人打上了非常负面的印象，将他们归为黑帮或者带有特权收入的帮会份子。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证明媒体操纵新闻，我们只需要给出几个例子。在协调组织写给所有媒体的新闻稿中，讲述了针对码头工人的压迫行为，上面谴责说：“社会党政府采取了异端的方法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它打算颁布一项法律，其中涉及裁员 5000 余人，并向全世界出售港口。”《国家报》引用了这里的内容，虽然它的转述和上文差别不大，但是具有本质的区别。《国家报》说：“……码头工人补充道：‘由于（工人）采取了法律以外的手段，政府部门打算颁布一项法律，其中……’”通过这些小把戏，不过是稍微改动几处，报纸里的内容就与声明中的完全相反，违反法律的不是政府而是码头工人了。我们还能举出很多例子，这只是其中一小例。仅仅是在这篇简短的声明中，码头工人的说法就被曲解了三处。

无论如何，码头工人集会最终决定，除了号召罢工以外，他们还

将采取一项能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作用的战略措施。会议上提出，要让正式工人被强制解雇，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不公平”的解雇，他们才可以重新进行轮班制（如果解雇是经过公司协商的，他们失业时将进入全国就业系统）。

一年以来，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超过 500 项处罚），码头工人一个接一个被解雇，而他们不顾法律造成的分裂，依旧与其他的码头工人团结在一起，重新实现了轮班制度。他们的目标实现了，码头工人的统一组织——巴塞罗那港口工人组织无法被打败。这种情况说明，码头工人比想要消灭他们的国家更聪明。

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了自己的基本要求进行着各种活动：反对裁员、反对非法用工、坚持轮班制度、坚持所有码头工人的团结，并且争取将港口工作组织变为国营公司。

工人们最声势浩大的行动是 5 月 14 日的罢工。那天，码头工人集会决定在早上十点停下港口的工作，去政府那里示威游行。所有的港口活动停止了几个小时，同时超过 1000 名码头工人沿着拉耶塔那大街（la Via Layetana）游行。他们还把港口的重型机械全带上了。那几个小时里，港口上什么也没有了。拉耶塔那大街瘫痪了，人们开着机器气势汹汹地驶向圣若梅（Sant Jaume）广场。这场行动也同样展现出了在其他港口组织中从未见过的协调和效率，它让雇主组织货联会感到了惊讶和绝望。

另一方面，1986 年是与孔代内马公司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这家集装箱公司决定 7 月份在巴塞罗那实施一条此前未被采用过的法令，以此打击几乎遍布所有港口的活跃的码头工人集会运动。面对这种情况，工人恢复了降低工作效率的策略，但只针对这家公司。公司事不宜迟地找来了工贼。于是，在港口工人与“罢工破坏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然后，工贼在警察的保护下开始了工作，而罢工者被执法人

员用暴力赶出了港口。码头工人们随即在全国就业系统<sup>150</sup>的所有办公室前都挂上了这样的标语：不要当工贼<sup>151</sup>。另一方面，该公司因非法用工（使用未在港口工作组织注册的工人）受到了起诉，因为这样的做法在《用工条例》（la ordenanza laboral）中是明令禁止的。由于消息传不开，诉诸法律的过程也很慢，工人们就对孔代内马采取了更激烈的抵制手段。8月6日，五百名码头工人来到了孔代内马的总部，阻止了货船的装载，导致与警察发生了短暂却暴力的冲突；8月13日，孔代内马用来运送集装箱的三台设备被破坏了；9月15日，五百名码头工人占领了公司的货运站台，与工贼对峙；10月2日，孔代内马的一辆卡车起火了……<sup>152</sup>

码头工人们虽然受到了超过四百项处罚，仍未放弃自己的要求。为了避免孔代内马下属的其他港口也使用工贼，那里的工人们决定发起间隔几个小时的停工。但在巴塞罗那，自8月14日以来，公司就只用工贼开工，还和他们签订了非法用工合同：根据给定时间……在个别时间段进行工作。也就是说，在码头工人罢工之后开始工作！

在没有得到码头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孔代内马（还有背后推动这家公司的政府）实行这项法令的企图是不能长久的，因此，在接受谈判后，码头工人停止对公司施加压力，并最终在1987年2月达成协议。公司同意遵守协议中的条件，并且不再任用未经注册的工人<sup>153</sup>。

---

<sup>150</sup> 全国就业系统（Sistema Nacional de Empleo, INEM）是西班牙的一个就业体制。——中译者注

<sup>151</sup> “这里的工人只会把你当做‘罢工破坏者’，但他们没能和1980年一样成功。如果港口的码头工人因报复而拒绝了你们，我们会为你提供法律咨询和辩护……”《货堆》（La Estiba），《港口的声音》（Voz de los puertos），第19号，1986年11月——原注

<sup>152</sup> 数据取自“匪帮”（Os Cangaceiros）小组在下述的书中的记载：《1868-1988年西班牙国家中的社会战争记事》（Actas de la guerra social en el Estado español 1868-1988），瓜子（Pepitas de Calabaza）出版社，第146-149页——原注

<sup>153</sup> 同上，见J·伊瓦尔斯，《协调组织史》1998年版第69页——原注

但是，孔代内马的纷争结束，不过是意味着其他公司会挑起新的争端。政府坚决反对固定工资与轮班工作制的态度也加剧了这一局面。此外，政府还决定仅在最大的港口中建立“装卸公司”，“为了共同的利益”将港口上的工人划分给中央政府管理下的港口和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的港口。

## 成功中的失败

政府与雇主的策略最终取得了成效。在不同港口中，码头工人之间的利益分歧也在日益加剧。斗争了将近十五年的整整一代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感到越来越疲倦了。另一方面，在政府不愿意履行新签署的协议时，最具战斗性的很多工人都已经退休了。结果是，码头工人的数量逐年在减少。一些人开始讨论起先保住“这艘老船上的火炮”，即巴塞罗那港口码头工人组织还有全国的港口码头工人协调组织，再把它变成“商船”<sup>154</sup>，以适应不可避免的新局面，即私有化和码头工人数量的减少。

之后是《一号框架协议》的签署，这份协议在协调组织内部引起了公开的冲突。最具争议的是协议关于“装卸公司”和提前退休的地方。正如赫尔迪·伊瓦尔斯（Jordi Ibarz）所说，其旨在将用于战斗的工会转变为用来谈判的工会，以适应和平时期。不赞同这种策略的码头工人抱怨说，集会举行的次数越来越少，决策能力也越来越差。协调组织中也慢慢滋生了官僚主义。在很短的时间里，活跃了十年以上的集会和自主落幕了。

无论如何，除了港口，尤其是巴塞罗那港口本身的情况以外，更

---

<sup>154</sup> 同上，见《货堆》，《港口的声音》，第19号，1986年11月——原注



加重要的问题是：码头工人的政治孤立。在雇主和政府面前，港口工人们发展出了真正的反抗政权的自主，但他们在手中掌握权力时，却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自主斗争已经在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被击败，它不能再接续码头工人的胜利了。但应当指出，在 1988 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让协调组织转向“用来谈判的工会”。如果今天去巴塞罗那附近走走，他们会很乐意把这些告诉你。在所有广场上，任何一间酒吧里都可以找到退休的他们。

## 自主与反文化：过渡时期的工作、转变与日常生活

巴勃罗·塞萨尔·卡莫纳·帕斯夸尔

兄弟姐妹们，是时候来干大事了。我们这些人彼此作为兄弟姐妹，为了自由而在共同的斗争下团结起来。我们在自身的存在中认识了自己，因为我们享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以相同的方式生活；我们听同样的音乐、感受着同样的事物。我们因相同的年龄、共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走在了一起。我们也都希望能有着同样的事情：全世界的自由、自主、和平、正义与平等。

约翰·辛克莱《寄语伍德斯托克》  
(Mensaje a la nación de Woodstock, 1970)

当我们绘出六十年代欧洲新形式的冲突时，它总是向我们指出，为了解释这些明面上的分歧，关键的因素是观念上的改变。在改变了的环境与新的激进意识下，“地下”运动<sup>155</sup>的出现意味着对工人政治团体的全部经验，以及直至那时的集体行动的意义重新诠释。由六八一代表现出的反叛现象，为更广阔和复杂的现象起了个头，标志着自

---

<sup>155</sup> “地下”是指作为社会潮流而产生的运动，具有去集中化的交流方式，在当时的社交网络（通常是家庭和社会阶级）下建立的秘密活动的公共组织形式。——原注

前一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历史的新一座里程碑。这一新的分歧不仅让生产关系，也让生活方式陷入了危机。

在柏林墙两头，渗透战后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严密秩序，被一场大规模又无声的革命打破。这场从体制的底层爆发的革命，将家庭、学校、娱乐、政治与社会关系，从头到脚都拖入了危机。

在弗朗哥王国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这一新事实的文章。同时也很少有人去探究六十年代的西班牙年轻一代是怎样打破他们受到的文化孤立的。反文化<sup>156</sup>在弗朗哥时期意味着什么？西班牙的六八年代是什么？它特别在哪里，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我们的反文化”的这些问题仍未能得到解答。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从生活的视角与欲望的最深处，展现那些年转变与动荡的故事。日常生活所经历的深刻转变，让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了。

我们无法在这里解决有关这场地下革命的所有疑问，但至少能够理清它的主线。为此，我们将着眼于不同的时期与过程，以便对社会自主与反文化相融合的某些领域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将首次展示在塞维利亚与巴塞罗那——这些城市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进行的反文化实践具有稳定性——出现的反文化。在这两座城市中，我们能看到和嬉皮士相关的生活方式、“垮掉的一代”<sup>157</sup>的道德观念与新美学风格的构建，还能发现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新音乐风格与地下漫画的出现。

其次，我们能以七十年代为界，看到工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年轻工人——以及反文化理论拥有了新的背景。具体来说，我们将考

---

<sup>156</sup> 反文化（*contracultura*）即反叛传统的文化。——中译者注

<sup>157</sup> “垮掉的一代”（*Beatnik*）被认为是年轻人的浪潮，它体现在了垮掉（*beat*）一代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中的伦理与思考方式中。这些思想的特点是强烈的、想要摆脱“绝望的”西方社会的冲动。在自由主义思想、东方哲学与黑人亚文化的重大影响下，“垮掉的一代”作为嬉皮运动和亚文化的直接前身而知名。——原注

察一些工人自主团体，这些团体将在后来的工厂斗争中逃避和拒绝工作。为此，我们将进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并加入他们为了摆脱工厂工作的枷锁而进行的“长征”。第三，我们将要来展现一些其政治、文化与首创能力的表现形式。

最后，我们将来分析被我们所称为社会反文化的、横向且去中心化的集体观念，及其在八十年代爆发的一些原因。



斯马施 (Smash) 乐队 1971 年专辑《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

## 《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 反文化、前卫摇滚与地下漫画

六十年代初期，弗拉门戈<sup>158</sup>虽然受到镇压和主流民俗的排挤，仍然在词句中保留了劳动的痛苦与对剥削的拒绝。迭戈·德尔·加斯托尔<sup>159</sup>这类人物周围聚集了许多不安分的年轻人，他们在此了解了弗拉

---

<sup>158</sup> 弗拉门戈 (Flamenco)，是源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艺术形式，包括歌曲、音乐和舞蹈。弗拉门戈的形成深受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影响，还吸收了大量罗姆人 (吉普赛人) 的艺术元素。弗拉门戈艺术中有大量的悲愤、抗争、希望和自豪的情绪宣泄，歌唱者的自然接近沙哑的发音方式也影响了西班牙其他的艺术形式。——中译者注

<sup>159</sup> 迭戈·德尔·加斯托尔 (Diego del Gaster, 1908 年 3 月 27 日——1973 年 7 月

门戈的社会与音乐根源。据传说，歌词中吉普赛人的哭声以及非主流和粗俗的风格，源于最流行的种族反抗的姿态，美国出版的一些旅行指南对它们有大量的描写。书中指出，塞维利亚及其周围地区是从其他角度体验生活的理想场所。多亏了这些宣传，在西班牙南部出现了“垮掉的一代”，他们就像是被魔法吸引一般，与安达卢西亚精神融为一体。美军的莫龙-德拉弗龙特拉（Morón de la Frontera）驻军基地是这些道路交汇的重要节点，矛盾的是，一些逃兵从这个基地逃往了新兴社区。虽然受到当局的打压，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带来了蓝调和其他黑人音乐，这些是自由的旋律，体现了以民权运动与反越战活动为代表的、他们充满痛苦的经历以及黑人社区的反抗。

通常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下，年轻的大学生们、抽北非大麻的行家与来自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新潮流融合在了一起。的确，“垮掉的一代”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新兴社会意识。拒绝工作、性解放、吸毒，以及否定任何秩序，体现在了整个当代文学中。或许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sup>160</sup>、加里·斯奈德<sup>161</sup>和他们的自由意志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前辈肯尼思·雷克斯洛斯<sup>162</sup>在揭露社会秩序的本质，甚至在揭露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控制的新形式时，都是最敏锐最自觉的人。

但是，让我们回到塞维利亚的话题上。弗拉门戈的魅力打开了一道门，六十年代中期的先驱者从这里向西班牙的土地上迈出了运动的

---

7日)，西班牙弗拉明戈吉他大师。——中译者注

<sup>160</sup> 厄文·艾伦·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1926年6月3日——1997年4月5日），美国作家、诗人。——中译者注

<sup>161</sup> 加里·斯奈德（Gary Snider，1930年5月8日——），美国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1975年获普利策诗歌奖。——中译者注

<sup>162</sup> 肯尼斯·查尔斯·马里安·雷克斯洛斯（Kenneth Charles Marion Rexroth，1905年12月22日——1982年6月6日），美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中文名“王红公”。——中译者注

第一步。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像《晨星》杂志<sup>163</sup>这样专门的反文化刊物才出现，从那时候起它才普及开来。一些传记、诗歌和垮掉一代的思考以“羔羊的父亲”为标题得以出版。通过这些方式，自由的思想以新形式来到了半岛。它受到了轰动的欢迎。安达卢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地下运动吸收并混合了这些影响，从而发明了一种与弗朗哥治下的城市针锋相对的生活方式。

由于这些影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日常生活发生了爆炸性和强有力的革命，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人物登上了舞台。在这里只需举出两个例子：地下漫画的粗野漫画家纳萨里<sup>164</sup>，还有安达卢西亚裔的前卫摇滚的领路人斯马施（Smash）组合。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反文化的革命浪潮开始席卷整个西班牙社会。于是，塞维利亚的一些地方，像是西班牙广场和赫丘利大道上流行起了斯马施组合的成员们（马努埃尔、瓜达尔贝托、胡里奥、恩里奎与安东尼奥）的散乱发型与嬉皮士风格打扮。赫丘利大道还布置成了这一主题的风格。当时的大胆美学本质其实是政治上的反对。这些年轻人的出现和他们的态度，代表着对弗朗哥社会制度中最神圣与最沉闷部分的挑战。在《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We come to smash this time）这首歌中唱到“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粉碎这个必须闭嘴的时代”。

在这个“大杂烩”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团体。再举个例子，“无法分类的革命者”何塞·佩雷斯·奥卡尼亚<sup>165</sup>，就是我们的奥卡尼亚，1947年出生在塞维利亚的一个小镇，他以完全原创的风格成

---

<sup>163</sup> 《晨星》杂志（La revista Star）于1974年首次发行，并迅速成为西班牙地下文化（尤其是漫画领域）最重要的标杆。但是，诸如《新画面》（Nuevos Fotogramas）或《胜利》（Triunfo）等其他先驱早已经反映了全世界的异见时代。——原注

<sup>164</sup> 纳萨里奥（Nazario Luque Vera，1944年1月3日——），西班牙漫画家。——中译者注

<sup>165</sup> 何塞·佩雷斯·奥卡尼亚（José Pérez Ocaña，1947年3月24日——1983年9月18日），西班牙艺术家、平权活动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中译者注

为了反文化的代表。喜欢把自己定义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奥卡尼亚<sup>166</sup>，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混血的可能性与深刻性以及六七十年代文化转向的最具启发性的例子。他的艺术形式与其存在本身——毕竟这两者无法分开——在打破性别观念上达到了统一，并在七十年代的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还有哥特式的小巷里发起了酷儿运动（queer）与同性恋（Angelote）的游行。

街道成为了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打破性别观念、表达自由，最重要的是对带有神圣光环的一切事物的颠覆，这些都表现出了对社会思想的反叛，这一现象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了整个现存的社会现实之中。无论如何，最初的反文化必须通过自己的侨民和聚居区才能蓬勃发展，这样的地方就是巴塞罗那。上文提到的纳萨里奥和奥卡尼亚，他们也都是被迫移居到这座城市的。前者是因为他的志向不在教书——纳萨里奥是一名老师——而在漫画上；另一位是因为他在出生的镇子上受排挤，过不下去了。由于这类“杰出移民”，巴塞罗那成为了一个新文化的实验场所。《火之玫瑰》（la Rosa de Foc）<sup>167</sup>之类的一些作品对于新形成的地下运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它引入了所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事物。

以这种方式，旅行、竞速、游戏、放纵和颠覆的紧张活动，改变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巴塞罗那经历着凯鲁亚克<sup>168</sup>曾梦想的背包客革命。这一梦想成真了，成千的带着散乱发型和嬉皮士风格的人走在街上，等着蹦去伊维萨岛（Ibiza）、梅诺卡岛（Menorca）或地中海沿岸的任何地方。捣蛋的巴塞罗那，六十年代中期地下文化的怪胎们从这

---

<sup>166</sup> 参见文图拉·邦斯（V. Pons）的纪录片，《奥卡尼亚，间断的印象》（Ocaña, retrato intermitente），巴塞罗那，Teide 与 Zeta 制片有限公司，1978 出品——原注

<sup>167</sup> 纳萨里奥，《纳萨里奥和他的朋友们眼中的七十年代巴塞罗那》（La Barcelona de los 70 vista por Nazario y sus amigos），巴塞罗那，Ellago，2004 年版——原注

<sup>168</sup>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 年 3 月 12 日——1969 年 10 月 21 日），美国“垮掉的一代”小说家。——中译者注

里汲取了无尽力量。

“到处是这样的人，他们背着背包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逃离说教的游者拒绝遵守他们消费的、生产的，同时也是为了得到——消费现实不需要的东西——狗屎特权而工作的规矩……它们都是生产，消费，工作，生产……这个体制的囚徒。”<sup>169</sup>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项运动源自成百上千摆脱弗朗哥束缚的年轻人的生活。那时常说的“消灭压迫”代表着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有着另一种生活和自我表达方式的社会，人们能够在其中以漫画、音乐或戏剧的形式交流。《雷霆队长》(El Capitán Trueno)和《面具战士》(el Guerrero del Antifaz)都是让人的生活方式摆脱控制的作品，但它们在这方面已经不再能让观众感到满足了。

从这些媒体中，也许是地下漫画中，也从六十年代的媒体以及《Bang!》和《Cuto》这些成人杂志的先驱中，曲折地产生了更为创新的风格。不管怎么说，在这一新潮中，最重要的地下创作集体工作室是巴塞罗那的罗洛(El Rollo)和位于马德里的卡斯柯罗工作室(Cascorro Factory)。这些漫画中毫不拘谨的语气与同性实验的怪异部分，定义了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它以猎奇审



<sup>169</sup> J·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Los Vagabundos del Dharma), 巴塞罗那, Anagrama, 2004年版, 第95页——原注



美与挑逗言行来表达现实。

毫无疑问，西班牙地下漫画在它的每幅图片和每桩故事里，都向我们指出了那个世代的危机。这些年轻人原本被要求成为模范的父母、成为“敬畏上帝”的人，但他们最终离经叛道了。新文学的一些重要人物，例如罗伯特·克兰姆<sup>170</sup>的《怪猫菲力兹》(Gato Fritz)、由明星图书(Star Books)出版的凯鲁亚克的文学作品，还有特别是纳萨里奥的那些以布里达<sup>171</sup>这样的人物为主角的漫画中，通过同性关系的性之旅和成为唯一强制规定的滥交，对爱情与婚姻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在社会规范和所有社会阶层的行为上的改变，也同样渗入了年轻一代的工人阶级中。后者在新的生活方式下，将当时还把握着人们观念的、传统工人的劳动观念和社会基础卷入了危机。因此，在六十年代中期，作为分散的先锋队，首批地下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打开缺口的同时，还在六十年代中，从像德国、荷兰、法国和美国这些迥异的地方引入了新的文化。

### “拒绝工作”、自主和斗争：新的工人运动经验

“对于阶级，我将它理解为一个历史现象，就是说一系列不同历史过程和看似脱节的片段是统一的，无论他们是第一手现实材料还是意识现象。我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我不认为阶级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种分类，

---

<sup>170</sup> 罗伯特·丹尼斯·克兰姆(Robert Dennis Crumb, 1943年8月30日——)，美国漫画家、音乐家。——中译者注

<sup>171</sup> 纳萨里奥与缇达(Tita)，《婊子和病》(«Purita y los Morbos»), 明星图书(Star)，第25期，巴塞罗那，1977年11月版，第4-9页——原注

而是在人的关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sup>172</sup>

危机与革命的倒退，极左翼的瓦解。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资本在结构上的重组和社会改良的协定，这些是导致七十年代革命被粉碎的原因。在这十年的前半叶中，工人运动自内战以来首次经历了组织集会、为了共同的斗争团结起来，并实现了难以计数的自我管理，但最终又在1977年的《蒙克洛亚协定》面前失去了方向。根据“社会代理人”（即雇主、政党和工会）的指示，工人运动不得不撤退到“冬天的宿营地”，接受了生产力至上的观点，放弃了提高工资，也放弃了过去十年间争取到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得不放下自己的骄傲、尊严与社会地位，放弃自己作为当前政治生活的主体地位。

还有那些获得权力和资本主义地位的人的背叛，而他们在短短几年前还准备投身血与火的斗争。怎么可能会遭受失败？为什么没能找到其他的革命道路？那些光辉岁月的激进运动在哪里遭受了失败？似乎所有对这场失败的分析都指向结构性的，或者说外部的因素，即与那个时代的工会和政党上层有关、与普遍的叛卖和腐化有关。但是，冲天的工人运动怎么会让胜利从手中溜走呢？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将带着这样一个假定：工人运动——除了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以外——还遭受了几代人的历史性的破产。其力量的主观基础在于：组织纪律、工作伦理以及工作与家庭的稳定生活，而这些都失去了意义。工人们在这一代经历了本质上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城市里的年轻工人通过叛逆和与主流观念的背离，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们对斗争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

在这一方面，为了理解整个欧洲左翼的结构所遭受的危机，应当指出一些关键的原因。这场危机是由极左翼政党与他们的新一代积极

---

<sup>172</sup> E. P. 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巴塞罗那1989版——原注

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所产生的。各种价值观，比如无产阶级化<sup>173</sup>，或者通过一个集中制的、有党纪的、主张劳动纪律的组织提出政治纲领来维护想象中的工人，这些形式都陷入了危机。这些极左组织的最大愿望，即无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失去了意义。最根本的是社会观念的改变，尤其是积极分子们也在主观上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生活的前景逐渐远离了那个时代写在政治纲领里的东西。

为了分析这一危机，我们必须结合不同的原因并指出这一过程的具体现象。因此，我们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工人自主运动作为出发点<sup>174</sup>，这项运动始于1969年，终于1977年。例如马德里自主团体（Grupos Autónomos de Madrid）、著名的工人自主小组以及圣科罗马的经验，都表明了作为当时斗争成果的政治模式，是如何受到我们前文所讲到的那些文化潮流影响的。从某些方面上讲，这些组织都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人委员会的斗争，以及争取工人自主的运动的高潮中诞生的，同时也是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反文化运动和传统工人运动的例子。在流行的历史解读中，很少反映这一运动超出传统的特点。同时，为了理解什么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脱离了秩序，我们大致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他们在那时感到被困在工人主义亚文化（subcultura obrerista）中，且千方百计地从中逃离。

当时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它们共同引发了整个七十年代的文化转向。第一，是工人斗争进程的激进化和如火如荼的自主运动。其次，

---

<sup>173</sup> “无产阶级化”用来指学生、中级或高级技术人员在工厂进行工作的过程。其目的是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经历工人阶级的生活以便为他们的斗争提供掩护。这是极左翼政党的学生积极分子常用的策略。——原注

<sup>174</sup> 工人自主是一场思想上植根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和克服的运动。工人自主与阶级自主的概念被唤醒，并通过弗朗哥独裁最后几年的斗争得以实现。在哈里·沃克、布尔塔科、洛卡、马德里与巴塞罗那的美标公司，以及其他社区自主斗争的经验中，工人自主都表现出了重要地位。马德里比拉尔（Pilar）社区的“巴瓜拉是我们的”（La Vaguada es Nuestra）斗争与圣科罗马的“门诊斗争”（La Lucha por el Ambulatorio）就是两个绝好的例子。——原注

是想要在日常生活的组织与思想上的各个方面进行尝试的热情。

首先，七十年代上半叶的斗争所具有的激进性与力量，使新一代工人认识到了打破生产周期的必要，后者很明显就是弗朗哥独裁统治的缩影。福特制工厂及其纪律——基本上就是装配线——激起了工人对这种奴隶制的深刻仇恨，这种制度让人长时间在生产线上工作，并且无视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对这一主流生产模式的拒绝，导致了普遍的不守纪律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搞破坏、旷工和私下换岗。

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少，尤其是在生产线上搞破坏与违纪方面，但在这方面有无数的例子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纲领”<sup>175</sup>等组织就在出版物中发表了一些关于在生产线上“如何做错事情”或者“怎样不守规矩”<sup>176</sup>的内容。普遍的违反纪律的方式有：放慢工作节奏、用更舒适的方式工作或者直接生产劣质品，这些方法都流行得非常广。

我们有 1977 年瓦伦西亚的福特工厂的数据<sup>177</sup>，当时工厂的产量从每天 1104 辆汽车减少到了 700 辆，而这 700 辆中至少有 50% 由于零件放置不当或者损坏，因而无法使用。我们还了解到在 1973 年，在劳动科学组织<sup>178</sup>的高强度工作方法被普遍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节奏加快的过程中，纺织业等的雇主抱怨自己的公司出现了大量的旷工。但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工业组织学校（la Escuela de Organización

---

<sup>175</sup> “纲领”（Plataformas）是巴塞罗那的一个工人组织。它存在于巴塞罗那工业区的多家工厂中，按地区组织进行，用于协调各自主组织。——原注

<sup>176</sup> 来自 2005 年 11 月 24 日在巴塞罗那对马塞罗·洛佩斯·宾多（Marcelo López Pinto）的采访。马塞罗负责布尔塔科公司的工作计时（cronometraje），并负责给“纲领”的出版物撰写有关个人纪律的文章。——原注

<sup>177</sup> A·佩雷斯·科亚多（A. Pérez Collado），《亲爱的锁链：西班牙福特二十五年的斗争与失败；从马克思与巴枯宁到马克思与斯宾塞》（Queridas cadenas. Veinticinco años de luchas y derrotas en Ford España, mientras la progresía dejaba a Marx y Bakunin para entrar en Marks & Spencer），瓦伦西亚，AL MARGEN 出版社，2001 版，第 33 页——原注

<sup>178</sup> 劳动科学组织（Organización Científica del Trabajo, OCT）

Industrial) 于 1976 年发布的数据, 痛心地证实了在一年里, 集体冲突造成了超过 1.1 亿工时的损失, 旷工则超过了因罢工损失的工时的二十倍。<sup>179</sup>

“这些破坏行为不能说有组织, 最好说是习惯性的, 比方说, 最典型的破坏行为就是脚踹机器配电盘, 这样就不得不叫机修工或电工来修, 但是在晚上, 偌大一座工厂只有一名电工在值班……像这一类的事情是根深蒂固的……实行泰勒制后, 我们就放慢脚步, 故意多花时间干活, 我们的部门也就是准备部门和纺纱部, 经常不听领导的话, 三次里面有两次我们都回答他们说: 去你妈的……”<sup>180</sup>

在全国的大中公司中不断发生的反抗, 都源于拒绝工厂的剥削形式。这些行为是为了破坏工厂的秩序, 接着冲突转向了另一层面, 即日常生活: 学校、家庭、性以及受到猛烈批判的弗朗哥文化。年轻一代工人积极分子的很大一部分, 生活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新的立场, 尤其是在性和家庭问题方面, 也同样使传统的工人运动——它既不了解学生, 也不了解许多年轻工人的嬉皮士态度<sup>181</sup>——陷入了

---

<sup>179</sup> J·瓦维亚诺·莫拉 (J. Babiano Mora), 《移民、计时与罢工: 关于弗朗哥时期工人与工作的调查》(马德里, 1951-1977), 《Emigrantes, cronómetros y huelgas. Un estudio sobre el trabajo y los trabajadores durante el franquismo》, 马德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FPM, 1995 年版, 第 319 页——原注

<sup>180</sup> 来自 2006 年 12 月 10 日对安达卢西亚纺织工人协会 (Industrias Textiles Andaluzas Sociedad Anónima, ITASA) 的一名工人, 路易斯·奥尔尼略·布利多 (Luis Hornillo Pulido) 的采访——原注

<sup>181</sup>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 可以参考胡里奥·桑斯·奥耶尔 (胡里奥·安东尼奥·迪亚斯) (Julio Sanz Oller (Jose Antonio Díaz)) 的文章, 他在其中解释了一些工人运动中关于这个现象所引起的, 尤其是与中年男性的矛盾。胡里奥·桑斯·奥耶尔, 《在欺骗与希望之间》(Entre el fraude y la esperanza), 巴塞罗那工

危机。

在这一方面，出现了所谓的城市公社<sup>182</sup>，例如马德里自主团体的一些小组，他们想尝试与自己的父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共享公寓中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些实验的共同点是嗑药、恋爱自由和拒绝家庭。对此，我们想说的不是城市公社中的这些新的社会共同体是一个天堂，而是想说在旧的生活方式彻底陷入了困境，而处于危机中的地方，总会有建立集体生活并逃离传统的尝试。

关于“伴侣”的论战、公有财产的建立、所谓的“鞋盒”<sup>183</sup>、互助网络、为了支持不得不在国外堕胎的妇女而进行的集体旅行，以及在一些社区中举行的众筹，这些就是政治干预的新面貌。叛逆现象不仅体现在思想或者具有革命性的组织上，这些新形式的反对主流的力量来自个人的视角。日常生活的革命意味着追求充满激情、欲望与动力的新前景。

在这一背景下，七十年代的自主团体正处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在一方面，它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被框在了工人主义（obrerista）的运动结构中，但其着重于巩固有能力推动集会和独立工人运动的自主工人组织。另一方面，工人斗争的实践与智力上的需求，使他们脱离了工人主义的僵化模式。工作条件，甚至工作本身，有时都成为了无法忍

---

人委员会，巴塞罗那，《伊比利亚之轮》，1972年，第35,41和97页——原注

<sup>182</sup> 城市公社是指由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小组所租用的房子，其目的是为了试验脱离家庭的生活模式。在这些公寓中曾一起住着工人积极分子、艺术工作者和失业者。这些公社是为了发展具有自由意识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社会生活方式。——原注

<sup>183</sup> 其之所以叫作“鞋盒”（caja de zapatos），是因为房子里的每一位成员把他们每个月赚的钱存在这个盒子里，其余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取钱。至少有两种鞋盒组织，一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将所有的当月工资放在盒子里，并根据需要从中取钱，另一种方法则在马德里的乌塞拉（Usara）一些公社中被使用，其中的钱只能用在最重要的花费上：医疗、教育和交通，而剩下的部分则收到公共盒中进行单独管理。——原注

受的东西。

很难确定转折是在何时发生的，平衡又在何时崩溃，但毫无疑问，1976年标志着工人斗争周期的转折点。维多利亚惨案<sup>184</sup>为整个生产关系敲响了丧钟。尽管全国工人的多次罢工与斗争的前进势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而且在1976年也排除了所有的困难，但从那时起，运动便陷入了普遍危机，它受到了一种政治意愿的桎梏——哪怕是最微小的工人自主要求，都会遭到坚决的压制。在福特制生产周期的心脏地带，在生产线上不再能进行激烈战斗，而罢工、冲突和不服从，已经成为了战斗精神的唯一来源。一旦战斗精神与工人斗争的关系破裂，关注于工厂就不再有意义。

因此，在1976年至1978年间开辟了新的政治舞台。大致来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出路就是，一些积极分子离开了工厂与工人斗争，转向生态或女权主义。有成百的工人团体离开了工人斗争的周期，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投身于反文化并在农村开展公有制实验。于是，所有最激进的和各类的自主团体的工会，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比利牛斯山区和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农村公社。这并不是唯一的做法，许多其他组织也开展了小型的经济、合作与商业计划，试图将激进组织与社会实践融入经济生活，以此使他们不用回去工厂工作也能克服危机。酒吧、书店、印刷厂和小商店成为了成千上万工厂工人的退路，这些人都希望从劳动周期的危机中找到出路。

另一条出路是，至少在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里，自我管理也被视为了一种可能。正如关于自主的政治思想中所说的那样，大部分自主

---

<sup>184</sup> 1976年1月，巴斯克地区工人举行罢工，反对限薪令，要求改善劳动条件。3月3日，工人在巴斯克地区首府维多利亚的一所教堂里召开誓师大会，准备举行总罢工，遭到西班牙武装警察开枪镇压，导致5名工人丧生、150多人受伤，史称“维多利亚惨案”（Sucesos de Vitoria）。——中译者注

的要求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远景，即工人能够（自我）组织生产、管理工厂甚至整个经济体系，而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危机中，一些工人集会面临雇主关厂时，便自己接管了工厂。正是这一如此矛盾又激动人心的时代，让若阿金·若尔达<sup>185</sup>拍出了《怒马克斯记事》（Numax presenta）和《二十年并非虚度》（Veinte años no es nada）这样的电影。这两部作品反映了危机后由工人实行自管的怒马克斯工厂的生活。在第二部电影中，若尔达收集了经历过这些事件的那些人二十年后的生活。贯穿两部电影的主线是员工自己组织的告别晚会——那是在接管公司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最终决定关闭工厂。怒马克斯的工人们在镜头前的道别时刻，它想要表达更深层次的含义，除了对工厂的管理方式的讨论之外，它还要说明该打倒的敌人是工作、是这个生产制度本身。用电影里一位工人的话说就是：“我很清楚，我再也不想工作了。”

二十年后，当时的怒马克斯工人没有回到工厂，而是去寻找更自主和独立的工作。在电影《二十年并非虚度》里，一些工人退休后回到了农村，一些人已经没在做个体或者非正式的工作了，还有一些人在做犯法的“兼职”。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离开怒马克斯都意味着结束工厂生涯，回到了学习中去，或者去追求更富创造性的、并能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生活方式。



纪录片《怒马克斯记事》(Numax presenta)

---

<sup>185</sup> 若阿金·若尔达·卡拉塔（Joaquim Jordà Catalá，1935年8月9日——2006年6月24日），西班牙导演。——中译者注



实际上，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危机是1973年爆发的全球性危机中最常被引用的两个经济概念，它们对工人阶级在主观上的重组，以及我们能够称之为新“伦理经济”（*economía moral*）的工人阶级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最年轻的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工人运动中有一部分最勇敢大胆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自主计划充满自信，甚至——就像若尔达在电影里所展示的那样——敢于挑战产业组织的衰落。面对一场导致大规模危机和就业调整的崩溃，他们在那些被自己的老板抛弃的工厂中实现了自主。怒马克斯或者CYFISA<sup>186</sup>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在这两座工厂中，工人不仅将占领工厂视为抗议的手段，还将其转变为了工人对生产进行控制的试验<sup>187</sup>。

简而言之，七十年代临近尾声，但即将结束的工人斗争浪潮冒出了改变周期的想法，产生了克服周期的意识。人们容忍工厂、装配线和工作折磨，只是因为政治上存在着通过积极斗争来赢得一个更富饶、更富裕的世界的可能性。一旦罢工的周期结束，工作又暴露出了它凶残的本性。而除了可鄙的工作条件以外，工作本身也被拒绝了。由于不会再有像弗朗哥时期最后几年那样的斗争，在大多数工会、雇主与政府之间达成新协议的反攻面前，斗争也被打退了，工厂和工作开始变得难以忍受。逃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意味着生存。同样的寻找出路的需求，也为西班牙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除了一些主张之外，它还推动了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反抗，并以此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欧洲情境主义者<sup>188</sup>小组在整个欧洲的反文化运

---

<sup>186</sup> 由于其自我管理实验的激进性，它是最著名的工人自我管理工厂之一。冷热工业（*Calor y Frío Industrial S.A. CYFISA*）总部位于布尔戈斯，为了克服危机，前工人在1978年占领工厂。这次占领持续了几年。——原注

<sup>187</sup> I·加西亚-佩罗特·埃斯卡丁（*I. García-Perrote Escartín*），《占领罢工》（*La huelga con ocupación de lugar de trabajo*），马德里，akal，1981年版，第37页——原注

<sup>188</sup> 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一个由先锋派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这些人以社会革命家自居）组成的左翼国际组织。该组织成立于

动的文学背景以及战略转向的需要下，在这些新的战斗场所中如鱼得水。这样一来，就走出了以往将工人作为斗争主体的观念。另一方面，表达对制度的反对，已采取了不同的角度，例如对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支持，反对纪律机构的斗争。这就重新划定了社会斗争的疆域，而在 1977 年，工人运动已明显疲乏了。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仍是模范与先锋的工人亚文化，被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取代了。这些形式已孕育了十多年，如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争取免费与自由堕胎的斗争、反核运动或反监狱运动，此外，各种文化传媒也进行了表达和美学上的尝试。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些社会、政治与文化表达新形式是如何诞生，并在七十年代中期工人主义与反弗朗哥左翼运动的旧世界中崭露头角的。

## 地下运动与反文化：社会自主的形式与潮流

“金斯堡的《嚎叫及其它诗》(Los aullidos)、从海特-阿希伯利 (Haight-Ashbury)<sup>189</sup>发起的嬉皮士文化、美国 1968 年选举的狂欢——当时一头猪被选为芝加哥议会的主席，成千上万的人向那应许之地朝圣：神秘主义者、流浪汉、另一类工人、新的农民、手工艺者、合作社成员和极左派积极分子。所有这些都带着对‘可

---

1957 年，解散于 1972 年，主要活动于欧洲。该组织被认为是对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有极其重要影响的思想母体。——中译者注

<sup>189</sup> 海特—阿希伯利：又称“嬉皮街”，位于旧金山，原系工人住宅区，60 年代起成为嬉皮士出入之地。——译注

能性’和‘可实现’的希望，抛弃了保障生活的工作。其他那些被边缘化的、那些仍在工作中的，但总的来说属于一种新的革命类型的工人，他们正在实践着并尝试着自己寻找方向，在看不见前途的艰难革命前景中开辟道路……”

“马克思已死，无政府当立”

(Marx ha muerto: Viva la anarquía)<sup>190</sup>

我们在此回顾反文化以及最后无法实现的社会自主的形式与潮流。我们要以两种视角来予以全面考察。一方面，我们要指出，自由的或社会自主的空间，在更高组织化的层面上关乎反制度的斗争——社会边缘化、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反精神病学和同性恋运动，在很多情况下都保留和再现了大部分极左派的争论，可以说，它们都是纯粹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由的空间或者创造性自主，与剧院、漫画、文学和电影中诞生的自主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它们也在不断融合。这种有点教条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反文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方面，它以社会最活跃的部分

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管理，其二则在于七十年代运动在整个文化创造领域的解放。

1977年7月22日，



《蒜泥》(Ajoblanco) 杂志

<sup>190</sup> P·里瓦斯 (P. Ribas), 《公社往何处去》(De que van las comunas), 马德里, 镐头 (La Piqueta) 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 页——原注

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古埃耶公园（Parque Güell），庆祝国际自由日。7月22日至27日，来自欧洲各地和全国的人们聚集在了巴塞罗那，提出新形式的行动和政治干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加泰罗尼亚全劳联和《蒜泥》（Ajoblanco）杂志成为了活动的主导者。通过参与活动的生态、女权和同性恋组织，它们汇集了从与工人斗争关系最密切的到最接近文化方面的，当时所有的另一类表达方式：剧院、漫画、电影和音乐。

从地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批评与斗争空间。通过每日的熏陶，这种斗争的文化意识在一些杂志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反映。首先是《自行车报》（BICICLETA）、《晨星》与《蒜泥》为各种团体和个人提供了参考和新的方向。从广义来讲，在这些杂志的影响下，尽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具体观点（图像或文字的，无政府主义或反文化的观点），还是诞生了许多与斗争的特定方面有关的出版物，也就是说，在题材上满足新兴运动需求的出版物。因此，为了建立地下和独立剧院，创办了《第一幕》（Primer Acto）和《草台班子》（Pipirijaina）；为了激进女权主义创办了《女权辩护》（Vindicación feminista）和《夏安娜》（Xiana）；以及为了绿色出路运动创办的《苜蓿》（Alfalfa）和《生态主义者》（El Ecologista）。

这些杂志在过渡时期的作用，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只要来看它们的出版量就能得知它们的巨大影响力了：《自行车报》、《晨星》与《蒜泥》从一开始的30000份增加到后来的70000份。在没有像八十年代的收音机那样更直接的媒体时，杂志就成为了协调新一代的颓废派、嬉皮士、地下流行文化与反文化的媒介。实际上，这些杂志中的每一本都传播得相当广泛，它们成为了在农村与城市公社的交流与协调手段。这些杂志被用来在全国建立许多公社，甚至帮助了许多协会的建立，比如总部在马德里的繁荣自由协会（el Ateneo Libertario de Prosperidad）。

这些交流手段还被用来打破运动的地域隔阂。通过与全国各个地区同样不满的人建立联系，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城市间的，当然也包括农村间的孤立。去中心化、建立交流的地下方式和提出新颖的意见，这些要求出版团队在交流与寻找题材方面——就像出版书籍与杂志一样——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从这些杂志中产生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其他观点和看法的出版者。与《自行车报》合作的星光图书和空旷地出版社（Editorial Campo Abierto）就是出版转向的两个例子。通过有关社会边缘化、同性恋、生态主义和精神病的文章，它们为当时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由此，西班牙反文化找到了一个社会化和进行表达的场所，并为社会思想提供了通俗的参考。各种书店、自由协会、公社、大学、广场与酒吧成为了充满实验激情的运动的新出发点。

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等概念，已从一些领域传播到另一些领域。地下漫画的格言是：自我出版、无视商业组织和审查而直接发行，于是我们能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发现它们，比如响板 70（Castañuela 70）剧院、加泰罗尼亚导演与演员集会的《唐璜》（Don Juan Tenorio）和《蒙面罗洛》（El Rollo Enmascarado）的儿童漫画（Tebeo）。独立和不羁的激情像火药一样点燃了地下剧院。像塔巴诺（Tábano）、格里阿多（Los Goliardos）、“吟游诗人”<sup>191</sup>以及快活的巴耶卡诺（el Gayo Vallecano）等小组开始打破了审查制度的牢笼。实际上，大学、高等学院、独立的节日、工厂和社区协会就是地下剧院的最佳舞台。这些现场表演——比如集体自主创作的响板 70 剧院与由斯玛施配乐的拉夸德拉（La Cuadra）出品的《安提戈涅》（Antígona）——都是反对一切暴政和权力的真诚呼吁，而早在 1970 年，在这些面世之前就产生了独一无二的集体创作。

---

<sup>191</sup> 吟游诗人（Els Joglars）是西班牙的一个独立剧团，1962 年成立。该剧团反对弗朗哥政权，多次被禁。1977 年以后支持工人社会党，反对君主制。——中译者注



响板 70 (Castañuela 70) 剧院  
1970 年代演出图

后来，导演与演员集会占领了巴塞罗那的狄安娜厅 (Saló Diana)，自行上演了古希腊戏剧《希腊人》(El Grec)，并在 1976 年进行了将近两个季度的独立剧院的自我组织，这是当时戏剧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这件事因遭到审查和随后的控告而广为人知，在

1978 年，“吟游诗人”的作品《归还》(La Torna) 标志着这次史无前例的创作过程的最后一次高潮。有趣的是，当戏剧在西班牙为生存而战的时，在美国光是只出版西班牙作家作品的西班牙地下剧团就有大约十家。在包括路易斯·里亚扎 (Luis Riaza)、弗朗西斯科·涅瓦 (Francisco Nieva)、何塞·玛丽亚·罗德里格斯·门德斯 (José María Rodríguez Méndez) 和阿方索·萨斯特 (Alfonso Sastre) 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剧院本质上是打破社会常规的地方和表达政治不满的舞台。

因此，剧院提供了表达新的社会问题的道路，对民众开放了遭到禁止的领域。这些街头艺术、狂欢节表演和对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激烈批判，除了表现社会现实主义以外，戏剧形式还从室内剧院转变为了更具革新性的实验，让戏剧更接近工人阶级，也提供了进行社会批判和表达异见的空间。

无论如何，不管是剧院还是杂志，漫画还是音乐，它们只不过是忠实反映正在酝酿中的深刻社会变革。直至那时，阶级问题一直是政治话题的重点，但新的批评声音不仅打开了对弗朗哥社会和资本主义批判的新领域，而且也作为特定的运动发展起来了。那以前，它们

还只是与左派组织相伴生。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女权运动的诞生与围绕着性开展的斗争中，引发了围绕阶级斗争和工人作为政治主角的传统模式的危机。诸如堕胎、同性恋、对家庭的批判、离婚和妇女斗争之类的问题开辟了一些战场，它们允许了其他角色出现在反对弗朗哥和民主过渡时期的统治形式的斗争中。

以巴塞罗那为例，奥卡尼亚、纳萨里奥还有他们的同志卡米洛（Camilo）和亚历杭德罗（Alejandro）等人，他们在街头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即同性恋运动。由1969年的石墙事件在骚动的纽约引发的同性恋运动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sup>192</sup>。那间纽约酒吧所引起的反抗，代表了全世界反对性隔离与恐同的同性恋斗争，它在西班牙激起了广泛的回应。

这些事件发生不到几个月后，西班牙颁布了《社会危害法》（*la Ley de Peligrosidad Social*），其中将同性恋定义为犯罪行为。这是同性恋人群在历史上遭受的又一次迫害。但这一次，地下同性恋者懂得要作出回应<sup>193</sup>。同年，第一批同性恋团体诞生了。同性恋支持平权组织（*Agrupación Homosexual para la Igualdad Sexual*, AGHOIS）是第一个出现的，但很快随之出现了马德里的墨丘利（*MERCURIO*），在加泰罗尼亚、斯蒂利亚、巴利阿里群岛和瓦伦西亚地区的男同解放阵线（*los Frentes de Liberación Gay*），由此结成了团结的同性革命行动阵线。这

---

<sup>192</sup> 石墙事件（*Stonewall*）被认为是男女同与跨性别的骄傲的首次反抗，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里，平时习惯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易装皇后、疯子们、女同和男同（*chulazo*）们，他们决定打破警察对他们的其中一家夜店“石墙”的封锁。第一次，那些被虐待的、被骚扰的、受到侮辱和大规模逮捕的人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那天晚上，发生了首次由争取男女同性恋权利而发起的骚乱，并由此诞生了骄傲日。——原注

<sup>193</sup> M·索利亚诺·希尔（*M. Soriano Gil*），《过渡时期西班牙的同性恋移民》（*La marginación homosexual en la España de la Transición*），马德里，*Egales*，2004年版——原注

些团体不仅反对独裁，而且也同样反对无论是激进还是温和的主流反对派——这些反对派都以最“善意”的态度，将它们的主张放在次要地位。更糟糕的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胡说中，同性恋被视为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恶习。

1977年举行了第一次同性恋游行，但它并没有得到左翼各派别的真正支持。除了一些自由主义团体、全劳联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之外，没有其他组织参与到被置之不理的、要求取消1970年《社会危害法》的运动中。

无论是在《社会危害法》还是其他更高级别的法律（例如《民法》或《刑法》）中，妇女都同样被继续排除在立法外。在立法机构中，妇女始终处于少数。例如堕胎、离婚、“通奸”或性自由之类的问题，都受到了法律的严重歧视。1976年3月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妇女节和1982年毕尔巴鄂对堕胎妇女的判决，也许是过渡时期女权斗争最重要的两座里程碑。

但是，在那些年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来自圣阿德里亚·德尔贝索斯（Sant Adrià del Besos）的玛丽亚·安赫莱斯·穆尼奥斯（María Ángeles Muñoz）的事件<sup>194</sup>。玛丽亚·安赫莱斯在1976年被丈夫控告通奸。她的丈夫抛弃了两个女儿，在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生活了数年，还想用通奸的罪名把两个女孩从她身边带走。在该案的耻辱与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的积累之下，人们以大规模的女权运动的动员，组织起了抗议活动，准备了充分的法律工作来为被告辩护，并为取消《民法》与《刑法》中的歧视性法律进行了斗争。在“我也是通奸犯”的口号下，成千上万的妇女与玛丽亚·安赫莱斯·穆尼奥斯一起进行了示威，一年后她成功驳回了丈夫的控告。

---

<sup>194</sup> M·A·拉伦维（M. A. Larrumbe），《过渡时期的女权行动与话术》（Las que dijeron no. Palabra y acción del feminismo en la Transición），萨拉戈萨，PAZ-EAZ，2004年版——原注



以同样的方式，当代人的叛逆与敌对的反文化瓦解了传统左翼的旧组织机器，正是性别问题让阶级话题的核心地位陷入了危机。妇女的斗争、女权主义的话题与同性恋问题将这些人放在了政治的中心，他们远非理想中的“组织良好又纪律严明的（男性）工人”——绝大部分的极左派以不同方式将这些人作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主角<sup>195</sup>。事实上，在女权主义的实践中，有关劳动的观念明显地扩展到了从事家内劳动、家庭纺织或临时工的妇女群体中间。这些是在传统的劳动分析中不被承认的一系列工作。换句话说，在原来的性别歧视下，千百万在家中操作生产机器的女工们，都是被从斗争中排除的。

因此，在这种氛围下，妇女组织为了逃离工人主义的二元论而组织起来，这绝非偶然。于是，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反权威革命反父权制联盟（Liga Antipatriarcal de Mujeres Antiautoritarias y Revolucionarias，LAMAR）、妇女解放阵线（el Frente de la Liberación de la Mujer）与《女权辩护》（Vindicación feminista）杂志捍卫了女权运动和妇女自主的立场。这是一场旨在支持和推动以妇女为主角的斗争的新运动<sup>196</sup>。



《女权辩护》（Vindicación feminista）杂志，1977年8月

<sup>195</sup>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参看 B·温鲍姆（B. Weinbaum），《社会主义与女权的奇妙联姻》（El curioso noviazgo entre feminismo y socialismo），马德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78年版——原注

<sup>196</sup> 对于那个时代的争论，可以参看《女性劳动者的最初时光》（Primeras jornadas de la mujer trabajadora），马德里，1977年版；M·瓦庸（M. Bayón）与 G·拉萨罗（G. Lázaro），《家内劳动者：第三阶级的女工》（Empleadas del hogar: trabajadoras de tercera clase），马德里 Zyx，1976年版——原注

实际上，女权运动和妇女自我组织的经验也融入了工人运动，至少在女性参与度很高的冲突中，为工人运动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别的意义。洛卡妇女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们在加瓦工厂的罢工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位于工厂旁边的洛卡镇上，妇女们组织起来并给我们提供了为争取尊严和自主而斗争的典范<sup>197</sup>。同样在其他的冲突中，我们也能将性别问题的重要性看作决定性的因素，以及与传统工厂斗争相异之处。马德里的 INDUYCO 工厂是一家重要的纺织工厂，女工在罢工中的主角地位为这里的罢工赋予了别样的色彩<sup>198</sup>。在这些场合中，妇女组织走上了前台，使得关于性别的争论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在“手里的大棒”的镇压和心理学家提供的“材料”下，起来反抗的妇女们的斗争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除了诸如工资、工作日和企业卫生条件（尤其是在英格列斯百货（El Corte Inglés）的例子中）这些重要的问题之外，她们通常还要面对领导的性骚扰和心理学家的评估，这些是男性工人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这些条件也对罢工的目标产生了影响。

这是妇女在工人运动中扮演角色的一些例子。但是，只有把新的女权运动理解为严肃的要求，才能充分理解它。生态主义、争取同性恋与反社会压迫斗争，以及试图打破独裁统治秩序的另一类生活方式的出现，都是让弗朗哥政权逐渐无法统治的原因，并且它们也在接下来数年的重大斗争中成为了主角。

在统治无法维持且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除了用经济危机来给政权续命之外，只有在根本上进行政治和经济的重组才能挽回可能会危及议会政治的局面。

---

<sup>197</sup> 洛卡妇女，《洛卡女性的话》（*Hablan las Mujeres de Roca*），巴塞罗那，自由女性，1977年版——原注

<sup>198</sup> INDUYCO 女工们，《INDUYCO 女工讲述的故事》（*Trabajadoras de Induyco cuentan su huelga*），马德里，自由女性，1977年版——原注

## 失败、幻灭与朋克：从过渡时期走向虚无

“失去希望，失去幻想， / 问题没有解决，  
它还在那。 / 我们的生命耗尽，脑袋被破坏，  
 / 我们的身体像霉运一样倒下。 / 过去的已经  
过去，对他来说什么也不需要。 / 失败是现实，  
看不到未来。 / 谎言是命令，谎言是感觉，  
 / 真相很无聊，他妈的没意思。 / 我更想懦夫  
般死去 / 懦夫般活着。 / 我们的生命耗尽，脑袋  
被破坏， / 我们的身体像霉运一样倒下。 /  
恐惧成为习惯，害怕死亡。 /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已经死了……”

坏血病乐队《被破坏的大脑》

(Eskorbuto, «Cerebros destruidos», 1986<sup>199</sup>)

1977 至 1978 年，费利佩·冈萨雷斯<sup>200</sup>和安达卢西亚社会党仍与

---

<sup>199</sup> 参见 D·赛尔丹 (D. Cerdán), 《坏血病：悲惨故事》(Eskorbuto: Historia Triste), 马德里, 火星出版社 (ediciones Marcianas), 2001 年版——原注

<sup>200</sup> 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尔克斯 (Felipe González Márquez, 1942 年 3 月 5 日——), 出身于牧民家庭。1964 年加入工人社会党。1965—1969 年任社工党塞维利亚省委委员。1969—1970 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71 年因参加反对弗朗哥政权的游行而被捕。1974—1979 年、1979—1997 年任社工党总书记。西班牙民主化后, 于 1977—2004 年担任国会议员。1977 年以后带领社工党逐步抛弃马克思主义, 转向社会民主主义。1982 年在国会大选获胜后, 于 1982—1996 年任西班牙首相。1989 年 1—6 月、1995 年 7—12 月任欧洲理事会代理主席。2004 年退休。——中译者注

地下世界的朋友保持着联系。他们从安达卢西亚反文化的形式中确实学到了很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白白地出现在最好的戏剧团体和讨论圈子里。但是，这场闹剧从 1977 年开始就继续不下去了。斯马施小组的精神领袖胡里奥·马蒂托<sup>201</sup>（Julio Matito）与费利佩·冈萨雷斯断绝了关系。同年，在选举和高调的政治活动同时，他意识到整个极左翼，尤其是自主团体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早已有所察觉。政策都是在党的总部和金融巨头的宴会桌上制定的。“社会精华”们已经上位，没有地方留给革命和谈情说爱了。

毫无疑问，加泰罗尼亚的全劳联受到了最严厉的警告。1978 年 1 月 15 日，在一部分统治阶级的命令下，通过警方的内线华金·甘宾（Joaquín Gambín）的策划，在一次全劳联举行的示威后，斯卡拉大厅（la sala Scala）被纵火烧毁了。此事疑云重重，但在这个大多数工人都是全劳联成员的地方，死了四个工人，这一事实对已经衰弱的无政府工联主义的组织几乎是决定性的打击。在媒体煽动的恐惧下——它们把全劳联叫做恐怖主义组织——大规模的会员退籍使得工人自主小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之间最后的进行融合的尝试——其目的始终为了在社会协定的过程中站稳脚跟——瓦解了。只有 1978 年的加油站罢工尝试着建立活跃且稳固的斗争阵线，但全劳联再也没能回到 1977 年它在加泰罗尼亚的 70000 名会员的规模了。

工人运动中的集会肢解，或被驱逐到了更小的平台、协调组织和工会当中，尽管工人在一些产业和公司里还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始终处于孤立状态。法律的制定、七十年代末的危机，以及社会党政府在与大型工会的密谋下进行的产业转型，摧毁了形成自主斗争运动的

---

<sup>201</sup> 拉蒙辛（Ramoncín，1955 年 11 月 25 日），原名何塞·拉蒙·胡里奥·马尔克斯·马丁内斯（José Ramón Julio Márquez Martínez），西班牙摇滚乐音乐人、演员、作家、主持人。此处胡里奥·马蒂托（Julio Matito）为昵称。——中译者注

最后机会。

已经参加了政府的体制内左派，他们的路线可以归结为：为了应对由于经济和政治转型带来的危机，工会的秩序对于体制结构来说是必要的。但当历史的火车头开过时，社会现实遭受了深刻的瓦解。失业人数<sup>202</sup>（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人数）以及民主的氛围，开启了政治的制度化时代，这一点也在前几年反映在了社会创造力的枯竭上。

在颓废的环境下，只留下了脱去内核的反文化和地下运动。马德里的莫维达（La Movid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已经不是一项进攻的运动了，而只是被雇主们控制着的、已经走出地下的荒诞而华丽的庆祝活动了。它只能让抛弃了受海洛因影响的街区和失业的年轻人的同一个马德里气急败坏罢了。无论如何，不管社会党的“进步”市长们怎么在全国兜售着自己的“幸福八十年代”，却还是被迫进入了摇滚的时代，他们并不能掩盖新一代青少年不得不经历的苦涩失败。

尽管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半岛的地下运动并没有结束在反文化运动的民俗博物馆里。1977年，特里亚纳（Triana）小组在视觉上反映了这场“灾难”，它出版了《烦恼（与痛苦）之子》（Hijos del Agobio (y del dolor)），这首诗描述了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期。同样，在八十年代的马德里，尽管由阿莫多瓦和阿拉斯加（Alaska）引领的电影潮流，渐渐远离了大“繁荣”、科学技术协会和自由协会的时代<sup>203</sup>，在这里还是出现了一些虽然没那么专业，但在文字上更为激进并且更加接近生

---

<sup>202</sup> 1976年的失业人数为615240人，而在1981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00万，其中突出了青年的失业情况：在某些经过结构调整后，在没有就业机会的工业区中，失业人数的比例接近40%。——原注

<sup>203</sup> 在马德里的“繁荣”社区（El barrio de Prosperidad）是自由主义反文化的摇篮，在其中的街道里有科学技术协会（Ateneo Politécnico）和自由协会（Ateneo Libertario）、公社运动的典范、周边工作室（la elaboración de fanzines）和马德里朋克音乐的总部。在其他的街道中还能见到传说中的马德里朋克沙龙、CBGB讨论会（el CBGB del foro）的摇滚潮沙龙（la sala Rock Ola）。——原注



坏血病乐队 (Eskorbuto)

活中的绝望的社区团体。无论如何，在巴斯克出现了新时代的最好作品。比如，坏血病乐队<sup>204</sup>也带上了朋克风格，传遍了处于整个欧洲社会边缘的工人阶级的子女中间。它没有采用莫维达那种纯粹艺术性的华丽风格，在这里，社会问题、愤怒和沮丧采取的是真正交流的形式。

朋克打破了旧的范式，并朝着它们的反文化先辈，朝着与资本——它继承了自己的过去——共同坐在权力的交椅上的七八年代的人们脸上啐了一口。于是，地下美学与道德之间的结合就破裂了。在人口最多的社区中，窒息的青年们陷入了失业、拒绝工作和毫无出路中。八十年代真正的新贫民窟不是由莫维达，而是由巴斯克激进摇滚（坏血病乐队、波拉唱片（Polla Records）或“疤痕”（Cicatriz）、重金属音乐（奥布斯和红男爵）（Obus y Barón Rojo）、社区摇滚（rock barrial）和边缘摇滚（托波（Topo）、莱尼奥（Leño）和阿斯法尔托（Asfalto），以及加入了海洛因与监狱元素的混合弗拉门戈（班比诺（Bambino）、洛斯卡利斯（Los Calis）和春季托斯（Los Chunguitos））将其表达出来的。

但是，在朋克中还具有别的意义，因为这场运动在新危机面前很好地找到了自己采取的立场。因此，朋克很快就成为了受诽谤和争议的话题。在主流的流行音乐杂志《振动》（Vibracion）中，在“现代的东西”一栏里，朋克在文章中和社会败类、谋杀者和强奸犯被列在一起。它始终都被指向犯罪。而《晨星》则相反，它很早就考虑到了朋克运动的“政治意义”，并给莫蒂默（Mortimer）、危险与河边菊乐队

---

<sup>204</sup> 坏血病（Eskorbuto）是巴斯克地区的一支朋克摇滚乐队，也是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朋克摇滚乐队之一，1980年成立。1999年以后停止活动。——中译者注

（La Banda Trapera del Río o Peligro）等团体提供了足够的版面。它是为了追随这种边缘激进音乐的新风格的足迹，这种风格让人们能够“在精神上活着”。

或许简要来分析其中一个团体，危险与河边菊乐队的发展历程就够了。它诞生于 1978 年，同年拉蒙辛与跨国 EMI 签约。在他们的队伍中也有曾是哈里·沃克工人的莫尔菲·格雷（Morfi Grei），他们全部来自康奈拉（Cornellá），那是巴塞罗那最压抑的社区之一。他们的格言是“减少对朋克的惩罚”，这是在七十年代末经历着危机的年轻人的明确态度。朋克也因此成为了反抗的方式，也许它也是为了习惯失败和沮丧、在危机中生存并找出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从体制的底层往前走而不是低下头的首批文化上的尝试。虚无同样也是面对失败的一种方式，它是生活在失败中的方式。

但是，这些年远非平静和安宁的时期。输掉了“最后的斗争”之后，大部分人都处在新的消极环境下，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考虑新的战斗。生态主义运动得以重组；他们还组织了第一次拒绝服役的运动；甚至在 1979 至 1980 年的学生运动中，有三名学生在反对新大学改革的抗议中死在了警察的手上。在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阿斯图里亚斯运动中心的工人斗争也不容忽视。在所有的这些场合，沮丧并不能阻止“小型起义”的发酵。旧的革命工具应当被其他的战斗武器所取代，如果说政党组织和工会陷入了危机，那是因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观念也使工人主体受到了冲击。

无论如何，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生活希望的破灭和绝望。因此，有必要再次提到朋克的“无未来”（no future）。朋克蔑视一切放弃了革命，还企图用危机、失业和海洛因来管教青年的人。八十年代初，在朋克中还带上了另类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这一文化现已进了博物馆。大城市里的社区失去了生活的标杆，也不遵守任何规矩和制度，这意味着到了在生活中创造新文化的关键时期。朋

克是他们最好的武器，海洛因则是他们最坏的敌人。正如坏血病乐队在《城市之鼠》（*Ratas de ciudad*）中所唱，在危机和幻灭之间，新一代人同时面对着新的叛逆形式和海洛因上瘾。为此付出了数万人的生命。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没有人记得这些民主的牺牲者呢。



## 其他方面：经验的传承

对三名农村工人联合会会员的采访

### 前言

整个五十年代里，安达卢西亚大庄园式的农业结构完成了机械化，从土地上驱逐了大量的劳动者。那是饥饿的年代，战后又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时期，在人口众多的安达卢西亚，等待着人们的是从领班手里发下来的越来越少的工资。之后，农村工人向北方大规模移民。许多人去了欧洲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但大多数人都定居在了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西班牙北部，那里的工厂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手。于是他们从农村到工厂，从小镇到城市，从南方到了北方。大约有两百万安达卢西亚人不得不离开南方的农村，到北方的城市去找工作。他们的生活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他们脱离了过去的的生活，承受了最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的工业区，他们自己建造的新街区里，等待他们的就是这些。

尽管安达卢西亚是欧洲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留守的人们每年仍几个月要外出打工。他们二三十人地举家离开村镇，过上好几个月居无定所的日子。那可是安达卢西亚其他城镇的橄榄、西班牙北部的芦笋和水果，以及法国葡萄的收获季，是马略卡岛的酒店客满的季节。同时，在安达卢西亚城镇附近的田地里，不管是公有还是私人土地，仍旧荒废着，仅用来放养寥寥无几的牲畜。

从 1973 年起，由于经济危机，外出打工越来越受限。对于在安达

卢西亚农村环境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只能组织起来为改变季节性的失业而斗争，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得不到任何社会或失业援助。当时还没有用于社区就业的基金，也没有劳动协议，而安达卢西亚的重大问题即土地改革，仍然悬而未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短工委员会，并于1976年夏合并为农村工人联合会<sup>205</sup>。农工联受到短工以及其他职业人群的推动。它填补了1939年工人阶级在内战中失败后安达卢西亚农村群众在组织方面的空白。

农工联通过一种没有大型结构也没有复杂官僚机构的组织模式，有力地在安达卢西亚的各个村庄发展壮大。其运作方式基于各个地方工会在集会上所做的决定和工作，这样一来它就确保了每个村镇的自治。特别是在塞维利亚南部山区，农工联的诞生意味着安达卢西亚短工在斗争中的自主倾向，在组织方面更近了一步。这样的倾向源自早年农民运动的深刻传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它一直牢牢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成立之初，农工联具有共同的基本性质，这些性质验证了作为短工斗争运动基础的哲学本质，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对形式民主的质疑、自然法所赋予的平等和伦理的价值观、技术对道德与人类进步的服从、公有制和地方上的政治自主权。”<sup>206</sup>

---

<sup>205</sup> 农村工人联合会（El Sindicato de Obreros del Campo），全名安达卢西亚农村地区及农村工人联合会

（Sindicato de Obreros del Campo y del Medio Rural de Andalucía，SOC-MRA），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工会组织，持安达卢西亚民族主义、环保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立场，1976年成立。2007年并入安达卢西亚工人联合会，但继续保持独立运作。——中译者注

<sup>206</sup> 路易斯·奥卡尼亚·艾斯科拉（Luis Ocaña Escolar），《农工联的起源》（Los orígenes del SOC（1975-1977）），塞尔维亚，捕梦者/南方自治与农工联

几十年后，一群工人神父在此基础上重新恢复了组织工作，他们在七十年代初移居到这一地区，自此开始努力地组织短工们。这里，需要提到迪亚曼蒂诺·加西亚的话：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塞维利亚南部山区的男女。我们相信短工们——他们是人数最多也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的痛苦有着具体的原因，也有着明确的出路。因此，我们渴望一个新的村镇和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我们认为，这样的村镇和这样的社会必须由人民的推动和自我组织来实现。”<sup>207</sup>

农工联的创建者们恢复了“耕者有其田”（la tierra pá quien la trabaja）的革命口号，并着手建立一个专门的短工组织：

- 我们宣布自己独立于任何经济、国家、政治团体、雇主或任何机构。

- 内部民主将通过最广泛的民主意识来行使。每位男女会员在集会上享有自由的参与权。

- 工会不能仅限于单纯的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我们还将提出一切涉及社会政治领域的要求。<sup>208</sup>

在制定的总体目标中，它强调要让安达卢西亚农村工人的生活更

---

（Atrapasueños / Autonomía Sur y SOC），塞尔维亚，2006年版第95页——原注  
<sup>207</sup> “伴随着安达卢西亚短工的希望与绝望的基督教社区”。迪亚曼蒂诺·加西亚（Diamantino García）的布道，收录于《如宝石一般》（Como un diamante）一书。作者是迪亚曼蒂诺·加西亚，马德里，新乌托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原注

<sup>208</sup> 农工联的章程，见：<http://www.soc-andalucia.com/estatutos.htm>。——原注

有尊严，并且消除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追求尊严生活的人，只有走投无路才会献身于田野。此外，除了要求具体改善农村工人的工作之外，它还要求为了土地和反对失业而斗争。从结构上来讲，这些要求正是安达卢西亚农村最根本的社会问题。

从一开始，农工联就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运动。后来成员们意识到，应当巩固自己正在获得的权力，不能自限于工会之中，于是1979年他们决定参加几个城市的市政选举。为此，他们在每个村镇都建立了工人联合选举团<sup>209</sup>。他们在多个城镇中获胜。在一些市政中，他们将争取到的权力保持至今。在2007年的市政选举中，他们共取得了九个市政职位，其中有六个是以绝对多数赢得的。在他们控制的市政中，对地方事务进行了高参与度的管理，在诸如就业、住房或公共服务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了成就，确保了人人共享这些资源<sup>210</sup>。

在八十年代下半叶，短工运动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在社会党出台的补贴政策 and 农村就业计划下，农村的动员瓦解了。人们厌倦了外出打季节工和靠农业补贴的施舍过活，对村庄附近土地的要求，不断引发了对大庄园的没收，包括没收英凡塔多（Infantado）公爵和阿尔瓦（Alba）公爵夫人这些人的私有财产。最终，经过长年的斗争，安达

---

<sup>209</sup> 1979年，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农村工人联合会（Sindicato de Obreros del Campo, SOC）为了参加大选，组织了“工人联合选举团”

（Candidatura Unida de los Trabajadores, CUT），该组织于1986年同西班牙共产党、左派共和党联合组成左翼政团“左翼联盟”（Izquierda Unida, IU），1992年改称“工人团结集团—安达卢西亚左翼联盟”

（Colectivo de Unidad de los Trabajadores-Bloque Andaluz de Izquierdas, CUT-BAI），2014年重新改称“工人联合选举团”，2015年退出左翼联盟。——原注

<sup>210</sup> 例如，在埃尔科罗尼（El Coronil），工人联合选举团的市政府重新评定，并公有化了所有打算要城市化的土地，免费将它们作为福利提供给想要住房的城镇居民。接着，市政府将一定数量的房屋建设委托给了一家公司，在建成后就将这些房屋，以抽奖的方式和成本价出售房屋。即便如此，在2007年的市政选举中农工联失去了绝对多数，而政府则由工人社会党接管了。——原注

卢西亚议会被迫准许将大地产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们。此后，他们一直在发展自己的生产项目，至今为止，他们已经在塞维利亚南部山区和加的斯北部的不同城镇建立了九个生产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每个人都拿同样的钱，但利润不会被分配，而是重新投资给合作社本身。这样一来不仅保证了参与者的工作，也保证了附近村镇许多人的工作。

农工联始终在和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模式，并与真正摧毁安达卢西亚农业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进行斗争。为此，他们还要求粮食的主权，并与转基因组织和农村世界的“被遗忘”作斗争。于是，他们也一致对生态农业（包括生产方式的方面）提出要求，特别是比亚马尔廷绿色合作社（la cooperativa La Verde de Villamartín），还参与了农民道路运动<sup>211</sup>。

近年来，农工联巩固了它在安达卢西亚工人中，尤其是在阿尔梅里亚西部（el Poniente de Almería）的温室和维尔瓦的草莓田中的移民短工中的地位。多年来，它一直在揭露雇主的违法行为，尝试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在厄尔埃西铎（El Ejido）与尼哈尔（Níjar）等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在意识到工人世界中发生的变革后，农工联尝试着扩大其组织，提高它在工人当中的影响力。它与工人自主（Autonomía Obrera）——加的斯一个小规模但富有战斗性的工会，它在各个产业都享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及其他一些团体推动了安达卢西亚工人工会<sup>212</sup>的建立。它的主张是在安达卢西亚建立一个“另一种类型”的工会榜样，并以反资本主义立场参与到那些条件最不利的工人阶级部分的斗争中

---

<sup>211</sup> 农民道路（Vía Campesina）是一项国际运动，其旨在反对全球的农业自由化和工业化。在这项运动中，组织协调了农民组织、中小生产者、农村妇女、原住民社区、没有土地的人、农村青年和农业移民工人。——原注

<sup>212</sup> 安达卢西亚工人工会（El Sindicato Andaluz de Trabajadores）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个工会组织，持安达卢西亚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法西斯立场，2007年9月23日成立。——中译者注

去<sup>213</sup>。

现在，农工联仍是安达卢西亚农村地区最大的工会。根据它们自己的说法，这是一个“接地气”（a pie de tajo）的工会，几乎没有人不受它的影响。这也与以下事实相吻合：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在安达卢西亚没有其他的社会运动受到过那么多的镇压。除了逮捕、罚款和司法程序外，安达卢西亚议会还对它的生产项目进行了无数的迫害。这也是为什么农工联的人们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弗朗哥独裁统治与得到工人总同盟和工人委员会这些工会不遗余力支持的、安达卢西亚的社会党政权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抗。他们抗议过美军在洛达（Rota）和莫龙（Morón）建立军事基地，举行了一系列（被大多数工会从中作梗的）罢工、阻断道路、为防止失业而发起棉花收割机停工的运动、占领政府办公室和塞维利亚与马拉加机场、进军马德里、征用地主粮食、捍卫安达卢西亚自决权……经过三十多年的斗争，他们的成功和错误使他们在安达卢西亚和西班牙，乃至世界上其他地区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 访谈

“为了学会战斗，先要去学习。”

小镇居民的话

这些组织诞生于七十年代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至今活跃且富于战

---

<sup>213</sup> “与会的所有组织和工会团体都相互承认是安达卢西亚的阶级的、自主与独立、民主与集会、团结与国际主义、反父权制、反恐同和反性别歧视的，多元化的并具有明确、清晰和无误的改变社会政治现实意愿的组织。”摘自网上的安达卢西亚工人工会的成立大会记录：<http://www.sindicatoandaluz.org/?q=node/151>——原注

斗性。为了了解它们现在的各个方面，我们对农工联的三位积极分子进行了采访。2006 年底的一个寒夜，他们在塞维利亚的佩德雷拉（Pedrera）当地工会接待了我们。我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在工会内部的几代人的变化，以便理解曾经的无数次斗争给没有经历过斗争、现在和“老近卫军”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留下了什么遗产。这些访谈反映出，在很多事物都已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斗争的意志仍然保持着活力。在受到农工联影响的村镇里，同当地工会的关系较为密切的年轻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可能会把从七十年代开始的短工斗争周期进行下去——也可能不会——的角色，已经出现，并且不断给组织带来挑战。

因此，我们对每个人的个人故事，以及他们加入组织的原因进行了采访。马努埃尔是其中最年长的，在他身上承载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经历，这主要源自他所生活的历史背景。从青年时代起，他的生活就与农工联的历史不可分离了。在他的身后是三十多年的斗争史。相比之下，年轻的罗西奥（Rocío）和切拉（Cherra）介绍自己在农工联的阅历，明显要少得多。来自埃尔科罗尼的 26 岁的罗西奥，提到了他靠拢农工联的原因：

“我来自埃尔科罗尼，加入工会是因为我的家人从一开始就是组织成员，还有一小部分是出于我的个人经历。因为家里的影响，我加入了组织……工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与工会的历史始终活在一起……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我不在这儿……我读的是社会工作，唔，这是因为正好有机会学这个，也因为我就是做这方面工作的。它让我对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有了一些看法。它让我直接认识到现实，毕竟我不是真正的农村劳动者。但这不是我的最后目标。”

另一方面，30岁的切拉（何塞·拉蒙）除了是一名在有佩德雷拉工会的农业合作社里的工人，还是在组织里担任职位的少数年轻人之一。切拉是这样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加入农业工会的：

“我差不多是在工会成立的时候出生的……我的父母一辈子都是短工，他们来自巴塞罗那，是在旅馆或者农舍干活的移民。我的父亲以前在德国打过工。就是说，一家人打了一辈子短工。我很幸运地能够上学，他们为了我全力工作而牺牲了自己。然后我到了塞维利亚去学商科。当我开始工作时，我就已经和工会建立了联系。我开始在工会中开展培训课程，之后负责起了工会的财务工作。于是我有机会在有工会的合作社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农村……记得我小时候，参加过在佩德雷拉这里的‘青年运动’，这是由工会提供的一种非正式教育，主要是教育小孩子的价值观。它不会唤醒你的觉悟，而是让你牢记一些价值观和某些方面的必要。然后，当一个人稍微大一点，已经开始懂事，性格也确定下来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必须要为了某些事物而斗争，当他必须要寻找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地方，会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就是工会。或者说，你在身边和镇上接触的人都是这样。于是在你自立之后，就开始参与并从事某些工作。”

问：在那些农工联占多数的镇子里，所有这些接近工会的年轻一代，传承了过去的斗争并正在成长的人们是怎样在农工联中承担职责的？你们认为这些人是怎样看待组织的？

罗西奥：我认为由于年轻人的参与，组织产生了相当多的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年轻人普遍在各个方面，包括在工会的内部事务中参与的都很少。另一个原因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父母总



觉得自己的孩子像玻璃一样需要保护。他们最上心的总是“不能让咱的孩子缺这缺那”，结果他们的孩子啥都不会，也不知道镇上或家里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再往大的角度来看。它还会产生一种个人主义文化，最后我们只会考虑到自己的迫切需求，以及来自社会的压力，就是人人都要有一辆好车或者一部摩托，才能周末出游或度假。这就使我们就产生了一些错觉，我们所知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被刻意粉饰出来的，似乎我们生活得很好，工会声称的那些问题并不存在，最后我们只关心尽量舒适地工作和过日子。不过，我也认为，组织在让年轻人参与的时候也有些问题。因为年轻人认为他们必须要感受到自己的参与，但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没有感到组织是我们自己的，也不觉得农工联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参与什么，总是被无视在一边。确实有些年轻人还是参与了一些行动，做了一些事情，把组织当作自己的。但这远未达到他们想要的程度。马努埃尔在提到“农村是最后的选择”之前说过，这些情况已经出现在了年轻人中间。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机会，我们也想寻找其他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数工会积极分子的子女中，一些人能够读书，但一些人不能或者不想。我们都在农村生活，但总是将目光投向外面，想着做些别的工作。很多人现在干着建筑业、酒店业或其他行业的工作。但我认为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责任，但他们没有。我认为是在相互推卸责任。那些在组织里干了很久的人，指责那些对农工联无所谓、不想参加活动的年轻人，而我们年轻人指责那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些没那么年轻的人（笑），他们没有给我们空间，没有给我们留下参与的空间，最后就是把责任推来推去，而不是想办法让我们能参与进来。

**马努埃尔：**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在找的话！我们的整个教育都是关于这一点的。

**切拉：**他们确实在尝试。我认为目前，不仅是工会，大家都处在

不情愿和普遍的冷淡中，至少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要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复杂。年轻人处在冷漠的常态中。我认为接近工会的年轻人，是那些曾经在工会担任职务的、或者与工会有关系的、或者是左翼之类思想的人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比起他们的朋友、同学或镇上的邻居更活跃。我认为这些“自家人”有更多的想法，因为当我们做事情或者进行动员什么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要看看是什么事，然后选择性地参与。举个例子，他们不参加，或者很少参加五一活动，但他们会参加反全球化或反战运动。如果工会的话题和行动不仅限于为土地或工会问题而斗争，而是把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包含进来，那么年轻人或许能在这些方面继续前进。他们确实有这些方面的冲动，这样做能让他们参与进来。我觉得，现在也很需要这么做。不仅是因为工会不知道怎么做（让年轻人参与），我认为它能把这两样结合在一起：死气沉沉的年轻人，以及不知道怎么让年轻人参与的工会。在我们当下，只要你过得好了，你就会期望些别的。比如说吧，你可以赚到一千欧元，可以用笔记本电脑，有一辆小轿车，可以去电影院，可以去逛大街，虽说你无法梦想有一栋房子，但这些给你一种错觉，就是你过得很好，于是你对一些事情就不再关心了。我认为，如果你感觉自己生活得不错，你就会参与“反战”之类的活动。就是说，衣食无忧的人会关注这类问题。如果我不用操心生活，我就会去操心打仗的事，因为我无须担心被赶出家门，或者今晚流落街头。我认为年轻人在参与这类活动上，会比较起劲。事实上，工会也经常想搞懂怎么和年轻人一起行动，还有怎样才能让年轻人接近工会。我认为很多时候，无论是工会还是工人联合选举团都是从错误的角度出发的……嗯，我知道其他组织也是这样的。它们说：“反全球化运动动员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们怎么才能参与进去，并把这场运动变成我们的？”如果他们在那里，那么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想在那里。他们如果不想在那里，只是因为你来了，他们就走了。他们在那里，是

由于一些特定条件。他们不在那里，是因为他们顾虑你这个工会的人。我觉得应当好好考虑这些问题……要从有不满和需要的年轻人的看法出发，或许他们并不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有必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也是我们尝试要做的：好好地分析情况，看看如何让人们接近工会，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人们有不满，也想要做些什么。

**马努埃尔：**建立安达卢西亚工人联合会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切都改变了，镇子里的工人阶级也改变了。以前我们九成的人都是短工，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人们都去干建筑、酒店和经商了。很多以前没上过学的人，现在得去学习了。嗯……我从十二岁起开始工作，而现在的人们至少要到十七、八岁才会开始。我是说至少！因为上学的时间也变长了。所以，对于学生、服务生或泥瓦匠来说，农村工人联合会不如对当初的短工们那么有吸引力。当年的短工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就不得不在橄榄堆里干活了，对于他们来说，工会是唯一能让他们在雇主面前维护自己的手段。现在的话，工会不仅是雇主和短工之间的关系，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年轻人的方面我们确实做的不尽如人意，但也有人会接近我们。除了我们的运动，除了工会，我们还参加了村镇的所有协会。我们参加了支持撒哈拉地区、古巴和萨尔瓦多的组织，我们加入了家长协会、邻里协会、糖尿病患者协会……

**罗西奥：**还有妇女协会。

**马努埃尔：**是的，妇女协会，还有心理或生理缺陷者的协会……总之，我们几乎参与了镇上的所有事务，再加上工人联合选举团，就是我们的运动。虽然工会什么都会插一脚，在镇上也有进行管理的一整套组织，我们还是希望年轻人参与进来。现在我们有一个计划，切拉之前在工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报告，我们希望开始做一些教育工作。为了让他们加入，从青年的现实出发，根据年轻人的需求，我们试过办一些工会教育和青年政治教育。我同意罗西奥说的一些方面，我们要成为一堵“不透风的墙”。非常复杂的是……当你齐活

了，当你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那就很难把它交到别人的手上，那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非常喜欢这个组织，特别是……你没有留下什么时间，你没有给年轻人时间来适应，让他们自己去干，而是在旁边盯着，说：“这个你还没有做，现在应该做这个，你必须要做这个，在这里必须要这么来，喂！别睡着了，给我过来，你别……”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边要让他们自己来干，另一边又要和他们说：“我让你来做这个，只是因为我觉得你必须要做这个。”我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罗西奥：**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埃尔科罗尼的地方委员会干了一年，有个女的一直对我说：“小姑娘你还很年轻，但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听听这个“但”字！我确实有很多东西要学，但让我先开口，等我错了再纠正我，先要让我说出我的意思啊。

**马努埃尔：**因为领导工会的都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但还没有退休的人，而现在的人均寿命也延长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才开始活呢（笑），这也让交接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我们都快被接手工作和年轻人弄疯了。实际上，工会内部的行动也总是以此为目标。但我们没有做到，或者说，没能激发年轻人的热情，嗯，但我们还尝试了另一些方法……我们已经在佩德雷拉呆了两年了，在夏天我们总会遇见年轻人，然后我们带他们……不！他们只是离开了，今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是由切拉和罗西奥负责的，他们是年轻人里最年长也最觉悟的。但我们还在尝试，我们在尝试别的镇子里的做法，这样说吧，在我看来……去年我们就有四十多人，不是吗？那么今年……

**切拉：**今年也差不多。

**马努埃尔：**好吧，那些……嗯，我认为“自家人”参与的更少，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他们俩一个也没有去过……那里就是打算让年轻人至少在彼此之间交谈，说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以及能在佩德雷拉做些什么，让他们自己来，不要工会、政党或其他什么来管。如果他们想看看自己能走多远，并承担起重任，试图自己组织起来，那就让他

们承担起在镇上组织活动的任务。之前两次会议的结果，我觉得是积极的，虽然后续也没有别的进展……但这起码是我们打开的一个窗口。然后我们来谈谈教育，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此抱有一些期待。至少我认为，这对于吸引年轻人的加入是非常重要的。

问：周围的人是如何看待你们的？你们的朋友是如何看待你们加入工会的？他们都会说些什么？

罗西奥：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许多年轻人会不会学，他（马努埃尔）在这之前就会对这个制度进行解释，最后指出你的位置，给你在政治上定义，还有就是：“我站在这一边。如果我是那边的人，那我就是反对你的。”这也是个阻碍，很多人都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因为这并不容易，因为要是把他们归到这边或那边，就会让我们的的工作很难进展下去。说实话，现在有多少工会会员或工人联合选举团的人在市政府里工作？我们无法做市政府以外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被排除在它们之外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受这样的牺牲。（人们认为）“我希望有和其他人一样多的机会，如果我已经经过了两年的准备或教育，那我至少可以与其他人平等地获得自己想要的工作。”但我们还有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当……嗯，就比如在（就像佩德雷拉）一些城镇中，市政府的职位很少。现在，在社会党执政的佩德雷拉也是，我找不到什么工作岗位。但即使我们进入市政府后，也得不到多少岗位，因为你总不能走后门吧。我们得比水还要纯洁，必须以身作则。当然了，最后人们会说：“因为有了你们牺牲，我才没遇到更多麻烦”（笑）。此外，工会的事务永远都是牺牲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唉，这就是工会的座右铭，不是每一个人都准备好做出这种牺牲的。

问：但是除了组织的方面。你们身边的人是怎么看你们的？因为我猜你们在生涯中会遇到很多人。

罗西奥：我们就像一个教派一样（笑）。

切拉：很复杂，这个很复杂。

问：你们是不是整天都在宣讲？

切拉：不，要么你就不谈政治，要谈政治就不要在聚会的场合谈。但有时候会有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人们也通常会因为政治而聚集起来。朋友间的聚会通常也会聊到政治上……但我们不是为了讨论政治聚在一起的，而是正好和政治上的朋友一起在喝酒，如果不是政治上的朋友，就该避免这些话题。如果你想和有其他思想的朋友保持联系，那就应该谈些别的。

马努埃尔：那是很激进的。一些镇上的话题是很激进的。人们有很多不同观点。某些镇上，你会觉得：“好吧，这里有社会党和人民党”。但社会党和人民党之间没什么区别，甚至一些镇子里的社会党和左翼联盟也一样，虽然左翼联盟是会进步（light）一些。但在我们的镇上，对生活的理解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我们激进地反对体制。当然，我们现在就和反抗弗朗哥政权那会一样。那时是另一个政权，但它和现在一样。这个政权有一张更加和善的脸，但你不能被它骗了，因为在斗争中容不得优柔寡断。然后还有一些人不喜欢激进的做法。事实上……比如说，佩德雷拉实际上被分为了两部分。镇上有一半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们始终都认同我们，而另一半人则盼着我们吃苦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还是要站在这里。年轻人的队伍也在进行着自己的分化。还有更小的孩子也是。你看学校里的小孩，他们在打架，一个对另一个说：“你这个社会党人……”

罗西奥：你这个社会党人（笑）。

切拉：是的，我没在吹牛。

马努埃尔：是的，是的，这个给了我们很有力的印象。现在我们已经在选举的时代了……难以置信，我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那可是托儿所的孩子们！他们都分为了不同的阵营。

罗西奥：从家庭之间产生了分裂与争端……镇上每个人、每户家庭都认识，彼此都互相了解，于是一切都很政治化，你不是在这边就

是在另一边，没有中间的余地。

**马努埃尔：**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激进的实践。我们在形式上并不激进。

**罗西奥：**我们不提倡暴力。

**马努埃尔：**我们是和平主义者，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参加一些体面的活动。我们去和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打交道，我们……嘿，敌人对我们越好，就是想要更加了解我们。

**切拉：**如果你想团结起来，那么就要这样做，靠棍棒暴力是团结不起来的。

**罗西奥：**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这个镇子上，年轻人还是会参与个别活动的。比方说，我们会一起在集市上工作，这是为工会募集资金的一个办法，为了这一年剩下时间的预算，我们在集市上摆摊，每个人都是义务劳动。其中有一天，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工作，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事实上，我认为那次年轻人的参与度要超过其他所有的镇子。在工会的镇子里，年轻人参与、工作得更多，早上十一点你就要开工，直到晚上关门。你整天都要工作，然后把一天都花在集市上，我们说：“年轻人很喜欢过节啊……”嗯，那个节日是……当时是在八月份，大家都放假了，那是镇上最受欢迎的节日，他们花了一天在集市上为集体项目工作，参与了很多事情。

**问：**你们认为七十年代安达卢西亚的政治文化，比方说土地改革或“安达卢西亚主义”，它们跟现在有何不同？这些话题是否今天还在激励着年轻人？

**马努埃尔：**我认为年轻人的政治化程度非常低。然后那些重要话题，比如土地改革，对年轻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对年轻和年长的人来说，都一样。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土地改革的话题感兴趣。

**罗西奥：**是的，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村。由于他们不在农村，土地改革对他们来说就无所谓了。因为：“留在农村是最后的选择，至

于我，我不想在农村工作，所以我不在乎。”

**马努埃尔：**是的，但佩德雷拉合作社是被人们当作模范的。人们想来佩德雷拉合作社工作，想成为佩德雷拉合作社的一份子，因为他们看到，首先，他们能生活地很有尊严；第二，这里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和气氛，还能住在农村里。当然了，下雨天不用干活，用拖拉机的日子也一样，因为不用到田里去。在农村长大的人都喜欢在农村工作，还有就是在农村他们（每天）能赚 38 欧元，干建筑业的话，城里的人只能做短工。虽然因为建筑热潮，现在人们过得好多了。当时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看到仍有一部分人把眼光放在农村，认为农业改革可以成为农村的出路，年轻人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年轻人不会考虑什么土地改革。还有一件事，他们一无所知，就是说历史没有承接下去，我们没有进行教育，也没有把价值观传承给年轻人。我们有一些话题可以给年轻人来探讨。我认为关于安达卢西亚主义的话题，我们能够对年轻人解释，激起他们的兴趣。工会关于（洛达与莫龙的）军事基地的历史主张，它的话题在年轻人中间依然有用，甚至比在老年人中间更有用。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得把一部分主权割让给美国，让它在这建军事基地呢？”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很流行。还有就是声援运动的问题，尤其是为斗争中的人们，为古巴、巴勒斯坦、为撒哈拉地区进行的声援运动，也能吸引年轻人。实际上，他们（卢西奥和切拉）就加入过古巴的一个工作小组。有些东西会继续流行，而有些已经过时了。“过时”的意思是，不能再吸引他们的注意了。

**问：**有没有提出过新的主张，取代农工联的旧主张并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尝试？农工联里的年轻人有没有可能，或者说主动提出过自己的想法？

**罗西奥：**嘿！那些可是伴随整个工会历史的主张。我来的时候它们就有了。我亲身经历了那些为了争取土地和农业改革的斗争。事实上，我就亲眼见到了工会为了土地和工作而要求土地和土地改革、反



对大庄园和地主的斗争。我亲身经历了它们。我认为必须坚持这些主张，决不能放弃它们。然后我认为，在《（新）安达卢西亚法》颁布后，土地改革就被废除了，被左翼联盟拿去做了政治交易。我们怎么……跟着左翼联盟投票赞成它呢。我认为必须坚持这些要求，然后工会也应当关注年轻人看重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有关价值观和原则的，而不是以组织为轴心。他（马努埃尔）说过，我们（镇上的协会）什么都参加了。工会是镇子的轴心组织，哪里都有我们，但却不包括年轻人关注的事情……我认为不应当这样。而且无论如何，就像我前面讲的那样，必须要让年轻人自己来认同工会。如果这是我们的想法，那就让我们自己来实现它……我会拥护土地改革，虽然这并不是我的主要目标。如果我有其他的目标，我觉得工会的斗争工具也能交给人们来使用。我们年轻人能够开辟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但问题是我们何时开始、如何开始，并让不再年轻的人同意我们年轻的人来做呢（笑）。比方说，在古巴和埃尔科罗尼本地，我们都有自己的协会。我们年轻人已经行动起来、组织了起来，我们开始工作，为自己的项目募集资金，并花时间走访……这些都是我们开始做的，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也因此参与得更积极了。我认为……

**切拉：**工会也在场。

**罗西奥：**工会确实在场，但是……

**切拉：**它没有进行组织，协会不是从工会想要动员年轻人的打算出发，而是年轻人自己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参与进来，然后再接近工会的。考虑到工会，年轻人才自己组织了小组。你不是为了省钱的度假，而是为了参加一个项目、获取信息或者分享手头的东西，才和别人成立一个小组的。你考虑的不是什么“不要妨碍工会”、不能想干啥就干啥，因为这样会影响工会，而是会考虑工会没有进行组织，它在这方面落后了。也就是说，还能有这样的参与方式。从某种角度来说，在那种参与方式中，或许我们可以不以工会的身份参加工作。我

们可以作集体的工作，比如通过协会或其他什么到省会去工作，这样我们就知道除了工会事务以外的其他事情。在个别项目中，你可能要和协会里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总会有这样的需要的……不是需要，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者说我认为没有。所以我觉得必须唤起对这方面的关注。

**问：**看起来农工联斗争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你们对工会斗争的历史记忆有多少？你们是否认为它限制了年轻人参与活动和斗争呢？

**切拉：**我不认为工会的斗争历史是负担。另外，工会也带有一些浪漫的形象，不是吗？人们也在动员中相互认识……或许你不能参加斗争，但当你完全喜欢上它，对它感到敬佩，自己也想要参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我认为动员和工会的斗争历史一直吸引着人们。虽然这种吸引不会在会员和积极分子的身上表现出来，但对于同情者来说，他们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所期待，因为他们感到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问：**那么斗争的历史也包括现在吗？

**罗西奥：**我认为是的。比如今年（2006年）我们庆祝了三十周年纪念日，回顾了我们当初是从哪里起步，怎样发展起来，遇到了什么困难，曾经有哪些人在这，又有哪些人仍然坚持着这条道路。我们每五年就要举行一次周年纪念日，以此来让它的历史保持鲜活。在工会所在的镇子里都会举办。然后在三十周年纪念日那时，邀请了许多外面的协会和团体。巴塞罗那的人也来了，巴斯克的人我不太清楚，反正他们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是来的。就是这样，我们邀请了其他团体和协会。我个人不觉得工会的历史把青年压住了。我认为恰恰相反，现在还活着的或者了解这个组织的人们，都曾受过它的鼓舞，因为工会还是和原来一样，继续捍卫着它以前捍卫的东西，而且它的积极分子仍是底层的人，是普通的人，他们从头到脚和别的工人没有任何区

别，没有什么高贵或伟大的地方。但是，人们为自己的普通而感到自豪。就我个人而言，工会的历史还有今天的工会对我的意义，就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东西，因为它仍然捍卫当初的价值观，人们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他们没有变，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是为了追求利益、薪水、汽车或者奢侈享受。他们仍是农村里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就像他们在镇上的所有邻居一样。我认为工会的历史，就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马努埃尔：**在工会扎根的镇子里，人们会有集体意识……这是其他镇子里所没有的。不只是工会里的人，镇上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任何一个从佩德雷拉到科尔多瓦去工作的短工，都跟那些从特雷布赫纳（Trebujena）或其他地方到那里的人不一样，这是有区别的。首先，老板知道他来自佩德雷拉，就知道不可能少付钱给他，因为他来自佩德雷拉。这不是因为他来自农村工人联合会，而是他来自佩德雷拉，是农村工人联合会所在的佩德雷拉。或者说，如果他来自埃尔科罗尼的马里纳莱达（Marinaleda）、塞拉诺港、西梅那（Jimena）或者阿瓜杜尔赛（Aguadulce），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在工人中间，历史和过去的运动以某种方式产生着影响……有些镇子就比其他镇子更受尊敬。我们的镇子就在外面备受崇敬。马里纳莱达和埃尔科罗尼镇……那些有工会的镇子，在工人和老板面前都非常受尊敬：“唉，妈的！你是佩德雷拉来的？当然了，在你们佩德雷拉那里，人人都很团结吧。”或者“噢，你是马里纳莱达来的！我知道你们那边非常团结，早就听说过那里的故事了。”富有战斗性的小镇要比工会的名气还响。不用说，工会的历史和它的哲学，已经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了这些镇子。

**问：**你们是否认为，跟比古巴更近的地方（比方说，首府塞维利亚）发展的斗争进行联系时，民众可能会陷入自我隔绝的境地？

**马努埃尔：**实际上，农村地区和城里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目前我们……电影先在马德里上映，然后经过省会，最后才到村镇里去。就是说，很多问题都有时间差。现在住房在镇子里是个问题，而我们知

道这个问题在城市里已经产生三十年了。但是在佩德雷拉，我们的年轻人现在才面临严重的住房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过这种问题：他们有土地，父母也会帮助他们，他们也在这里或者那里开始造起了房子。他们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不会花多少功夫就能弄到房子住……现在出现问题了。换句话说，我们离（城市青年的）斗争、需求，还有他们将经历的东西，差了三十年。我不是想说我们会退缩。不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是声援运动、参加其他运动或动员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提出我们自己的要求或者进行动员。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必须要到人们的家里去，让他们动员起来。这是很累人的。我们不能说：“今天，我们要为了和平或者不知道什么东西来……”我们的确有能力和进行动员，并把五百人带到城市里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发动五百人进城，去年我们做了很多集体工作，本该有五百人去塞维利亚，去站在部长和议员的面前。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打响指），可是人们被动员起来了。城里对我们有个误解，他们说：“妈的！这些人只不过是没收了土地，他们就听工会领导的，却不能加入我们，要是所有的镇子一起行动起来，肯定是一场非常壮观的行动……”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加入他们。我们的能力有限。

**罗西奥：**但是没办法。

**问：**但或许现在镇上的人们，在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上要比你们更加城市化。

**马努埃尔：**是的，当然了。

**罗西奥：**几年前，当法令下来的时候，我们有非常非常强的动员能力。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在农村了，但还有很多在农村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当时受法令的影响最大，却没参与进来。明明这对他们影响最大……唉！说的就好像我不是一样（笑）。但他们却没有参加。有时候，我们也很难选择时机。什么时机？就是在关键时刻出手的时机。这还

蛮难的。无论如何，尽管镇上的人们生活方式更城市化了，他们还是想回到自己的镇子上，虽然他们暂时会出去读书，但还是会想要回来的。想要留在城里的人并不多。

问：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工会来说，工作是一种价值观。年轻人中间对于工作的看法是什么？这种看法发生过什么变化？

罗西奥：工会里最老的人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有尊严的工作。而我说：“要把说这话的老家伙烧死在火刑柱上（笑）。”

马努埃尔：应该是发明工作的人。

罗西奥：嘿！工作本来就没有尊严可言。只有一些工作是体面的。我和迭戈<sup>214</sup>讲：“迭戈，我去采些橄榄，你想知道我一天中什么时候会感到满足吗？没有，因为我根本不能感受到。我什么时候感觉到有过尊严呢？从来没有啊。”（笑）这种农村工人的骄傲，我觉得就是老板的把戏，因为最后它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展示这种工人的自豪和节省老板的工钱，让工人付出双倍的努力。

问：但是马努埃尔告诉我们，在农村工作就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马努埃尔：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拥有这份工作的尊严。而这是另一回事。对于尊严，有人会说：“好吧，人们总是说农村是最后的选择。”但是工会反对说：“如果没有农村的人，人们就会死于饥饿，所以我们的工作要远远比医生、老师或工程师的工作重要得多。我们的工作就是养活人们，这才是首要的需求。”总之，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工作更多……屈服于工作则是另一回事。

罗西奥：这种工人的骄傲，就是要证明自己比其他人更能干。

马努埃尔：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如果你来自工会，但不是田里最能干的，人们就不会对你使坏，不会太在意你。如果别人说“这

---

<sup>214</sup> 迭戈·卡纳梅罗（Diego Cañamero），农工联的前领导人——原注

小子不想干活，而是在想别的”，然后，你就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努力，也不会去想什么罢工。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加倍努力，你会领先别人并帮其他人一把。然后你就会说：“我不是不想干，只是同伴不能干。”这就是她（罗西奥）的意思。很多时候你会说：“就是工会领导不让我下田，还给我添乱”。你必须是第一名，你必须在工作是第一名……

**罗西奥：**当然了！不仅要去当第一，还要催促别人，最后不过是损害了一起干活的同伴。

**切拉：**但我们在谈的不是一回事啊！

**罗西奥：**在我采葡萄的时候，有个男孩子就带着这种“农村工人的骄傲”在拼命干活……他干过了我们其他人（笑）。（我说）“嘿伙计，现在就停下来！”

**切拉：**也不是在说这个。

**罗西奥：**那就请你耐心一些。然后那个男孩子说：“罗西奥，要么你就别在田里干了。”这就是农村工人的自豪，作为农村工人，他要把活干好，对我来说把活干好也并不坏，但是：“你来这里只是为了挣钱，你还有二十天可以干，现在你采葡萄是在十五岁。最后，你把主人的工资省下了，但是损害了其他人，我们不得不干得更急，还要失去五天的工资。”

**问：**你们怎么看发展合作社的问题？在你们的设想中，斗争会在哪些方面？

**马努埃尔：**合作社的问题就是为土地而斗争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有土地才能生产。要是没有土地那就没法生产。在安达卢西亚，土地都在地主手里，而我们农村工人联合会以前从国家或资本主义手里夺取过一些土地。我们争取到了七个、八个到九个合作社。在为土地而斗争的想法下，我们希望人们参与农活，自己动手下去干，要让地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要让他们把地交出来，必须要安达卢西

亚议会掏钱才行。现在你问：“年轻人是不是这样？”这是之前我们谈到土地改革时提到的话题。这也是土地改革的斗争，年轻人也在关注它。

问：我认为你们对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很特别：你们为土地而斗争，但同时又不是为了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的所有权而斗争。

马努埃尔：嗯，这是我们工会的，特别是执行委员会中最有觉悟的人的观念，我们不希望土地成为私有财产。我们不希望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因为这样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要是人们有了私有土地，那么他就只会在自己的那块地上做打算。如果土地始终是公有财产，如果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如果土地不是谁的而是我们所有人的，那它对我们来说，就更有社会作用。

问：你们不担心安达卢西亚议会哪一天会把土地收回吗？

马努埃尔：不，只要工会还有力量，他们就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可以不惜一切来战斗，而他们自己却不行。他们更愿意把地卖给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在卖给我们土地时，我们还把麻烦带回家。他们说：“喏，地归你们了。”现在，每一位合作社成员都可以离开，只要他说：“我想要我的一份，因为我不想继续这个项目了，而且那一份是我的，我要我的那块地！”

罗西奥：不仅是合作社的成员，如果地是工会的财产，每个工会会员也可以说：“喂，我要拿走我的那份。”

马努埃尔：工会财产还要更复杂一些。但如果你是合作社的成员，你可以说：“我想要我的那一份”或者“我要几块地”。你可以通过找律师来合法得到它，那这是一个问题。

问：好吧，那么在采访结束前你们还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马努埃尔：我们要干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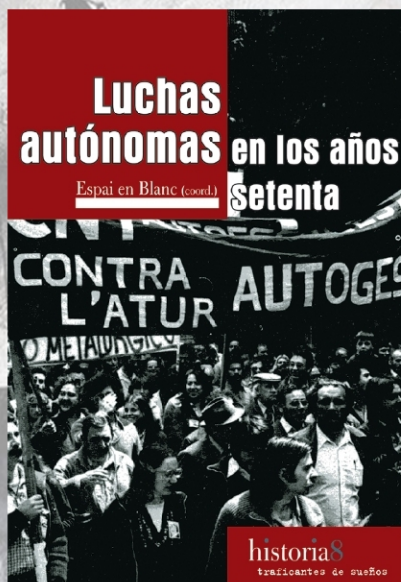
切拉：我们会胜利的。不管怎么说，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笑）。或许吧，我们刚才谈到合作社，我认为合作社都是在土地斗争中争取

来的。在土地到手之后，你就必须管理它，而管理土地最好的、最社会化和对小镇经济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合作社。现在，你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合作社经营者。仅仅是工会的人已经不够了，当你得到土地的时候你就加入了合作社，你就应该证明你的经营得当，你应该说明怎样经营才能把土地斗争继续下去，因为如果不能，那么当你没有管理好土地时，你怎么继续为土地而斗争，保持土地改革的精神呢？这不仅是为了取得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当你得到土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管理工作，证明合作社是一种经济转型的方式。这也是另一项必须完成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马努埃尔：**在商业化方面也是这样。我们正在考虑在工会所在的镇子里开商店，用各种方式将合作者的产品推向市场。这些项目……为此，我们的工会需要有实力进入市政府，因为这些能给我们在规划项目和推进工作的时候提供便利。我们在市政府的时候，就做了很多改变。如果没有进入市政府，那我们会尽可能地进行改变，但还是需要进入市政府。实际上，我们拥有的力量越多越好。

2006年12月于佩德雷拉





《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是一本罕见的、讲述西班牙工人阶级如何撇开改良主义政党与工会，在压迫下自我组织起来与弗朗哥斗争的文集。这方面的历史，尤其是关于西班牙七八十年代的斗争，对于国内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些经验也是第一次引进，由本人经西班牙语译成中文以供参考学习。

自加加林上太空、古巴革命和越南战争爆发以来，人类的大胆梦想似乎又成为了可能：它诉说着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感召下，整个一代的六十年代青年将自己投身于反叛事业。他们知道自己憎恨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的所言所行是为了什么。也许他们是历史上最激进、最慷慨和最热血的一代青年。战后的社会氛围是压抑的，无处不在的虚伪、残暴和压迫使他们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他们渴求颠覆，渴求真正的改变。